

目 录

- 关于阿拉善旗“小三爷事件”……………卓力克（1）
- “小三爷事件”始末……………罗永寿（20）
- 准格尔旗魔王纳森达赖的生平……………奇天祥（34）
- 抗战时期的“绥远调查统计室”和张庆恩……………张富仪（53）
- 帝国主义在呼市的一个间谍组织
- “汉瑞洋行”的侵略罪恶活动……………曹毅之（94）
- 旧绥远省的三个“独立王国”……………刘映元（110）

附 载

-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123）

关于阿拉善旗“小三爷事件”

卓力克

我父亲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台吉（即贵族）阶层。弟兄三人，我父亲排行为三，当时人称“小三爷”。一九二七年旧历闰三月初三日，以我父亲为首在阿拉善旗发动了推翻王公制度的事变，因之人们称这一事变为“小三爷事件”。

从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母亲就把关于我父亲闹革命的经过，给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我还有一位五十一岁的大姐罗雪琴健在人间，她对这件事情，也知之甚详。我为了郑重起见，又先后访问了熟悉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几位老先生，访问了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一路司令奇子俊的幕僚奇锦峰以及在宁夏驻防时的几位同志，才写成这个材料。现在分作几个问题来谈。

（一）阿拉善旗为什么会发生推翻王公制度的事变

首先谈一谈阿拉善旗王公制度的由来和当时的阶级关系。

阿拉善旗的系统属和硕特，为成吉思汗弟哈布图哈萨尔

之后，七传至顾实青桑，他的孙子博贝密尔长统一额鲁特，称汗。原居阿拉木图（今苏联境内）、伊犁等地。博有子名哈尼诺颜洪果尔，又生五子，其四子名巴尔斯图鲁拜琥，清顺治年间被册封为彻辰顾实汗，以后据有青海之地，进兵西藏。其三子名阿玉什巴颜阿布该，号达赖乌巴什，生有四子，末为和罗理，即阿拉善旗台吉第一代祖先。和罗理原与准噶尔部噶尔丹博什克图同住一个地方，后来噶尔丹叛清，和罗理率部来到现在的阿拉善旗地方，奏请归顺，清廷照准，于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援照内蒙古四十九旗之例，置旗编佐领，赐印授札萨克，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这便是阿拉善旗王公制度的由来。

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年），和罗理死，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子阿宝袭位。阿宝幼居北京，为御前侍卫。尚和硕公主（俗称道克欣公主），授和硕额駙。于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率兵万人随军征准噶尔，为右卫将军、参赞大臣，后又奉命护送达赖喇嘛入西藏，统兵居四年之久。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奉调率部赴青海，晋爵多罗郡王。阿宝死于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当年次子罗卜桑多尔济袭职为札萨克多罗贝勒，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尚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駙。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擒捕塔瓦齐汗和辉特部巴雅尔汗，以少众降哈萨克，歼灭克尔科斯诸部，追击阿睦尔撒那至俄罗斯境。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罗卜桑多尔济晋位为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平定准噶尔和回民叛乱有功，晋爵和硕亲王。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更诏命“世袭罔替”（这个诏命只限于被清朝皇帝认为有特殊功勋

者，即在清朝宗室王公中，也不易多得）。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罗卜桑多尔济死。以后六传至塔旺布鲁克札勒，七传至达理札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历代王爷是多么“忠实”于清朝，曾在镇压国内的少数民族叛乱中，东征西战，立下“汗马功劳”，因之被清朝皇帝两次招为驸马，晋爵至和硕亲王，并“世袭罔替”。同时在北京还修建有驸马府——罗王府，阿拉善旗的王爷们，多是长年居住在那里，既享有和硕亲王的俸禄，又拿上剥削阿拉善旗人民的钱财，由他们大肆挥霍，真是备受恩宠，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由此也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历代王爷和清朝的关系，是怎样的亲密。而这种关系愈亲密，也就使阿拉善旗的王爷们，更肆无忌惮地去剥削和压迫本旗的劳动人民，从而使劳动人民所受到的痛苦，更为加深，为其他各旗所未有。例如阿拉善旗的“乌拉”制度，是对于牧民最苛重的劳役负担，特别是当王爷、福晋及其亲族进京或回旗时，征用“乌拉”的规模，比其他旗都大。如系王爷、福晋进京，从定远营（现巴彦浩特）到磴口间，要设有十四个驿站，三十里一打尖，六十里一住宿。每驿站设有“达木勒”一名，各站准备作厨房的蒙古包一至二个，王爷专用的特制蒙古包二个。每日午餐和晚餐均准备绵羊一只，专供王爷、福晋享用，水、柴则是用骆驼驮运。王爷所乘的轿子，叫做“四马轿”，或称“草上飞”，轿夫二十名，以其中之一为长，每四人一组，乘马扛抬，其余人夫在轿旁两侧乘马路随，准备换班。轿前、轿后又各有一名徒步的轿馆，以防备途中发生事故。王爷到达驿站时，“达木勒”跪拜迎接，献哈达请安，若各种供应都能

得到王爷、福晋满意时，则予以嘉奖，有时还赏给顶戴，否则处罚、鞭打。而“达木勒”为了使王爷、福晋满意并挣个顶戴，就都在牧民身上打主意，多方勒索。因之牧民一遇到这种情况，也就负担格外沉重。除王爷乘坐“草上飞”外，福晋随行时，尚有小车三辆，随着侍候的有随从、侍女十余名、厨师二名、勤杂人员四十余名、护卫兵丁二十余名，共需骆驼七十余头。王爷用的蒙古包，有专设的“额和如沁”管理，用骆驼驮运，但从住宿地驮到打尖地，须得王爷动身以后才能搬动，并必须能赶到王爷前头去作准备。这样前后翻腾，忙碌不休，时间的紧迫，可想而知。如果不能提前赶到，就要受处罚，受鞭笞。这些骆驼和人丁，都是由旗里摊派来的“乌拉”，谁摊着，谁头疼。特别是牲畜，这样跑一趟就完了，死在哪里扔在哪里，从不赔偿。象阿拉善旗王爷的这种威风 and 派头，在当时各蒙旗的王爷中是绝无仅有的，因为他是清朝的驸马亲王，所以才能够这样。但对牧民群众来说，王爷的这种派头和威风越大，却是给他们带来的苦难越深，蕴积在他们心里的怒火越大，因而表现在阶级关系上，矛盾也就越尖锐了。

其次再谈一谈塔旺布鲁克札勒继承王位后阿拉善旗的情况：

塔旺布鲁克札勒于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袭王位。第二年，即一九一一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八十多年的清王朝，虽然这是个不彻底的革命，而塔旺布鲁克札勒因清朝皇室的复灭，直接影响了阿拉善旗亲王的荣华富贵，仍然是深恶痛绝。但不久这个革命

被袁世凯篡夺了，袁世凯为了做皇帝，要保留封建基础，不仅使各蒙旗的封建制度均率由旧章，并且对蒙古各王公还晋爵授勋，大加赏赐。这就使塔旺布鲁克札勒在阿拉善旗的王爷宝座得以继续保持下去，塔王也就忠实地依附了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利用这位清朝的和硕亲王，使他当上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总裁，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重要代表人去反抗进步力量。如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孙中山到北京后，段祺瑞为了抵制国民会议，召开了御用的军阀分驻会议——善后会议，塔王就以蒙藏军民长官的身份，参加了这个会议。

塔旺布鲁克札勒对阿拉善旗的封建统治制度，当然是坚决维护，不容丝毫打动，不仅征兵、征税、差徭、“乌拉”未稍减免，而且由于清朝复亡后和硕亲王的俸禄告终，所有北京城罗王府里的浩大开支，完全由阿拉善旗的劳动人民负担，这就使劳动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比过去更为加重。结果是旗民生活日益贫困，人口日益下降，更加深了劳动人民和统治者的阶级矛盾。而旗内有志之士，一方面看到这种情况，极为痛心疾首，一方面又受到国内外革命运动的影响，便认为阿拉善旗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存在，因此就要推翻，要改革，以至于发展成为当时武装的革命政变。这就是这一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当时国内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后，倾向革命，又率所属的国民军到达了西北地区，更对阿拉善旗这一革命事件予以直接影响。尤其是一九二五年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张家口成立，第三国际派丹巴同志（后曾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党书记），国民党派李烈钧，冯玉祥派

张之江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推白云梯、郭道甫、包悦卿、伊德钦等为领导。这些领导人中还有有的亲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活动，因而更有力地促进了这一革命事件的爆发。

总的说来，阿拉善旗发生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是它的内部原因，国内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它的外部条件。

（二）阿拉善旗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经过情况与失败原因

德钦一心诺尔布弟兄三人，长名齐米德爱林岑，次名思克布音，德是老三。他自幼在家延师课读，及长通蒙汉文，并擅长绘画，所画《八骏图》较负盛名，在当时的阿拉善旗，算是出身于贵族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人和藹，平易近人，广交游，很少有王公贵族的习气，因此群众都比较喜欢他，愿与他接近。德父嘉伦春旺吉勒逝世后，弟兄三人分析祖产，思克布音所占独多，因此德曾先后数次前往北京，向塔旺布鲁克札勒请求予以公断，但结果仍只分得果园一处、土地三百余亩、铺房一百余间以及部分牲畜。以这些财产的占有，从当时蒙古王公贵族来说，是比较少的。也正由于此，才使他在以后能比较容易地接受革命道理，从事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

德钦一心诺尔布，曾充任阿拉善旗的副梅林章京、副管旗章京（按各蒙旗旧制，管旗章京及其以下由平民中选任）等职务。在正管旗章京休假期间，受王爷、协理的指挥，代

管旗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宜。但由于他几次前往北京，一方面受到当时全国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一方面结识了郭道甫，使他逐渐认识到，阿拉善旗的统治者对当时人民的压迫与剥削过于残酷，因而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经常不到旗衙门参与政务。旗内每遇有重大事件，必须派人去找他，才来参加。尤其和当权派正管旗章京陈莽哈赖，貌合神离，深为陈所不满，并加以排斥。因此，他在当时已经成为有副管旗章京之名而无副管旗章京之实的在野贵族人物了。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的国民军退据到陕、甘、宁一带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等，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敖奇尔（系苏联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人）等七人（女三人）的协同下，来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据一位在巴盟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一九五四年有一苏联专家到了阿拉善旗的巴彦浩特，曾和某一负责同志说：“我的父亲过去曾经帮助你们这里的德钦一心诺尔布闹过革命，不知道德家有什么人？”后来这位专家就被领到了达理札雅处去谈，所谈情况不详）。他们到了定远营后，首先即找德钦一心诺尔布和田协安进行联系，经秘密商议后，决定尽速发展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夺取政权，并吸收孟雄、罗敖有参加革命事变的领导。孟、罗经德钦一心诺尔布和郭道甫的影响和争取，不久便被吸收进来。

田协安、孟雄、罗敖有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能和德钦一心诺尔布结合在一起呢？

田协安，本名田济，先祖是随清朝皇室的公主陪嫁到阿拉善旗的“腰户”。腰户中有种田的花头，也有执役的太监，

名为“满洲人”（阿旗群众称为满吉坤），其实都是河间府、保定府一带的汉人。他自幼随父亲在阿旗王府当差，因侍奉塔王，常住北京，吸收了不少新知识，是出身于奴才家庭侍候人的知识分子。孟雄原系甘肃省秦安县人，业裁缝，因在原籍打死了人，逃亡到定远营。他手艺好，又善于交际，不仅对定远营的劳动群众有广泛的联系和相当信誉，并且取得阿旗王公贵族的欢心，由协理四公爷逐步提携他作了梅林兼听差处“达尔嘎”（即审判官）。罗敖有，蒙名嘎宁嘎，出身于台吉家庭，因系远支贵族，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精于武术，喜爱狩猎，并会修理枪械，因在旗衙门学习，通晓公文，由一般“笔帖式”（即文书）逐渐提升到梅林副章京，充任全旗兵营“达尔嘎”，掌管全旗军权，但后来因生活入不敷出，往北京贩运鸦片，被塔王全部没收，因而对塔王有很深的积怨。

从以上这几个人看来，一个是出身于侍候人的权才家庭的小知识分子田协安，一个是出身于手工业工人兼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孟雄，一个是经济生活困窘并和塔王有私恨的罗敖有。他们与游离在封建统治集团之外的在野贵族德钦一心诺尔布，都比较接近下层并具有不满现状的情绪，再加以国内外革命思想的熏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蒙顾问的启导，就很容易结合在一起，组织并领导了阿拉善旗的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

这些人结合起来后，为了发展武装力量，经进一步商定：由孟雄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秘密发展一部分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的比较可靠的税丁，作为组织商团举行武装暴动的基本革命力量。由罗敖有在阿拉善旗兵营中慎重地发展一些蒙古士兵，以便在武装起义时，掉转枪口，倒向革

命，镇压统治阶层的抵抗。并准备在革命事变成功后，做为组织革命武装的一部分基干力量。这些工作，在分头进行中都很顺利。

此时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鄂道甫等人，认为这一革命事变组织工作，已初步布置就绪，即偕同苏、蒙顾问秘密地离开了阿拉善旗，德等仍继续活动，可喜的是得到了冯玉祥国民军的有力支援。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由于冯玉祥在北京驱逐溥仪出宫，不仅刺痛了清朝遗老遗少的心，更刺痛了与清室有极其亲密关系的塔王的心。因之塔王对冯衔恨甚深，到一九二六年四月间，国民军被直奉军阀战败，退入张家口、内蒙古一带，冯玉祥计划取道阿拉善旗前往苏联，但事为直奉军阀获悉，即授意塔王密令阿拉善旗衙门派兵在要路截击，如能将冯击毙，把人头送到北京，当酬塔王以崇优的政治地位，却不料塔王给阿旗的信件，被国民军军长门致中扣获，经向冯报告，冯乃改道赴苏。同年九月，冯回国在五原誓师后，进据陕、甘、宁一带，并将宁夏府制改为省制，派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因未忘塔王阴谋截击之恨，便对阿拉善旗相机进行报复。一方面将阿旗磴口巴格改为磴口县，隶属宁夏省管辖，一方面给阿旗衙门去信，摊派骆驼七千只，步枪五百支，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即以武力对待。未几，吉鸿昌又借口办理由苏联运输枪械弹药事宜，要取道阿拉善旗，并派旅长赵景文率武装部队二十余人，到定远营驻扎。这些事情发生后，塔王和阿旗的管事人员，都惶惶不可终日，一再要求德钦一心诺尔布前往宁夏交涉。德至宁夏后，吉鸿昌即将他软禁省府，并声言作为人质，等阿旗将所摊派的骆驼和枪支缴足后才予开释。但第三天吉鸿昌突来劝

德参加革命，要以武力政变推翻阿旗封建王公制度，并在革命成功后，任命德为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德闻后正契所怀，即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白云梯、郭道甫等和苏、蒙顾问来阿旗策动革命的经过，向吉报告，并要求给予支援，吉答应完全支持，将由苏联运来的枪支弹药拨给德一部分，组织革命武装。同时还因其派驻阿旗的旅长赵景文与阿旗统治集团有拉拢，恐对德的革命有不利行动，把赵调回，改派姚甲三（即姚连榜）到阿旗充任转运军火的监督。德亦随着回旗。

德回旗后，向旗衙门管事人等报告了交涉无效的经过，使他们很失望。间时姚甲三到定运营后，一方面对摊派的骆驼和枪支催缴很紧，一方面和德、田、孟等人过从很密。而协理罗希道尔吉，在赴姚的宴会后，又身死不明。这些迹象，都引起了阿旗统治集团的惊疑。陈莽哈赖在这时便派人星夜前往北京向塔王报告，请示机宜，并令副梅林章京黄·图门巴雅尔前往各巴格征集士兵，准备应变。塔王得报后，大为震惊，为缓和形势，争取时间，表面上提升德钦一心诺尔布为阿旗正协理，以示笼络，暗地里却令阿旗衙门中的亲信，尽速纠集各巴格、防卡的武装力量，对德等进行镇压。

到了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初一日，德接到塔王任命他为阿旗正协理的命令，深感事出突然，立即和同志们密相研究，都认为一定是事变的机密，已为旗衙门统治者所侦知，故作此诱惑之举。现事不宜迟，为掌握时机，应出其不意，迅即发动武装政变。经商得姚甲三同意并联系好支援办法后，即于三月初三日凌晨，展开了震撼全旗的以推翻王公制度为目的的革命事变。

这个事变，主要分两个方面动手：一方面由孟雄把事先发动好的、经国民军武装起来而组成的商团（这个商团成员是定远营内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的一部分职员和大部分税丁），连同姚甲三所属的国民军，共集合起来有一百余名，由德等率领向阿拉善旗衙门展开进攻，很顺利地就把它占领。在占领后，即迫令衙门中的官员交出阿旗的印信，并包围了塔旺布鲁克札勒的王府，一方面由罗敖有把事先发动好的、在定远营兵营的一部分蒙古兵，即令其举行武装起义，进而解除兵营中其他蒙古兵的武装。在这两方面成功后，接着就分头占领定远营各要点，搜捕统治集团的人物，但除捕获陈莽哈赖外，其余协理、管旗章京、梅林章京等，均纷纷逃出了定远营。这一革命事变，由于事先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又得到国民军的有力支援，所以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推翻了旧政权，而取得胜利。

德等在革命事变成功后，立即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宣布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由德钦一心诺尔布任主任委员。同时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司令部，由德兼任司令，孟雄任副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姚甲三任监督（即政治委员）。司令部设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等组织，齐米德爱林岑任军需处长。司令部下辖两个旅，由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齐尔任第二旅旅长。所属士兵由参加革命的商团和起义的蒙古兵为基础，并吸收了被解除武装的、不愿被遣散回家的蒙古兵。同时为了扩张革命力量，有利于展开牧区工作，还聘任了在革命事变中持中立态度，没离开定远营的原镇国公塔旺策林、镇国公米格瓦齐尔（均系闲散公爷）为顾问，副管旗章京罗·巴音都伦为参议。

第二、在定远营城内召开庆祝革命成功的群众大会，由蒙兵第二路参谋长田协安代表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向群众宣布：代表封建制度的塔王政权，已被推翻；由德钦一心诺尔布领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时还张贴了阿拉善旗王公制度已被推翻的布告。

第三、没收塔旺布鲁克札勒王府和阿拉善旗的财物，约价值五十万银元（其中有白洋十三万元、鸦片一万余两，余为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除截留一部分做为革命政府的行政费用外，绝大部分银元及全部鸦片，均上交给宁夏省政府。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还运至宁夏省城举办展览会，使群众了解阿拉善旗历代统治者在生活上的穷奢极欲和对人民的剥削压榨罪恶。

第四、宣布了被捕获的统治集团的头子陈莽哈赖反对阿拉善旗国民革命的罪状，于三月初六日执行枪决。

第五、为了表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向全旗宣布废除“乌拉”制度，同时今后不准再留辫子。

革命胜利的消息和上述措施，很快就传到北京。塔旺布鲁克札勒听到后，失魂丧魂，捶胸顿足，几欲发疯，立即指示阿旗统治集团逃出定远营的人员，尽快组织各苏木、巴格的佐领、骁骑校、达木勒，率领全旗武装并胁迫牧民群众向革命政府进行反扑。这些人得到指示后，一方面在牧民群众中对革命政府进行恶毒的诽谤和诬蔑，他们造谣说：“德钦一心诺尔布叛变了塔王，出卖了阿拉善旗，抢掠了历代王爷宝库中的财物，枪决了管旗章京陈莽哈赖。国民军和商团在定远营奸淫携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一方面恐吓牧民和

蒙兵说：“王爷对此大怒，命令你们为王爷效命，凡懈怠不前或同情革命者，将全家人丁尽杀无赦”。在这时，因革命政府在各巴格未建立起革命组织，并缺乏宣传，致一般牧民和蒙兵弄清是怎么回事，因此便在统治集团的煽惑和胁迫下，听从驱使，向定远营进行围攻。南部各巴格的蒙古兵，由毛·巴图尔、范·布尔格德、杨·巴图孟柯等率领，截住了从三关口通往宁夏的道路，从南面逼近定远营；贺兰山各巴格的蒙古兵，由杨·嘎瓦率领，封锁了从樊家营子山区通往宁夏的小路，并逼近定远营；巴音乌拉和柴泥湖各巴格的蒙古兵，由巴图赛迪率领，从北面逼近定远营。这些武装部队在靠近定远营后，由原副梅林章京黄·图门巴雅尔任指挥，于四月八日（在革命事变后一个多月）向定远营攻城。在当时各巴格部队，人数较为众多，但由于所持的武器多半为土枪，效力不大，而被胁迫来作战的牧民，也不愿为统治集团卖命死拼，因此虽经过一昼夜的战斗，定远营仍然是安全无恙。统治集团见志不得逞，便撤至南北寺，计划对定远营长期包围。

定远营被围后，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和蒙兵第二路司令部派参谋罗·巴图（军需处长齐米德爱林岑之长子）取道山区小路前往宁夏，向宁夏省主席门致中报告情况，不料行至樊家营子，被杨·嘎瓦率领的部队击毙。以后又设法和门致中取得联系，门从宁夏派步兵一营，由彭营长率领驰援，但进至三关口时，却又被南部巴格部队截住，未能通过。门闻讯后，又从河套调苏雨生骑兵旅由镇木关越过贺兰山，冲破各巴格部队的防线，进入定远营，于是革命政府的防务，愈形稳固。

正值革命政府和苏雨生部计划彻底歼灭敌人之际，却不料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在“徐州会议”后，叛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投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集团的怀抱。接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也叛变了革命，解散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原在国民军和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活动的苏、蒙顾问，也被迫纷纷离去，于是阿拉善旗的革命政府，便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中。

冯玉祥、白云梯的叛变消息，传至北京后，塔旺布鲁克札勒喜出望外，兴奋万状，于是以十分火急的手令，指示阿旗统治集团在巴音乌拉山的裁立毛登地区，组成阿拉善旗临时政府，统一指挥各巴格的武装，限期攻下定远营。到旧历六月上旬，各巴格武装便向定远营发起第二次总攻。革命部队在苏雨生旅的协助下，奋勇抵抗，再一次击退了敌人的反扑。

这时革命政府孤立无援，为了分化敌人力量，经商定派旅长罗敖有、敖齐尔，潜入统治集团的部队中进行策反工作，不幸为罗·巴音都伦出卖，致二人均被敌人扣捕，使革命势力遭到相当挫折。尽管如此，定远营仍在革命政府掌握之中，统治集团仍对之无能为力。

塔旺布鲁克札勒看到定远营围攻不下，已有四、五个月之久，心中甚为焦急，便加紧运用外力进行破坏、颠覆。他首先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立即制止门致中、吉鸿昌在阿旗的军事行动，从定远营撤走苏雨生的骑兵旅，恢复阿旗的旧秩序，退回被革命政府没收的财物。随即派人到南京以重金购买蒙藏委员会的主事人，从中帮助。结果由蒙藏委员会以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名义，责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从中调解，塔旺

布鲁克札勒闻知后，又派人将大量财物带到兰州，给刘送礼，恳请他解决阿旗革命势力。于是刘郁芬便指派其部下于来堂（即于长东）假借冯玉祥的命令，到定远营进行检查。于来时，塔旺布鲁克札勒除给以优厚礼物外，还表示如能将革命政权破坏，愿以革命政府所没收王府财物的相当部分相赠。于来堂见钱眼开，欣然乐从，从此便作了阿旗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成为破坏、颠覆阿旗革命政权的极其重要的帮凶。

于来堂到定远营后，进行了以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1）他以国民党中央政府“钦差大臣”名义出面，向有关各方面宣布：“国民政府没有发过取消札萨克制度的命令。推翻札萨克一事，乃是门致中、吉鸿昌、姚连榜、德毅忱等人擅自发动的，他们是罪人”。（2）解除了蒙兵第二路的大部分武装，移交给反革命的阿拉善旗临时政府。（3）以门致中的名义，将姚连榜扣捕，并解送宁夏。（4）逼迫苏雨生旅撤离定远营。（5）胁迫德钦一心诺尔布、孟雄、田协安等革命领导人随同蒙兵第二路撤至宁夏。

阿拉善旗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政权，统治集团用武装围攻数月尚不能颠覆，却被塔旺布鲁克札勒收买的于来堂从内部摧毁破坏了。计自一九二七年旧历三月初三日发动政变，至被于来堂强迫解散为止，历时七个多月，这一震撼全旗的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事变，便宣告结束。

综观这一革命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内部是由于革命组织事先未能在牧区各巴格发展革命力量，致塔旺布鲁克札勒能及时调集各巴格武装进行反扑，在外部则是由于冯玉祥叛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革命，使阿拉善旗

的革命政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始而是新政权建立不久，即被统治集团的武装包围，使一切重要的革命政策和措施，都不能在牧区宣传和推行，以取得群众的了解和支持；继而是外援断绝，无可依靠，就只得听于来堂任意而为，从内部进行破坏，以至于摧毁。

于来堂不仅竭力摧毁了革命政权，并且还积极协助阿旗统治集团恢复封建统治的旧秩序。他亲自召集阿旗临时政府人员开会。公推南寺的喇嘛坦迭斯尔德呼图克图暂时执政，护理印务。塔旺布鲁克札勒又指派罗·巴音都伦为协理，塞登、杨·呢玛敖其尔为正副管旗章京，在喇嘛坦领导下，分管旗政。从此被推翻了七个月的阿旗封建王公制度，又死灰复燃，继续统治着阿旗的人民。喇嘛坦从一九二七年起，在阿拉善旗代行执政五年，于一九三二年旧历六月四日将阿旗政务移交给达理札雅掌管。

门致中、吉鸿昌对于来堂颠覆阿旗革命政权的破坏行为，极为痛恨，曾下令通缉。阿旗统治集团为保护这一挽救阿旗封建王公制度的“大恩人”，派兵将于护送至北京罗王府躲避，以后又送至天津法国租界作寓公，直到一九二九年门致中、吉鸿昌先后调离宁夏后，于才返回阿旗担任秘书长，于一九三九年死去。

（三）革命事变中主要人物在失败后的情况

阿旗的革命政权被于来堂摧毁后，德钦一心诺尔布、孟雄、田协安等随蒙兵第二路撤至宁夏。宁夏省主席门致中仍继续给予支持，保留蒙兵第二路的番号，令德等暂住宁夏，

等待时机，徐图后举。这时塔旺布鲁克札勒虽恢复了封建王公制度的旧秩序，但对革命政权没收其王府价值五十万银元的财物，仍痛心疾首，因之对当时发动革命事变的主要人物，均恨之入骨。首先命令其爪牙将进行策反被捕的罗敖有、敖齐尔两旅长，押解至南寺，百般侮辱拷打，最后凌迟处死，惨绝人寰。其次将未离开定远营的蒙兵第二路司令部军需处长、原辅国公齐米德爱林岑的公爵撤销，台吉革除，降为“绰罗斯”（即一般平民），还将其一家大小的名字，从阿拉善旗王公系统的族谱中统统勾掉，并在阿拉善旗群众中宣布：“齐米德爱林岑是背叛王爷的叛徒，是随了东军的坏人”。再就是把德钦一心诺尔布的家产瓜分。更时刻谋算，想把撤驻宁夏的德钦一心诺尔布、孟雄、田协安等拿获，必斩尽杀绝而后快。

一九二九年夏，青海回民马仲英叛乱，窜犯至甘肃省镇番县（即今民勤县）一带。塔旺布鲁克札勒闻知后，认为机不可失，即派人和马仲英接洽，愿酬以重金和枪支马匹，并给带路，请其取道阿拉善旗攻打宁夏，捕捉德钦一心诺尔布等人。马仲英表示同意。适值冯玉祥和蒋介石酝酿大战，国民军大部集中于河南、陕西一带，宁夏城防空虚，经马仲英前往攻打，很快就被占领。德钦一心诺尔布等越城出走，分别匿居民家（德当时是匿居李岗堡张老汉家）。马仲英进入宁夏后，为酬答塔旺布鲁克札勒，曾张贴榜文悬赏，有能捕获德毅忱者，赏银万元，通风报信因而缉获者，赏银五千元。但未几，国民军收复宁夏，吉鸿昌接任宁夏省主席，德钦一心诺尔布等亦随之归来。这时蒙兵第二路的官兵，已折损无多，吉鸿昌仍积极扶持，曾有扩充兵额、恢复原建制的

计划。但不久，吉鸿昌又调走，由苏雨生任宁夏省军事长官，马鸿宾的三叔马福寿暂代主席，蒙兵第二路的粮饷无着，我母亲曾变卖首饰衣物维持数十人生活达数月之久。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苏雨生在定远营协防时，纵部放赌，擄掠民财，德屡劝不听，致相齟齬，致此苏怀念前嫌，便对德不加关顾。塔旺布鲁克札勒得悉后，又利用这一间隙，派人向苏游说，许以重酬，请扣捕德钦一心诺尔布等。德等觉察后，深感身在危境，朝不保夕，经大家商定，只好各自分散暂避。于是德即于一九二九年深秋，秘密携眷乘船东下，暂居于五原县察汗淖的堂姊诺月朋家。

一九三〇年春，德钦一心诺尔布携长子罗景瑞前往北京，不幸在居京期间，有一天到戏院听戏，巧与塔旺布鲁克札勒相遇，德父子立即离去，于当日乘京绥线火车到归绥市，住附近小旅馆，却不知塔王已派人尾追，第二天即被罗·巴图孟和（陈莽哈赖的女婿）等人报告归绥市警察局，并花钱联络将德父子扣捕，拘禁于舍利图召西小院。德被囚禁后，曾托一喇嘛给绥远省主席李培基送去一信，请予开脱。李开始曾不准罗等将德父子解走，只是让德找保，但其后罗又花钱运动李的秘书向李说：“德毅忱系红党分子，并非国民党人，在阿拉善旗闹革命，犯下了推翻札萨克的大罪，应解回本旗发落。”因此李对此事便不予闻问，德父子即被罗等押回阿旗。

德回旗后，阿旗统治集团和一些极端复仇主义分子，对德备加凌辱，多次施用酷刑审问，到一九三二年七月，塔旺布鲁克札勒已死，其子达理札雅从北京运灵回旗并执掌旗政，即将德以叛变头子的罪名，处以无期徒刑（实即变相的

死例)，监放于巴丹吉林巴格的查干高勒庙。德自被捕后，受尽摧残，体力极端衰弱，终以惊恨成疾，病饿而死。德死后，阿旗统治集团为斩草除根，又将其年仅十四岁的长子罗景瑞，派凶手亲卓尔格枪决于拐子郭勒卡伦。

孟雄自一九二九年秋离开宁夏后，迄今杳无消息。田协安则天南地北，到处流落，直到阿旗解放后，才得重返故乡，并得到党的关怀，被邀请为巴彦淖尔盟政协委员。齐米德爱林岑则因多年受阿旗统治集团的歧视与欺辱，于解放前郁郁而死。

“小三爷事件”始末

罗永寿

“小三爷事件”，在阿拉善旗的历史上，是一个较为重大的事件。它的发生与发展，曾经震撼过全旗。现在先将发动这次事变的几个主要人物加以介绍：

“小三爷”，蒙名德钦一心诺尔布，乳名勇格，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的贵族家庭。他父亲嘉伦春旺吉勒，是阿拉善旗第六代亲王多鲁特色楞的三弟，幼年时期，曾被选充为南寺（广宗寺）的活佛，执掌着本旗的宗教。因他是当代王爷的三弟，颇能干预政事，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人们称之为“三爷葛根”。后来因家庭关系，自愿还俗，并娶妻置妾，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齐米德爱林岑，人称为“任大爷”，次子名恩克布音，人称为“知二爷”，三子即德毅忱，因和他父亲在兄弟行辈中均是行三，为了有区别，人们称之为“小三爷”。

德毅忱幼时在定远营（巴彦浩特）私塾读书，学习蒙、汉文，在当时蒙旗文化教育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他算是一个贵族的知识分子，为人态度和蔼，没有王公贵族的臭架子，因此群众对他印象很好，愿和他接近。

在他父亲去世后，他们弟兄就分居另过，他分有果园一

处、土地三百余亩、铺房一百余间，此外还有一部分牲畜。他依靠这些地租房租等收入，过着不太特殊的贵族生活。在当时，他还充任梅林副章京职务，但生活散漫，经常不到旗衙门办公，遇有待商的大事，必须派人请他才去参加，因之为当权派章京陈莽哈赖所不满，并加以排斥，而他也就随着成为一个虚有其名的游离于封建统治集团之外的贵族人物了。

尽管如此，他仍没有被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军阀们所遗弃，仍对他接二连三地赐爵封官。如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对他赐爵为辅国公，本旗塔旺布鲁克札勒曾先提升他为管旗副章京，到了发动事变的前两天（民国十七年阴历三月初一日），还晋升他为本旗的正协理。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对他还是相当器重的。但是一方面由于他习于懒散，有一定的缺点和弱点，一方面又由于陈莽哈赖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千方百计地要排斥他于统治集团之外，使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因之，他在旗里也就长期地成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了。

孟雄，号志停，他原是甘肃省秦安县的回民，因在原籍打死人，畏罪潜逃到定远营。他原业裁缝，来定远营后，仍操旧业，因他技术高，深为本旗正协理四公爷所喜爱。同时他又善于阿谀逢迎，对四公爷极尽恭维，这样就很快地取得了四公爷的信任，在四公爷的大力支持下，不仅加入了阿拉善旗籍，具有蒙民的资格，同时还抛开了裁缝职业，走进了本旗的衙门。更由于他钻营得法，应付裕如，没有几年，就飞黄腾达地充任阿拉善旗梅林兼听差处“达尔嘎”（审判官）等职务。后来他又和当权派陈莽哈赖有了勾结，陈对他

也非常倚重，这就越加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从而将本旗的对外联系和处理汉族人民事务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树立起他自己在旗内的威信。同时他还在定远营三皇庙组织了“在理公所”的迷信团体，宗旨为戒烟戒酒，每月初五、十五，他都亲往该庙磕头烧香，吸引了定远营人数较多的小手工业者群往参加，也就更加强了他的群众基础，使他在本旗的地位，更趋稳固。

罗敖有，蒙名嘎宁嘎，出身于阿拉善旗的贵族，人称之为敖云台吉。他自幼在旗衙门印房学习，及长精通蒙文，擅长武术，还会修理枪支，由于他才能出众，极为塔王所赏识，由一般笔帖式提拔为副梅林章京，从此便名闻全旗。民国以来，由于连年军阀混战，枪支散落民间很多，给土匪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本旗邻近河套，那里的“哥老会”、“独立队”又经常窜扰，因此本旗为了防范匪祸，曾组织蒙旗部队，分驻于磴口、四坝等沿边四十多个防卡中，以便防堵。罗敖有也就于此时担任了全旗兵营“达尔嘎”，执掌着全旗的军事大权，地位更为重要。但到后来，由于他习惯于生活享受，沾染有极深的鸦片烟瘾，经济便经常入不敷出，生活比较困难。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罄其家产，购买大批烟土，偷运北京贩卖。不料此事为塔王侦悉，立即加以阻止。而罗敖有此时已处于孤注一掷的地步，竟置诸不顾。因此激怒了塔王，将他的全部烟土没收。这一来他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造成家产荡然，生活愈陷于绝境。从此对塔王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怨恨，并图谋伺机报复。

罗性喜狩猎，并以狩猎所得，作为一项经常收入。一九二六年冬，从事蒙古革命运动的郭道甫（蒙名米立赛），来

定远营宣传革命，他便与郭道甫相识，经常在一起打猎游玩，由于彼此相处日久，使他受到郭的感染较深，对革命有了认识，便由对塔王个人的怨恨，发展成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开始积极地进行反对封建制度的活动。

田济，号协安。是阿拉善旗一个蒙、汉文皆通的知识分子，善画佛像，又精岐黄之术。他父亲曾跟随道王当差，充任王府“包衣达”职务。由于这种关系，他也在王府当差，常随塔王到北京居住。北京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对政治思想和时代潮流，能得风气之先，他那时正在壮年，又有一定的学识，便因之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吸收了许多新鲜事物，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印象较深。以后他又和郭道甫相识，并去过蒙古人民共和国，与那里的人民革命领袖苏和巴特尔会见过（这是他自己谈的），思想受到的启发更大，因此他在当时具有强烈的革命愿望。

兹再就“小三爷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其失败情况叙述如下：

“小三爷事件”虽发生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但其酝酿活动，却在很早以前。由于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明文确定了蒙古的藩属地位，承认了蒙古王公制度的合法，历任当权者亦均未触动。因之，阿拉善旗的封建制度，也一仍其旧。在当时札萨克为塔旺布鲁克札勒，他平时即喜住北京，并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以后再未回旗，不仅因在京开支浩繁，一切由旗内供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因不亲政事，致旗政大权旁落于东协理罗·那木吉勒、章京陈莽哈赖两人之手。这两人是守旧派，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

益的忠实人物，又是亲戚，彼此结合得很紧密，不容许外人插进手来。因此在他们执政期间，一切更顽固保守，使阿拉善旗经济文化的落后，人民生活的恶化，愈为加深。而此时国内外的革命思潮，又到处传播，在这种影响下，阿拉善旗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封建统治集团中一小部分有政治头脑的人物，莫不以改革本旗的封建统治现状为当务之急。虽然由于当权派的各方面压制和排斥，未能早有表现，但却逐渐促使德毅忱、罗敖有、孟雄、田协安等人结合在一起成为革新派。这些人认识到当权派是顽固的，保守的，却又是势力强大的，如只靠革新派本身的力量来实现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除了积极培养自己的势力外，并秘密向各方进行活动，寻求外援。终于在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和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建立了联系，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吉鸿昌系冯玉祥的部下，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冯军在京津战争后，由南口退往西北，途经阿拉善旗所原的磴口巴格时，即在该处设立兵站，到宁夏后，将宁夏改为省制，将在磴口巴格所设的兵站，改为磴口县，划归宁夏省管辖。阿拉善旗以属地无端被人分割，是一个重大问题，即派孟雄前往宁夏交涉。此事未了，冯军为转运军事物资，又给阿拉善旗摊派骆驼七千只，旗衙门也责成孟雄一并交涉。经过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但孟雄在此时因和吉鸿昌经常接触，却就改革阿拉善旗政治问题有了契合，这不能不说是革新派的一个重大收获。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吉鸿昌借口办理冯军经阿拉善旗境内的转运弹药事宜，派旅长赵景文率领二十余人到定远营驻扎，名为负责转运，实际是要扶植革新派活动。赵为

人狡猾而圆通，他到定远营后，一方面在暗中积极培养以德毅忱为首的革新派势力；另一方面却又和守旧派勾勾搭搭，拉拢关系。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被吉鸿昌发觉后立即调回，改派姚连榜（号甲三）来充任监督，负责进行支援革新派的活动。

姚连榜为人手段辛辣，态度蛮横，对一切问题的处理，是大刀阔斧，毫无顾忌。他来后曾设宴请客，本旗正协理罗·达希道尔吉前往赴宴，在回来后即身死，人们都传说是姚用药酒毒死的。因此引起守旧派的怀疑。有人曾劝陈莽哈赖严加防范，但陈不以为然，漠然置之。其后梅林副章京黄·图门巴雅尔，为了预加防备，将库存枪支发给一部分亲信人员。陈回旗后，反认为多事，立即将枪支收回入库。黄因此愤而返回雅布赖巴格家中，并在牧区组织人丁，准备应变。

此时革新派已处于箭在弦上不能不发的形势，尽管在阴历三月初一日，塔王正式任命德毅忱为阿拉善旗正协理，但由于德、陈之间积怨太深，如同水火，同时德又为部下所挟持，势成骑虎，而守旧派陈莽哈赖的麻痹大意，更使革新派认为有可乘之机。于是革新派便决定发动政变，经德毅忱召集同志和姚连榜的部下共有一百余人，于民国十七年阴历三月初三日，向旗衙门进攻，由于守旧派疏于防范，没有遭到多大抵抗，就顺利地占据了整个定远营，取得了阿拉善旗的政权，并同时逮捕了守旧派头子陈莽哈赖。

革命成功后，革新派在定远营采取了以下各项措施：

第一、将逮捕的守旧派头子陈莽哈赖于三月初六日执行枪决。

第二、解除旗衙门原有蒙古兵的武装，遣散他们回家，另组织以定远营商团为主的新兵武装。并根据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吉鸿昌已调）的指示，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军司令部，下辖两个旅。由德毅忱任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其尔任第二旅旅长，姚连榜任监督。镇国公塔旺策林（八爷）、镇国公朱格瓦其尔（南公爷）均被聘为顾问。辅国公齐米德爱林岑（小三爷的大哥）任军需处长，副管旗章京罗·巴音都伦任参议。

第三、在定远营城门口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胜利。会上由田协安代表革新派向群众宣布“代表封建制度的塔王政权已被推翻，由德毅忱领导下的民主、自由的新政权宣告成立”。

第四、为了表示反封建，向全旗宣布今后不准再留辫子。

但随着胜利而来的革新派的弱点，在短时间内也暴露出来了：

第一、他们把军事活动仅限于定远营，而不乘胜前进去占领三十六个巴格及四十多个防卡。以致广大牧区，仍然在守旧派统治之下，使本身陷于孤立。

第二、他们提不出一套完整的施政纲领，新政府究竟要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法令，连他们自己内部也不知道。虽然也提出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不准留辫子等口号，但仅仅是空洞的号召，或者是“不急之务”。

第三、没有群众基础，得不到牧区广大人民的支持。他们事先既没有在牧区进行过革命活动，事后又没有展开宣抚工作，去解决牧区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中的疾苦，以致他们

的行动，便多为群众所误解或不能接受，而失去同情和拥护。

第四、参加新政权的领导人，多数是封建统治系统中的上层人物。除塔王未列名外，所有阿拉善旗的镇国公、辅国公、章京、梅林等人物，都参加了新政权的领导，使人民很难区别新政权与旧政权有什么不同。

第五，内部不和走向分裂。姚连榜在政变成功后，更加趾高气扬，跋扈自恣，不服从德毅忱的领导。他首先劫掠了旗衙门和王府的底财，价值银洋五十万元之谱（其中银元十三万元、鸦片一万余两，还有其他财物等），名为上交，实则尽入私囊（完全由姚父掌握）。其次他还在定远营公开放赌，吸食鸦片，奸淫妇女，并强迫德毅忱的侄女三姑娘给他作妾，使德反感很深。尤其是纵容部下在定远营城内外奸淫掳掠，作践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德、姚之间有了裂痕，连定远营的群众，也因此对新政权开始离心离德了。

由以上各点看出，新政权显然是先天既弱（缺乏群众基础）后天又亏（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再加上守旧派在牧区对新政权进行了恶意的诽谤和造谣，以致广大群众不仅不同情和支持新政权，反而加入了守旧派的行列来反对他们。如当时牧区对新政权的说法是：“德毅忱叛变塔王，出卖阿拉善旗”，特别是听到姚连榜劫走旗衙门的财物和放纵部下奸淫掳掠的种种行为，更惊骇万状，并认为“东军”

（当时牧区称冯军为东军，称姚连榜为东军头子）见人就杀（特别是蒙古人），见物就抢，见了妇女就奸淫。因此人心惶惶，东逃西奔，不仅沿贺兰山一带的各巴格居民逃避一空，甚至居住在定远营城内的蒙民，也纷纷外逃，有的逃往

北部地区，有的逃入大沙窝里。

这种情况，正给守旧派造成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人们惶恐和激愤的心情，便在各巴格策动和组成武装部队，向新政权进攻。南部各巴格，由毛·巴图尔、范·布尔格德、杨·巴图孟柯等人组织和率领，截住了从三关口通往宁夏的要道，并从南面包围定远营。沿贺兰山各巴格，由杨·嘎瓦组织和率领，以贺兰山为基地，封锁了从樊家营子山区通往宁夏的小路，并逐渐地逼近了定远营附近。北面巴音乌拉和紫泥湖一带九个巴格，由巴图赛迪组织和率领，以紫泥湖为基地，从北面包围定远营。其他较远的宗别立巴格、克白尔巴格，由宁武、贾朱叶等人组织和率领。此外还有雅布赖等巴格的队伍，也都纷纷集结在定远营的附近，准备进攻。

这些武装部队到达定远营附近后，共推原旗衙门副章京黄·图门巴雅尔为首领，形成了以守旧派为领导的反抗新政权的牧区联军。在经过一番整顿和部署后，便于四月初八日向定远营城展开总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由于牧区联军一方面缺乏洋枪（其中多半数是土枪），武器不利；一方面牧民战士们，没有攻城经验，进攻的方法不对头，所以没能攻下定远营。于是牧区联军即改变战略，重新部署，将队伍撤退至南北寺，建立据点，并分设防哨，从四面包围定远营，准备作长期的“死困”。

在定远营开始被围后，德、姚曾请门致中派兵解围，门当时即从宁夏派一个步兵营，由彭营长率领，经三关口驰赴定远营援救，但行至中途，即被预先埋伏的南部各巴格的武装队伍击溃，狼狈而逃。其后，门又由河套调苏雨生的一个骑兵旅赴援，由镇木关越过贺兰山，冲破了牧区联军的防

线，进入了定远营。从此城内防务加强，人心渐趋安定。

这时牧区联军一方面看到城内的援军到来，力量增大；一方面又看到自己内部存在很大的弱点，必须扭转。这个弱点，是由于他们的部队虽有消灭“东军”和推翻新政权的共同目的，但却是从各巴格凑合起来的，互不隶属，各自为政，谁也不愿意听谁的指挥，形成为“乌合之众”。因此要集中力量，克敌制胜，就必须扭转这一点，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于是牧区联军便派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原本旗参领白和尚，与居住在北京的塔王取得联系，在巴音乌拉 的裁立毛登地区，组织了阿拉善旗临时政府，将所有各巴格的武装组织，统归临时政府领导，并以临时政府的名义指挥战斗，这样才统一了联军的行动，加强了军事部署，向定远营发动了新攻势。

到了旧历六月上旬，牧区联军便向定远营展开第二次进攻。在这次进攻中，由于临时政府的统一指挥，步调一致，虽未能攻下定远营，但却已逼近城垣，紧紧地包围了定远营，使城内新政权的部队，再也不能出城活动。

至此，新政权便面临着以下的情况：

第一、在联军围城后，城内人心涣散，军心动摇，居民纷纷外逃，所招募的商团兵，除战时牺牲者外，其余也大部分东逃西散。城内秩序及防守任务，全靠苏雨生的队伍维持和支持。并因与宁夏的联系被切断，逐渐陷于弹尽援绝的境地。

第二、新政权所凭借的唯一靠山冯军，此时因主力部队进入潼关，在宁夏一带，已无兵可调，不能支援。

第三，在新政权的内部，有部分人因兵临城下，对新政

权失掉信心，或者逃走，或者投敌，甚至德毅忱的骨干分子和亲信人物罗敦有，也投降了临时政府。

第四、站在新政权幕后的支持者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因爱莫能助，认为困守无益，促使新政权在有利的条件下，与临时政权进行和平谈判。

第五、居住在北京的塔旺布鲁克札勒，迭向南京政权和蒙藏委员会提出立即制止门致中在阿拉善旗的军事行动，撤走苏雨生部队，恢复阿拉善秩序，赔偿已被劫走的财物等四项要求。蒙藏委员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从中进行调解。

基于以上情况，新政权内外交迫，万难维持，接着门致中又派米于长东为居间人，准备在有利于新政权的条件下，促成双方谈判。新政府在此时只好顺从，却不意于为人老奸巨猾，唯利是图，在他来后，摸清了双方的情况，竟不按门致中的意图办事，倒向了临时政府方面，全心全意地为塔王效劳，从而把这一新政权无情地摧毁。他的具体作法是：

(1) 以门致中的名义，将姚连榜扣捕并押解宁夏。(2) 解除德毅忱的武装，移交临时政府。(3) 迫使苏雨生部队撤离定远营。(4) 胁迫德毅忱、田协安、孟雄等人随军撤走。

新政权经过于长东这一番处置后，便告结束。计自旧历三月初三日发动政变起，至被于长东强迫解散为止，共存在了七个月。

圆滑善变的于长东，不仅全力摧毁了新政权，更积极协助守旧派恢复封建统治的旧秩序。在新政权瓦解后，由于塔王远居北京，旗衙门无人负责，于长东便出面召集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员和带兵“达木尔”开会，研究旗衙门由谁负责的

问题。经过多次商讨，最后一致推举南寺（广宗寺）活佛“喇嘛爷”暂时护理印务。会后即派塔旺策林（八爷）、商会负责人姜子苗、赵双才等人请“喇嘛爷”出山，正式就职。

“喇嘛爷”在就职后，即派人到北京向塔王汇报旗内情况，并要求迅速指派负责人员共管旗政。塔王即下令委派罗·巴音都伦为协理，白和尚为管旗章京，杨·呢玛敖其尔为管旗副章京，受“喇嘛爷”领导，分管旗政。从此，曾一度摇摇欲坠的封建制度，在守旧派与军阀、政客的通力合作下，转危为安。“喇嘛爷”在阿拉善旗执政五年，迄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旧历六月初四日上午九时止，才将政务移交给札萨克达理札雅掌管。

于长东的叛变行为，为门致中切齿痛恨。曾下令四处缉拿，使于不能在阿拉善旗容身，由旗府护送至北京躲避。至门致中离开宁夏后，于长东才回阿拉善旗，并担任旗府秘书长，一直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死去为止，这也是对于的酬庸。

德毅忱撤到宁夏后，仍受到门致中的器重和支持。除继续保持他的司令部番号和职务外，并拨发银洋两千元，作为招抚流亡人员经费，使他重整兵马，等待时机，仍返阿拉善旗。但这时德毅忱已志气颓丧，认为前途暗淡，恢复旧业无望，终于在领取两千元银洋后，即携带眷属，来一个不辞而别，由宁夏乘船径赴包头。此后寄居归绥，过着流亡的寓公生活。

德毅忱走后，田协安、孟雄等人，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况，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亦均分道扬镳，逃亡他处。德毅忱

领导的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失败后的德毅忱，避居归绥，只求全身远祸，已无力东山再起。但凶狠成性的阿拉善旗的守旧派，却把他恨入骨髓，欲杀之而后快。因此侦骑四出，查找德的行踪。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五月底，陈莽哈赖的女婿罗·巴图孟和，在归绥城发现了德毅忱，不禁喜出望外。一方面立即向归绥市警察局报告，并花钱活动将德毅忱及其长子罗景瑞一并予以逮捕监禁；一方面向北京的塔王请示处置办法。经塔王指示是：先将德毅忱押解本旗，俟塔王返旗后，再行处理。

在德毅忱由归绥解回后，阿拉善旗的守旧派和一些极端复仇分子们，如获至宝，他们对德备极凌辱，曾用酷刑多次进行审问，最后加以叛变头子的罪名，把德流放于阿旗南部图兰太巴格所属的查干高勒庙上。这时德毅忱因屡遭摧残，体力不支，终于惊恐成疾，于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阴历六月上旬，病重死去。

德毅忱的长子罗景瑞，年仅十六岁，对当时政变，童子何知？但穷极凶狠的守旧派，为了斩草除根，竟派亲卓尔格把他枪毙于阿拉善旗北部的古鲁乃湖畔。

此外，守旧派对于曾充第二旅旅长的敖其尔和变节投降的罗敖有，也不容留。在当权人物罗·巴音都伦、范·布尔格德、罗·巴岱等人的主持下，又把这两人枪毙在定运营北边的头道沙子里。罗敖有的变节，原冀苟全性命，却不料最后仍暴尸沙砾，这也是他应有的下场。

“小三爷事件”的主要人物，现在仅存者为田协安。他自政变失败后，东飘西泊，浪迹天涯，直到解放后，才得返

本旗，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下，重建家园。他现已年逾古稀，在巴彦浩特以行医为业，并担任巴盟政协委员。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小三爷事件”的经过始末，其中不免有遗漏和乖误，尚请读者补充和指正。

准格尔旗魔王纳森达赖的生平

奇天祥

读了《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纳森达赖在准格尔旗”一文以后，给我启发很大。纳森达赖是统治准格尔旗二十多年的一个暴君，这是当时西部蒙旗皆知的事情。他历经清朝、北洋军阀以及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各个时期，他的那一套对内对外的残酷手段，应该从多方面加以揭露。现在就我国回忆的片断材料，综合补充，借供参考。

—

纳森达赖出身于准格尔旗一个贵族（台吉）家庭。但他早年家道中落，生活无着，在青年时期，也出卖过自己的劳力，赶过牛车，种过庄稼，他曾穷得在数九寒天穿着捉襟见肘的破皮袄，还得披星戴月替人家赶车。以后因机缘凑巧，他居然住了准旗衙门。准旗的衙门等于王爷下面一个“内阁”，东西协理等轮流值班，管理旗务，经常住有大小先生（即顶木齐）负责旗内文书资料。每一个台吉的家谱档案和全旗蒙人的户口，都在衙门里保存着。他在衙门工作，得以稍通文墨，懂得一套封建礼节仪式。在封建王公连文化知识也都霸占了的情况下，他能有了一些文化知识的皮毛，再加

上他贵族的出身，算是当时难能可贵的“人才”了。他还有一套逢迎拍马的本事，于是，很快地就青云直上，由小先生、大先生、梅林、“加克尔齐”，一直爬到东协理的高位。最后利用王爷喇嘛三爷的庸碌软弱，竟掌握了准格尔旗的实际大权，施展其狠毒阴险的手段，屠杀无辜人民，成了全旗最凶恶的统治魔王。这也不是偶然的，他能苦干、踏实，不贪烟酒嗜好，精神充沛，一直到他被杀死为止，始终能保持早起的习惯和事必躬亲的作风。这也是他能完全集中精力，将准格尔旗军政大权牢牢抓住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他奸谋百出，诡计多端，善于掌握时机，利用他人弱点，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他担任“加克尔齐”时，最初和他争夺政治地位的是“和硕齐”（王爷最近的支裔）赛成嘎。在老盟长（准旗王爷那时因替清朝出征马化龙回民起义有功，升为伊盟盟长）逝世后，老盟长的两个尚清室郡主的三爷、四爷早死，王位属谁，便成了仕官们争权夺利的焦点。当时血统相近的只有两人，就是已经出家当了喇嘛的老盟长的亲兄弟喇嘛三爷，另一个是老盟长的侄儿赛成嘎。纳森达赖联络旗内最有权威的西协理丹丕勒，极力拥护喇嘛三爷，打算把这个六十衰翁、性情和善的老喇嘛拥护出来，以便于控制。但那个每日贪图烟色、颠倒阴阳、吞云吐雾的赛成嘎，也不甘让位，纠合土匪刘三林、刘四林，扩展力量，专门和纳森达赖寻仇作对。勾引土匪，祸害人民，是旗内人所共忿的，因而在赛成嘎率这些匪徒攻击纳森达赖的住所——杨家湾时，遭到准旗军民联合反击，赛成嘎失败奔向呼和浩特，控诉纳森达赖，这时纳森达赖积极笼络两个守寡的郡主“三奶奶”、

“四奶奶”（她俩都是清室亲王的女儿），四奶奶是当时清室最有势力的定王的女儿，说话最有力量。况大局已定，喇嘛三爷已登上准旗王爷的宝座，赛成嘎的控诉必定失败无疑。赛成嘎失败后，流落在外很长一个时期，不敢回来。这时准格尔旗出现了绥远将军贻谷放垦和丹丕勒武装反抗放垦的事。

贻谷放垦，伊盟各旗王公都不敢公开反对。软弱的准旗王爷——喇嘛三爷在准旗内奸“葛老爷”（我记不起名了）威吓下，反而同意了开垦准旗白界黑界地（放垦后的命名）。这时自谓忠直的纳森达赖却守起中立来，他坐山看虎斗，有意识地想用外面的力量来消灭自己最畏惧的丹丕勒协理，树立自己的权势。古道热肠的丹丕勒，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勇气，坚决反对放垦准旗的土地。最后贻谷派军队武装放垦，丹丕勒集合了数十个坚强的战士，持着窳劣的武器——火枪、弓箭，反抗持有快枪的清军。他寡不敌众，败退到他的家乡——准旗东部“四十队”，依靠险要的山地，防守数月之久。最后，还是在大年三十日晚上，丹丕勒麻痹大意（都去拜年接神，酒醉颠倒的时刻），让贻将军的军队乘虚而入，才俘虏了这个赤红脸、白胡子、年近古稀的刚强不屈的人——丹丕勒，接着捆送呼市杀害了。以后清朝为了平息众忿，将贻谷撤职查办。这时纳森达赖也以“爱护准旗土地”的面孔出现，将洋洋得意的“葛老爷”明正典刑，以博取准旗军民的同情。这是纳森达赖投机取巧的第一个步骤。

流亡在外的“和硕齐”赛成嘎，认为时过境迁，没有什么事了，自己又回转府内（距大营盘王府二、三十里）。事为纳森达赖侦知，星夜带兵赶到“和硕齐”住所，包围攻

打，直打到次日上午，纳森达赖宣称系奉王爷“命令”而来，于是赛成嘎的许多兵丁不敢抵抗，穿着整齐袍服，出去迎接纳森达赖，表示不敢违抗“王命”。纳森达赖对已缴枪的士兵和抗拒的“和硕齐”，一律下令杀死。另外特派旗内刚成立起的保安队，追剿刘三林、刘四林到萨拉齐山根底而消灭之。纳森达赖消灭了这帮土匪，不仅得到百姓们的赞扬，还得到绥远将军贻谷的奖励。至此，纳森达赖的东协理弄到手，更进一步施展其权谋，喇嘛王爷就逐渐成了他的傀儡。

当喇嘛三爷脱离“僧籍”登上王位时，年已衰迈，但还要留辫子、娶夫人。辫子的事好办，做一根假的就行了。娶夫人生子传代确有困难，但也解决了，衙门上特为选出一批妙龄女郎，由老喇嘛王爷亲自选择，一个住在准旗的西公旗姑娘被他选中了，当了他的福晋。红颜白发，夫妻寡欢，不久王爷府的乌管家便成了福晋的入幕之宾，一年以后，居然生下个小王。这事情使纳森达赖大为震怒，声言要惩办乌管家，但老三爷不同意，认为张明打鼓，会引起未来继位的麻烦。加上乌管家暗中又托人向纳森达赖疏通，才将这件“宫韩”之事压下。在这一时期，纳森达赖为取得准旗人民的拥护，处处表示出自己是公正廉明的清官，他装得很象那么回事，确实博得准旗一部分人的赞扬和拥护。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袁世凯在北京召开了蒙旗王公会议。准格尔旗喇嘛王爷平日只知诵经礼佛，对旗内政务从不过问。加上革命后谣言四起，他不敢赴京参加会议，只好派当时负旗内实际责任的纳森达赖代表出席。当时袁世凯为笼络蒙旗王公，都是“官加一级”，纳森达赖也取得了一个“辅国公”头衔。这就激起了他攫取王位的欲望。

不久喇嘛王爷逝世，嗣子尚在襁褓，纳森达赖就有恃无恐地揽起旗内大权。西协理、“加克尔齐”抵不住他的威势，都表示退让。那时准格尔旗大种鸦片，收入大半入了纳森达赖的私囊，他的狰狞面孔也逐渐露出来了。西协理种的几亩鸦片，纳森达赖还借口养兵费用大，硬逼他缴税。这使这个老朽昏庸的同班人也冒火了，对纳森达赖说：“你收全旗烟税，我种的仅这么一点，你还不饶过？”纳森达赖认为威风既然立下，对同僚也不能压制过分，也就适可而止了。

二

纳森达赖自从喇嘛王爷死后，独断独行，排除异己，举凡财政、人事和军队调遣，悉揽在手。那时准旗普种大烟，收入极大，他想趁自己大权在握的时机，立下万世之业，用大车拉上白洋二十四万，准备向北洋军阀政府买得伊盟盟长之位，盟长购买到手，准旗王爷自然就可以由他承袭了。假如他仅仅图谋准旗王位，对幼主就难处理，而且也容易引起旗内外反对，攫取到盟长，则在伊盟全境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如意算盘虽打得不错，但伊盟盟长是各旗争取的职位，各旗王公以纳森达赖“不是准旗王爷，决不能担任盟长”为理由而加以抵制。

盟长没弄到手，运去北京的白洋也没有多化出去。他的二儿子奇子俊却用这笔巨款，在北京花天酒地，广为结交，因此认识了于右任，并赠于二千元。后来于右任当了“监察院长”，奇子俊就当了“监察委员”。

现在再介绍一下纳森达赖的大儿子。这位公子当时凭借

他父亲的势力，曾和一个有夫之妇姘得火热，一日为本夫所遇，打起架来，大少爷用手枪击杀了他的情妇的丈夫。当时纳森达赖还正在收定人心，而且他的势力还没有发展到以后那么大，所以此案发生后，他还把他大儿子“押起”，一面察看死主家动静，一面暗中派人活动，准备了结这件官司。但此案了结不到一年，这个纨绔子弟居然升成了“梅林”，这位梅林从不过问政事，只在家中享他的“清福”。有时高兴起来，便升堂打人，府内居然有人称赞他好“堂口”（就是严刑审问人）。

奇子俊虽是个花花公子，却颇能活动，因他年轻、思想“单纯”，接受当时民国以来的“革命潮流”也容易，他居然和当时西北的冯玉祥挂上了钩，冯和苏联有来往，并得到苏联的支持，奇子俊也以“内蒙古革命人物”的名义去了次库伦，并领回五百支俄式七七步枪（准旗人叫水连珠枪），奠定了准旗保安队武装力量的基础。奇子俊还娶了一位“库伦太太”。冯玉祥为发展蒙旗力量，对奇子俊极看重，任他为骑兵团长，让他在准旗发展军队。他在准旗征集了新兵六百多人，开始在沙圪都（现旗政府）训练。不久为了应援冯玉祥，他指挥准旗新旧军进攻山西。在集合军队出发攻打河曲时，纳森达赖亲自给部队“训话”说：“现在你们要放下准格尔旗这一碗饭，去吃山西的那一碗饭了。省下自己的东西，准备以后再用，这是最好的过日子的办法。”这是纳森达赖鼓励准旗弟兄替他夺取地盘的话。奇子俊虽然攻入河曲，但冯玉祥的大军整个向西撤退了，准旗部队也不得不撤回旗。奇子俊直接指挥的四大连，多数军官是外地汉人（因他们多少明白些军事基本知识，担任了连排长以及教官

等职），多数人和晋军有联系，在由河曲败退中，沿途划下准旗保安队退兵方向的暗号，使晋军李德懋部跟踪深入准旗腹地。旗内好多地方都被晋军占领，奇子俊仓皇退兵到准格尔召（在准格尔旗最西部地区），不久，他扔下军队到宁夏向冯玉祥请示去了。纳森达赖亲去见李德懋，这时间锡山也不愿结怨蒙旗，派人和纳森达赖订了互不侵犯的协议，撤退了李德懋师。

纳森达赖遭此一役后，也深深懂得卷入军阀内战，对他统治准旗的地位是有危险的，因此他以后极力制止奇子俊扩展地盘的野心。

奇子俊到宁夏后，冯玉祥认为他忠实可靠，有号召力，又委他为“蒙边第一路司令”，由原来的上校晋级到中将。在他还未回来整编部队时，就发生了王英的“三十一军”进攻准格尔旗的事。

一九二八年王英的“三十一军”开往河曲，借口准旗蒙兵不让通行，向准旗发动了进攻。此时准旗早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的原住处准旗新召湾，在准旗高龙渡口南边附近，传播来的消息也最快，人们都很害怕。谣传说：

“满泰、王英，还有晋军都来打准格尔旗”，准旗蒙族人民都已收拾好武器（准旗人民一般都有武器）、鞍马、车辆，携带着全家老小准备随军南逃。一个个含着眼泪，咒骂军阀不让准旗蒙古人活。那时我父亲已逝世，母亲是土默特旗人，不愿南逃，和我叔父（那时我叔父奇凤鸣是准旗河北岸防区的一个连长）商议好，协同我婶母暂到萨拉齐县银匠窑子，依靠天主教堂外国神父的势力避难。但王英对我们这些寡妇和幼儿也不放过，他派了一个副官，带着²一部分兵

了，借口到银匠窑子征粮，闯入城围，闯入我们逃难的刘家，把我们请了“财神”。我们携出去的几代财产，都让这批土匪席卷而去。留在准旗的蒙汉人民，同样遭到了王英土匪军队的掠夺和抢劫，事后成了十室九空，许多房子也化为灰烬。准旗的一千二百人的保安队哪能抵住王英的数千之众，尤其其他那几门山炮，轰击得准旗弟兄们闻风丧胆，一直溃退到准旗西南部，才凭借山岩等险要地形，阻止住王军的进攻。在最后一次战役上，我叔父奇风鸣率领的百十多个“河套川人”（准旗河北岸人被称为河套川人），在最前线击退了王英军，使其再不敢前进。因此，我叔父由连长升为营长，继又升为团长。纳森达赖将自己的“公爷府”事先就放了一把火，全化为灰烬，他退向准格尔召，向部队发表讲话：“王英来我们准格尔旗抢劫，那我们也去后套抢他的老窝。”这不过扬言威胁王英而已。

王英在后套时，与纳森达赖有交情，据说交情还非常之厚。王英的姐姐“二老财”，和纳森达赖亲热得形影不离。王曾向纳森达赖借了一笔巨款，以后在包头的一个公开场合中，纳森达赖向王英伸手要钱，两人争吵的结果就断袍割席，由密友变成了仇敌。王英说他受了纳森达赖的侮辱，立誓要报此仇，而他的土匪兵早就垂涎准旗的财富（因为准旗多年来从未遭受过土匪的蹂躏）。战争发生后，王英部队砸窖、抢粮，用车拉去的粮食和东西不计其数。第二年旗内大旱，饿死百姓不少，一部分人离乡背井，四处逃荒。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绥远大旱成灾，出卖儿女的不在少数，饿死的当然更多。我当时正随母寄食于萨拉齐县亲戚家，中间还有三天的绝粮呢。我还记得萨县死耗子那件“奇闻”；

一九二九年的秋天（日期我记不清楚了，总之是大旱以后的事），忽然街坊邻居传说城门外面死了数十万个耗子，都有伤痕。我邀了几个童伴，同往城外观看，确实死了不少耗子，尸积成堆，遍地血迹斑斑，惊奇得不得了。于是荒诞不经的神话，跟着传出来了，而且还有不少民谣。我记得一首是：“先死耗子后死兵，死了满泰死王英，城外的庄稼没一根……”。满泰是包头镇守使，萨县在他的辖区内，驻防的一个旅长是许文虎，他们和王英是同样的货色，可见当时人民对他们是如何痛恨了。

三

“三十一军”撤退了，内部的斗争也随之发生了。曾经拥护过纳森达赖的老“加克尔齐”阿拉腾札布（奇寿山的父亲），因未升任协理心怀不满。按封建规矩，担任协理必须由住衙门熬上去。当阿拉腾札布熬到“加克尔齐”时，正遇协理出缺，按理就可补升，纳森达赖却以代理札萨克名义，将他未住过衙门的年轻的二儿子奇子俊报准为西协理。阿拉腾札布因此非常气忿。“三十一军”侵略准格尔旗时，这个糊涂老人就和王英拉上关系，准备凭借王英的力量登上准旗的协理地位。王英也想利用一个准旗有名望的人来打倒纳森达赖，因而两个人一拍即合。阿在王英帮助下，准备成立部队，号召纳森达赖的部下归己。王英还给他派了个姓苏的汉人团长，协助他整顿军队。在当时的民族矛盾中，借助外人力量的准格尔旗全民所痛恨的，“和硕齐”勾引三、四林子就是前车之鉴。不久，阿拉腾札布在沙圪都召回一批纳森达

赖的部下，约二、三百人，他自己还有些爪牙，这时纳森达赖派人向他疏通，自称情愿让位。当王英由准旗撤退后，那些投降老“加克尔齐”的全部人马，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兵变”，他们攻入老“加克尔齐”的卧室，杀死了他。那个王英派来的苏姓团长，提了一口洋刀猛冲出去，在人海中乱劈乱砍，杀开一条血路，逃在一个沙圪都的小庙内，次日上午才被追捕往杀死。

不久，奇子俊回旗，成立了“蒙边第一路司令部”，我叔父奇凤鸣是第一团团长，托县的保安队长霍亮生为第二团团长，陕北府谷人李恭如是指挥这两团的旅长。招兵买马，准备配合冯玉祥进攻绥远，过一下绥远都统的瘾。但纳森达赖极力反对，怕再蹈攻河曲的复辙。以后乘奇子俊外出，纳森达赖借口准旗荒旱不能养过多的军队，裁撤新军，才把奇子俊的野心压下去。当时百姓们也不满奇子俊这种扩军抢地盘的野心，人民公开唱山歌说：“杨家湾修成归化城（在“三十一军”走后，纳森达赖不顾人民死活，又重修起他的杨家湾“公爷府”，用费当然摊在人民身上），二爷（奇子俊）调兵活杀人！”这也是老奸巨滑的纳森达赖不敢扩兵的原因。当时他在准旗沙圪都已设立兵工厂，能制造一般性能低劣的步枪和各种子弹，打算把准旗变成一座兵营，作为他们父子穷兵黩武扩大地盘的本钱。

纳森达赖的准旗保安队，在旗内因为非亲即友，纪律还好些，一出旗境就变得非常凶悍，对老百姓非打即骂，踹马铡草，要肉要面，有时借口通匪，敲诈讹骗，无所不为。他们父子反而袒护部下，借以维持在军队中的威信。因此，边境冲突，民族矛盾，旗县纠纷，在当时不断发生。如与陕西

府谷县的边境冲突，纳森达赖非要攻打哈拉寨（府谷靠近准旗的一个镇子）不可，仕官们跪地阻止都不成。最后由于他一个亲信“闯王”（我忘其名，这是他的外号）被打死，才把战事停下来。

四

纳森达赖外表上装得平易近人，勤俭朴素，以求赢得人们的信赖。有一次他在准旗河北岸鄯丹窑子唱戏敬神的盛会上，大谈其同情老乡疾苦的调子，劝人们不要抽大烟，不要嫖赌，看戏要少花钱，劳动一年，不能将这样辛苦得来的钱随意花掉，要积少成多，发愤当财主。但他们父子的生活，却穷极奢华，住的是带楼的砖瓦大院，内部装饰华丽炫目。他除继娶定王的七姨太外，还在河曲县花了五百块白洋娶回一个比他的姑娘还小的妙龄女郎，叫“二菊子”，在河北将军窑子娶下大地主的女儿“桃女子”，最后又打算娶党三窑子单和尚的女儿“梨女子”，后因他被杀身死未遂。他的好色爱财，出卖官爵，罚人坑人，抢夺民间年轻女子，种种罪行，真是擢发难数，最突出的是强奸明和堂的“噢肯”那件事：

明和堂是准旗召湾大地主的堂名，和我家住的最近，“噢肯”的父亲是准旗的梅林（他不是台吉贵族，按封建规矩，普通百姓在准旗最高只能升到梅林），逝世后遗有老母寡妻和一儿一女。儿子喇嘛保当时还很小，女儿“噢肯”，年将及笄，因艳名久扬，早为达拉特旗康王聘定。她因常到我家，呼我母亲“乍吉”（婶婶），我母亲是土默特旗人，

不会蒙语，她常能操准确的汉语和我母亲交谈。我因年纪比她小，她自称是我的姐姐，她那时是十七、八岁吧，的确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因此，纳森达赖的魔手伸向了她的确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因此，纳森达赖的魔手伸向了她，谁也无法挽救。纳森达赖对她，威胁利诱，无所不至，最后通过种种卑劣的手段，终于达到了罪恶目的。最初，纳森达赖住在明和堂，摆出大方而慷慨的面孔，赏给这个长工十元，那个管事三十元。当他达到目的时，逼着向这些人要钱，这些人因还不起钱，纷纷偷跑，使正在农忙时的明和堂不能收割庄稼。他对“噢肯”施展的手段更加残酷。有一次“噢肯”因躲他逃开，纳森达赖立逼着她的祖母和母亲追她回来。纳森达赖用手淫威吓着“噢肯”，要她说出“奸夫”的名字，否则要杀死她全家。吓得全家人跪在地上，叩头哀求，才令“噢肯”坐在炕上，脱掉长衣，纳森达赖用铁夹子夹住“噢肯”的胳膊，狞笑着问：“这样好受吗？”“噢肯”的胳膊上立刻流下鲜血来，但她还得含着眼泪，陪着笑脸央告：“我以后再不敢了，恕我年轻无知吧！”她到我家和我母亲谈到这事时，伏枕大哭不止。我那时的幼稚心灵中，恨不得千刀万剐这个“老公爷”。当康王娶“噢肯”时，她胳膊上的伤已成痂痕，我们都很顾虑。纳森达赖自用威力迫使她就范后，公然挟着她野游，几次去我家园子地，坐在草滩上，让她唱山歌，并带着她去河北鄯丹窑子村看戏。她每日陪伴着比她已死的父亲还老的纳森达赖，敢怒而不敢言。这样公开的行为，康王当然知道，因此在过门后康王对“噢肯”非常虐待，使她郁郁苦闷而夭逝。纳森达赖残暴蹂躏少女的事件很多，“噢肯”因为是已经许配给康王的，所以就更引人注目。

纳森达赖的贪财，愈老愈登峰造极。他对旗内的地主贵

族也不放过，许多人因此而倾家荡产，一无所有。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是他部下的一个连长，病重时他居然还看了一次，送来十两大烟，安慰我父亲好好养病，有什么困难他给解决，因此我们又向他借了十多石粮。但我父亲逝世后，他送的大烟和借给的粮，成了永远还不清的“饥荒”，利上滚利，到他死时，我家已欠下他一万八千多元了（当时一石糜子仅二元白洋）。到我叔父担任了西协理后，一笔替我们勾消了，这是当时在准格尔旗有权势的好处。

其次，他看见旗内谁家有个好东西，不分皂白，就强索去。后来准格尔旗的官僚也承袭了他这种做法很久。我父亲的河头好地他强买了去，跟我父亲的一个勇敢卫兵，他也征了去。“四十队”一个达尔古（和乡长差不多）有一匹走马，每次去“公爷府”交税时，在马臀部扎上一个小洋钉子，公爷要试骑时，总是一拐一拐地不如意，这使纳森达赖很奇怪，曾自言自语地说：“听说这个马走得很快，怎么有了这样毛病呢？”他始终没有发觉其中的秘密，才使这位达尔古保留下自己的骏马，未被“买”去。

奇子俊还有点进步倾向和一点正义感，不象他老子那样一心一意打算在财色上打算盘。奇子俊虽然有三个老婆，但在旗内的风流事还不太多，也没有处罚过任何人。用钱的时候，自然有他取之不尽的“老库”，用不着他直接剥削谁去，何况他有“大志”，看不起旗下这块“小地盘”（这是他向别人谈话时的口气）。他最大的好处是在准格尔旗设立了“同仁学校”，居然还培养了一批人。当时他对“同仁学校”确实很重视。他由外面请来一批优秀教师，工薪每月五十多元，这在当时是个了不得的数目字，尤其在旗下那个“小地方”。

但赚钱的几个教员，当奇子俊去南京就任“监察委员”时，纳森达赖借口旗内开支不敷，都打发走了。不过学校在奇子俊主持下，经费是充足的，完全官费，还有衣服等补助。学校一开始就设立了四班，由初小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约二百多人，都穿着整齐的制服，实行军事教练。可惜经过几次政变，学校时停时办，也就不如初办时那么有起色了。

五

纳森达赖父子们的死，是件大快人心的事，而且也是自作孽的必然结果。否则奇寿山一个书生，既无权又无兵，是不可能杀死手握军政大权、统治准格尔旗二十多年的这个魔王的。

奇寿山是老“加克尔齐”阿拉腾札布的儿子，自从阿被纳杀死后，他由宁夏逃到南京去上学，据说这是奇子俊搭救的，他在南京上学也是奇子俊补助的。过了几年，奇寿山经奇子俊再三邀请，且认为事隔多年，纳森达赖也年迈了，回到家乡作点事情，也是理当如此的。

奇寿山跟着奇子俊由南京返旗晋谒纳森达赖时，纳森达赖在表面上还表示一套倚重青年的假意殷勤，这不过是他毒辣手段的前奏，好多人都能理解的。他屠杀过旗内不少人，在表演上总是这一套。最特出的是在准旗和萨拉齐县借剿除“哥老会”随意勒杀人命那些事情上。当奉军汲金纯统治绥远时，他当了三个月的“剿匪司令”，他的残忍本性完全暴露无遗，将准格尔旗河北岸地区和萨拉齐一带的人民杀害死的不知有多少，罪名当然都是“哥老会”要造反。他坐在将军窑

子营盘里，每天指挥着能杀人的兵士，用几把鬼头刀轮流着杀人取乐，多数是不加审问，抓来立刻杀死。个别的倾家荡产，才幸存一命，最后还要施以肉刑——最少打五百板子送别。至于他秘密杀害部下的办法更多，有几个是他当面找来褒扬一番，说你有“才干”，委任某要职。他当时亲笔写了手令（他一般委某人，多半是随手写件手令就成），让你带去到哪个部队，实际这是你的“催命符”。有几个就是派在我叔父部队中担任“团附”的。有的人还趾高气扬地持着“公爷”（准旗人一般称纳森达赖为“公爷”）的亲笔信走马上任了，结果是送他到“鬼门关”。这样秘密处死的，多半是和纳森达赖家族中的姬妾有了暧昧的人。

奇寿山和纳森达赖有世仇，纳森达赖当然不会放过去，在宁夏时就想使奇子俊杀害未成，这次他欢迎奇寿山回来，当然还是根除后患的打算。奇寿山也不是看不出来的，也有他的“锦囊妙计”，鼓点出在奇子俊和他的“宠姬”身上。奇子俊是个冷热不经常的纨绔子弟，依靠着他父亲的权势，一帆风顺地当了高官，因接触了不同的环境，他也变得乖张失措，感情极易冲动，有时候表现为一个摩顶放踵的“为人民服务”者，有时候又成为一个享乐至上的纵欲主义者。对部下偏听偏信，爱听谗言，引用献媚的人，尤其宠爱他的那位妖艳的“库伦太太”，听信她的话，往往不分是非曲直，申斥部下。在南京时，这位“库伦太太”交游极广，和她打交道的男人也很多。当时随奇子俊在南京的奇景峰等，认为这是对奇子俊的侮辱，影响极不好。他们为了顾全准旗官僚们的“名誉”，一面向“库伦太太”提出警告，一面向奇子俊进“忠言”。谁知他们的“忠言”远不及“库伦太太”的

巧言，反而是自找麻烦。以后由于“库伦太太”的挑拨，使追随奇子俊的人都有些离心离德。当然也有几个跟随奇子俊的亲兵，和她有了“交往”，形成了微妙可笑的关系。奇寿山不仅和奇子俊朝夕相处，和跟奇子俊的亲信，关系也极深厚。最工于心计的奇寿山，正好利用这种矛盾，找机会报父仇，所以密谋举事的活动早在南京就有了基础。回旗后首先和不满纳森达赖父子的人拉拢，尤其对那些和纳森达赖父子的妻妾有暧昧关系而每日提心吊胆的人接近。在过旧历年时，纳森达赖给了奇寿山一整份银子（五十两一个大元宝）的“压岁钱”，这明显的是杀死奇寿山的赏钱。因为纳森达赖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很不易赐“下人”一个银元的，但对他自己的儿孙每逢过年时都给一个元宝为“压岁钱”。他的理论是少给一点，他们零化用了，给一个大元宝舍不得化还能替他存放。今天把奇寿山看成他亲爱的儿孙，其用心真是路人皆知的。但他还是粗心大意不够细致，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对付一个书生还成什么问题，因此放松了一步。又怕奇子俊从中拦挡，所以没有很快下手。而奇寿山的活动，在回旗后的短短几天内就秘密酝酿成熟。中间还有一段可笑的故事：在旧历年底时，纳森达赖患病，请喇嘛念经，向一个准格尔召的“活佛”询问他的吉凶，“活佛”回答得很妙：“你现在的病还没关系，怕的是你过了年初几有大的危险！”这话使准备杀死纳森父子的人吃了一惊，尤其是使素不信神鬼的奇景峰吃惊不小，他怀疑是否计谋已泄露了，为一窥究竟，他亲自去给这位“活佛”磕头，询问他本人的吉凶事，“活佛”信口说了几句，才使他安下心来。

杀死纳森达赖是旧历年初三早上。奇寿山约好了奇景

峰、段得胜、韩海宽、杨保保、杨青山等十多个有志除害的人，都埋伏在里外院。奇寿山单人携着手枪，走入奇子俊屋内，正好奇子俊在洗脸，回过头来和奇寿山说了几句话，奇寿山抽空用八音子手枪向奇子俊脑后射击，但子弹在弹槽内卡住了，未能成功。奇子俊发觉了，但他是个未经过战阵的少爷公子，见此危急情景，却不加抵抗，反而一扭头跑向内院向他父亲那里呼救。这时藏在内院的奇景峰，跑在奇子俊跟前问：“怎么了？”奇子俊见是他的“心腹人”，把步伐缓下来，正要告诉原委，想不到奇景峰从侧面用自来得手枪一击，当场殒命。在内院大厅正屋的纳森达赖忙跑出来忿怒地追问：“出了什么事？”一面他嘴里还乱骂着。当他靠近奇景峰时，奇景峰迎面一枪，但他并未倒下，一股凶气，反而跑上要抓奇景峰，背后韩海宽又是一枪，他翻身又去追韩，咬着牙，紧握着拳头，大有生吞活吃人的模样。这时七、八个人围上来，你一手枪，我一手枪乱击他，他还绕院追着抓人。躲在二门里的奇寿山，因手枪“上架”，用枪头向他脸上猛戳一下，他抱住脑袋，还在继续追抓人。奇景峰怀疑地看着纳森达赖穿的西宁筒子宁绸面大皮袄上，弹痕已有七、八处，但还是倒不下。最后奇景峰闪身到纳森达赖的背后，用劲一踢，才使这个横行一世的魔王死在他的脚下。

不论怎样一个人民的敌人，他总有几个孝子贤孙。纳森达赖的“忠臣”“圪泡斗林”出现在房上，看到他的“恩主”被人杀死，立刻开枪报仇，击伤了韩海宽。奇景峰绕在他背后，一枪又结果了他。虽然纳森达赖父子的卫兵还非常多，但再没有人出头了。奇寿山等十多个人分头缴这些卫士的枪时，这些大烟鬼卫士们连炕也不大愿意起来，只睁了睁眼

说：“快拿去，快拿去。”住在离杨家湾约二里之遥的沙圪都驻兵，听说纳森达赖父子已死，立刻表示出拥护新主的态度来，奇寿山拿出纳森达赖大量的存款，分头收买准旗官兵，每一个兵是六块白洋，军官更多。准旗的保安队官兵，个个见钱眼开，欢天喜地。这时仅有几个纳森达赖最亲信的人，忐忑不安，第一个是纳森达赖的亲兄弟、在准格尔召有几个兵的二喇嘛，其次是纳森达赖的叔伯兄弟奇文英，族弟典什。这三个人分掌着约二百人的保安队。我叔父奇凤鸣早已对纳森达赖父子心怀不满，他又掌握着准格尔旗最精锐的“河套川兵”，他似乎坐山观虎斗，怀着渔人得利的心情，一直没表示态度。最后奇寿山派专人送来白洋大烟，维持军队，并邀我叔父去共商善后，我叔父也出席了。会上决定以全旗军民的名义上报“中央”和绥远当局，说明除此元凶大恶的理由，并推举奇寿山为东协理，代理札萨克，奇景峰为西协理，共掌政权。很多新的施政也提出来了，尤其是整顿军纪，每月发一定的军饷，设立学校，缩编军队为五百人，减少赋税等改良政策。如果奇寿山不失败，继续能掌握准格尔旗政权的话，一定会有所作为的。但他究竟没有基本力量，不能施展他的抱负，并且当时封建势力很雄厚，决不允许他的“新方针”施展。几个月后，奇文英、典什等二百多人就发动了向奇寿山新兵的进攻。

当时新兵约三百多人，是奇寿山执政后组织起来的，武器、装备、弹药都很充足，但可惜奇寿山用的是一批投机军官，他们唯利是图，丝毫没有有什么气节。当纳森达赖的太太——定王的七姨太活动替纳森达赖报仇时，这些人贪图利益，又倒向奇文英那边，作了内应。使奇寿山孤军作战，不

得已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单人奔向河曲，在途中迷失路径，休息在一个农民家中。他让一个农民带信给奇景峰搬救兵（当时奇景峰已去河曲搬救兵去了），奇寿山估计救兵即可到来，不想送信的农民遇上了奇文英派来的追兵，没有弄清楚，就问：“你们是奇景峰搬来的人吧？”追兵郝连长见风使舵地连连承应，这个农民引追兵到离家门不远时，奇寿山忽然发觉，开枪应战，但他孤身一人，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杀死了。

奇寿山死后，旗内人很惋惜，就连杀死他的郝永恭连长，在一年以后也捶胸后悔地说：“我做错了一件事，我不应该杀害奇先生（这是一般人对奇寿山的称呼）！”奇寿山是一个纯洁的青年，很希望做一番事业，当他杀死纳森达赖父子后，公私分清，从无一件东西带回家中，甚至他妻子向他要一点钱做衣服摆一下阔，他还拒绝不给。这与旗内一般官僚们今天罚这个，明天要那个，荒淫无耻，拼命往自己家里搂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抗战时期的“绥远调查 统计室”和张庆恩

张富仪

(一) 从一九四〇年写起

远在“七七”事变前，“绥远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调统室”）就成立了，这个材料主要是从一九四〇年后季写起。“调统室”在隶属系统上，只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一个室，当时的全名称叫“中国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局”）在电报和文件上都简称它为“绥室”。它是受着双重领导的，既受“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指挥和领导，又受“中统局”的直接指挥领导，并受“省党部书记长”的监督，但人事和经费，则完全由“中统局”掌握决定，从室主任到助理干事，从经常费到临时费（地方补助例外）都是如此。在对外关系方面，其属于公开性质的，都用“省党部”名义，“调统室”本身没有公章。其属于特务活动的，也只以化名手章秘密使用。室内的专职调工分子，在日常生活方面，总是和“省党部”在一起，以“省党部”的一个成员出现，佩带着“省党部”符号。但在特务工作活动上，却和

“省党部”分开，如在“调统室”的院门上，经常挂着“闲人免进”的木牌，甚至有的房子还挂着“非经允许，不准擅入”的木牌，这不仅对“省党部”的成员有限制，对于一般调工分子，也有一定的限制。

“调统室”在当时也有它“名副其实”的调查统计工作，但分量太少，如在一九四二年前后，国民党政府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早晚市价不同，曾指定物价项目三十多种，令“调统室”派专人每日调查，电报“中统局”。又如一九四三年后，“中统局”曾颁有党务调查统计表十余种，内分月报、季报和年报等，材料由“省党部”各科室的档案中抄录或供给。但以上两项工作，在当时只有调工分子常述武一人专管，其他所有调工分子，则完全投入特务活动中。

在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调统室”主任是陈国英，绰号“陈二痞”，后因内哄，陈枪击绥远省党部委员纪守光毙命，并使潘秀仁受伤，陈即被管押。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侵绥，国民党军政机构都向后方撤退，所有调统分子亦随之逃跑。一九三八年初，“调统室”主任是刘桂，刘字馥斋，托克托县人，是特务头子陈立夫的嫡系。他曾由后方带来特务陈建中、张展明、张庆荣（张庆恩的胞弟）和译电员杜增明（亦参加调统组织），并配属五瓦电台一部，先到榆林，于一九四〇年才进驻东胜。不久，刘调任国民党“平绥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张庆荣等任委员，“调统室”只留下杜增明一人，其余都另派工作。这时在陕坝的“绥远省党部”也明令改组，由特务头子张庆恩担任书记长，并担任“中统局”专员兼“绥室”主任，接替了刘桂的职务。以下的材料，主要是从一九四〇年张庆恩到绥西后写起的。

(二) 张庆恩的来绥西

特务头子张庆恩，山西徐沟县人，太原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北伐时期，他还是学生，边学习边活动，一九二七年左右毕业后，先在国民党“太原市党部”工作，后被派到太原市工会，一九三〇年，阎冯倒蒋序幕揭开，他仍在太原继续工作，以后在“扩大会议”筹备期间，往来于太原、北平两地，显得很活跃，人们才知道他系改组派分子。因为他从开始政治活动以来，就诡诈寡言，色彩隐晦，很少被人发觉。在“扩大会议”失败后，C.C.系分子在太原市继续掌权，他恐被扣捕，即逃亡天津。赋闲一个时期后，和陈立夫派在天津活动的、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大特务李实斋拉上关系（因他和李都是徐沟人），由李介绍参加了陈立夫的C.C.系特务组织，从而便在李的直接领导下，变为蒋家王朝的一只忠实走狗。

“七七”事变以后，天津沦陷，李实斋向后方逃亡，张庆恩在天津英租界潜伏活动，一九三八年被任为天津市中统特务负责人，他的胞弟张庆荣，妻弟白尊荣和翟庭实等多人，都在他的领导下参加活动（翟庭实原名翟璜，山西崞县人，与张庆恩共事多年，一九四一年春张曾建议“中统局”请派翟为“绥远省党部”委员，作他的特务活动助手，到一九四三年初才实现）。并为了掩护方便，连家眷也一起搬到英租界内。据张庆恩说，他们在日寇侵占天津的第二年，曾在天津一带成立敌后游击队，物色了一批天津附近的青红帮大小头目和地痞流氓，假“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委之为抗

日总司令、军长、师长及旅长等，令其自行发展。这些家伙们认为有“军事委员会”撑腰，便胡作非为起来，结果民怨沸腾，受害者联名向英租界当局告发，将张庆恩等十余人逮捕起来。后经各方活动，不久获释。张庆恩化装为商人，由天津跑到上海，经香港转重庆，找到了他的引路人李实斋，李便在中统局局长徐恩曾左右，极力为其嘘植。“中统”为了在蒋介石面前与“军统”争宠，并扩大其影响，抬高其地位，就把张庆恩在天津被捕的经过，大肆渲染，专案呈报蒋介石，蒋还亲自传见张庆恩一次，不久张就以党棍和特务头子的身分，来到绥西。

张庆恩被派到绥西，带有防共、反共、清除内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任务，是蒋介石反动集团针对绥西地区发动反共高潮的措施之一。他们当时把绥西地区看作是“粉红色”地区，为什么要这样看呢？由于他们深知傅作义的部队，经过守太原、攻绥南各战役，损失很重，虽在晋西北整补一个时期，装备仍很窳劣，当时在全国各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不是全军复没，就是望风披靡，而傅作义的部队却在绥西能以劣势的兵力，取得五原战役的胜利，这不能不使他们震惊，便认为显然是傅作义部在晋西北接受了共产党的思想和作风，有不少的共产党员参加在他的部队中，得到了共产党的帮助。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就逐渐要发生质变，成为未来的“大患”，因此就决定要傅作义加强防共，清除内部，并首先改组了“省党部”、“调统室”，派张庆恩来总其事。

张庆恩由重庆动身时，“中统局”给他配备的助手为张忠一（原名张方堃，是个叛徒），随带五瓦电台一部，有台

长罗践夫、报务员刘志黎，另外还给察哈尔省带来电台一部，有报务员伊杰（这部电台后来也归“绥室”使用）。到绥西后，除把原来“调统室”的特务杜增明接收过来外，并录用了由辛崇业（字及山，“绥远省党部”委员）推荐的李金山担任庶务和录事。在“绥远省党部”方面，有委员张庆恩、陈国兴、张遐民、耿正模、邱明星、吴桐六人属于陈立夫系，辛崇业、高存仁属朱家骅系。虽陈、朱两系之间有矛盾，但陈系占绝对优势，也就是张庆恩当权。新用的人员有总务科长张登鳌，五原县党部书记长白焕瑜，安北县党部书记长柴生华，都是一些地方人士，张庆恩拉拢他们，为的是增强自己的实力，以后白、柴二人都参加了调统特务组织。

张忠一，山东寿光县人，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这个叛徒曾陷害同学数人，作为参加中统特务的“献礼”，为人浮夸自大，狡猾异常，在旅途中张庆恩为了取其欢心，能为己用，即以“秘书”相称，并许以将来有机会时保举他为“绥室”主任，而他也真正为张庆恩大卖力气。

（三）大逮捕开始

张庆恩等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到陕坝，首先是了解情况，派张忠一以视察党务为名，遍赴五原、安北、临河等县进行侦察，往返约二十日。以后即利用可能利用的对象，从各方面进行特务活动。当时为张庆恩所器重的“人物”有“绥远省党部”委员耿正模（驻会委员）、张遐民（绥远省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处长，常驻陕坝，等于驻会委员）、组织科长田馨年、干事焦泽民，临河县党部书记长、陕坝二校校长王

炜，中央通讯社驻陕坝特派员王华灼，建设厅科员阎起凤，还有第八战区副长官司令部（以下简称“长官部”）秘书长曾厚载、秘书殷劲戈等，政治部工作人员员涛秋、李俊秀、杨恒山等。以上这些人都和张庆恩打得火热，例如阎起凤当时仅是一个科员，到“调统室”找张时，开口便呼“永铭在不在？”（永铭是张庆恩的别号）破门而入，张如在屋，则笑脸相迎，一谈就是个把小时。张对曾厚载更恭维备至，奉之如师，笔者在一九四二年后整理“调统室”档案时，曾发现曾厚载亲笔给张庆恩和张忠一的便条很多，都是有关特务问题。所有“调统室”认为有问题的人，绝大部分是通过上述这些人给提供材料的，而这些材料的来源，则多半是根据一九三九年人们在绥西“抗建会”的大会或小会上的言论提出的。并将他们临时所搜集的片段材料，加以综合判断，即上报“中统局”，作为扣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依据。同时张庆恩还密作行动准备，一方面紧紧地抱着曾厚载的粗腿，暗中并请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张彝鼎协助，从机关中调出祁继先（字觉民，临河县党部书记长）、员涛秋（政治部科员）、殷劲戈（长官部办公厅秘书）、阎起凤等参加实际工作。一方面为抓点武力，密派张忠一送往新六旅旅长王子修处进行活动，先是借同乡关系拉成朋友，然后说明来意，并密许将来在政治上给王帮忙。王子修系伪军反正的杂牌军队，早希望有人在国民党“中央”方面为之说项，因此很快就同张忠一勾搭起来，对张的要求，慨然应允，除了把他的一个连长张立德借给当助手外，又借给较好的手枪数支。张立德系张忠一的族下堂侄，随王子修当土匪多年，胆大心细，枪法熟练，特别为张庆恩所赏识，即吸收其参加调统组织，以后在

特务逮捕工作中，成为张忠一有力的帮凶。

以上是张庆恩等初来绥西所作的比较重要的秘密活动。在公开活动方面，张庆恩曾请准傅作义由长官部督察处（后改侦察总队）拨给武装侦察士兵一个班，由督察处派队长一人领导，随时听其指挥调用。阴燕英担任这个队长的时间较长，而且以后由队长、大队长、副总队长，一直当了张家口市警察局长，就是以如此反共起家的。此外张庆恩还请准由长官部军械处借用山西造手枪十支，分发给特工们使用。

在这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张庆恩就开始发动其所谓“清除内部”的大逮捕，他头一次向傅作义签请要扣捕的人，就有数百名之多（据见过这个黑名单的人说，约有四百人，这个名单我没见过），傅看了后说：“须待考虑。”便将原件留下不发。张庆恩起初还认为自己执行的是国民党“中央”交付的任务，向傅作义请示核批，不过是手续问题而已，没想到傅竟认真起来。因此便从各方面探听傅的态度，不得已二次签请时，减为几十人，傅还一再追问事实和证据，经他一再陈述，始批准十余人。从此调统在绥西迫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活动就揭开了。他们先后在陕坝镇和临河、五原、安北三县及河西东胜县等蒋管区内，扣捕了程崑山（后改名为程又新）、陈元夫、王福田、刘映元、李丕才、周鸣、安建国、王海周、贾润芝、王国华、王会文、陈怀珍等多人。记得我那时正随周北峰率领的“年终检查团”在临河第四区（二道桥）工作，忽接到电话要周速返陕坝，周当时还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是他领导的“绥远土地委员会”的职员贾润芝、王国华二人被特务扣捕了。

(四) 巴拉亥事件和特务暴行

有马汝才者，于一九四×年×月从伊盟到陕坝洽购粮食，住在一个小店里，因酒后失言，露出破绽，被特务张忠一等立即扣捕（扣捕地点在陕坝忠孝街，距当时“调统室”占用的博爱巷二号只有二百余米），非刑逼供，由马口中找出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张庆恩认为机不可失，除向曾厚载汇报情况请转傅作义外，当即令特务张忠一、祁继先率领武装侦察兵等，奔赴临河城南的“魏羊官地”各村庄进行搜捕，几日之内，扣捕了进步农民几十人，均陆续送往陕坝审讯。在被讯时，其中有赵子寿者，已年近六十，态度强硬，破口大骂特务破坏抗战。特务们认为话里有话，更加紧严讯，在张忠一和张立德轮流拷打一昼两夜之后，仍毫无所得。特务们认为硬的不行，又改用软的，由张忠一亲手把他放下松绑，好言安慰，拉起山东老乡关系，口口声声称“老哥”，并以面饭款待，安排在暖屋子里休息，不料这个赵老头儿竟在他们软化的欺骗手段之下叛变了，暴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张庆恩不胜欢喜，即和曾厚载、张忠一等商定，仍由张忠一和祁继先率领武装特务张立德、张迺清（新参加的），并加派侦察兵等共约二十人前往搜捕，由叛徒赵子寿作眼线，连夜到了临河对岸的巴拉亥地方，把郭北宸同志逮捕了。同时还在该地大肆检查，于挖地三尺和遍掏橡眼中，获得了一些有关文件，即当时特务们所说的《巴拉亥文件》。这项文件，经张庆恩亲自整理，排列编号，装订成册，誊录副本两份，一份留“调统室”，一份送傅作义，原件则遵照“中统

局”电示呈解重庆。随着“中统局”指示要严行审讯，彻底弄清，企图扩大扣捕范围（因只凭文件内容动手捕人，尚有困难之处，如文件内有涉及财政厅长李居义的地方，傅作义就与特务们的看法不同），于是他们便向郭北宸同志酷刑逼供，软硬兼施，力求补充，但郭北宸同志始终只承认本人是共产党员，丝毫没暴露他人，因此使特务们毫无所得，“中统局”也大失所望。

从一九四〇年七月到一九四一年夏初，在张庆恩来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绥西地区便开始走向了黑暗。所有被特务们扣捕起来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及农民，约计二百余人。从前在晋西北参加三十五军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青年，因环境日趋恶化，大都先后离此他往了。从前能买到或看到的进步书籍和经常能听到的抗战救亡歌曲等，再也看不见和听不到了，甚而连“抗战到底”的标语也看不见了。最惨的是特务们在审讯过程中的非刑逼供，如吊拷、鞭打、压杠子、跪碗碴、灌凉水、坐板凳、加油楔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有时用挖好土坑准备活埋的办法进行迫害，其作法是把被审讯的人推到坑内，壅土没膝来逼供，如对贾润芝就这样作过，有时还用手枪实弹对准被审讯者的脑袋逼供。

“调统室”先在陕坝博爱巷二号占一个较小的民房，后来为避免惨叫之声外闻，又移至“张维世圪旦”南的一个独院。特务们在商谈问题时，为了保密，经常通过特务祁继先、王炜的关系，借用陕坝第二小学的办公室，每次都在晚十一点以后夜深人静时候举行。

在这个所谓“清除内部”的大逮捕告一段落后，有些人仍被扣押和继续审讯，有些人被送进“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

团”（以下简称“战青团”）受训，继续考查。至于被捕的农民，有的直接讨保释放了，有的则送到“战青团”，经过较短训练，写了《悔过书》后，再讨保释放。但这些人回乡之后，并不算事情完了，又把他们编到“管训小组”管训，交付各县“党部”负责考核和监督。最后连那些被扣押的人，也都移到“战青团”看管了，如对郭北宸和乔崇浩二烈士就是这样。

此后有些人在“战青团”被释放，张庆恩还沽名钓誉地给分配工作，在生活待遇上也只能维持个人最低水平，如贾润芝、王国华等，在被捕前是科长级，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但分配到“绥远省党部”，则仅是一个服务员，待遇和录事一样，不发本机关正式证章，只给一个布条符号。还有一部分人不分配到一般部门工作，而是送到特设的“宣训团”。这个团，美其名曰担任抗战宣传训练工作，实际是要继续考查这些人的言行。它设在“托城圪旦”，占住民房数间，一切生活待遇比“战青团”稍好的仅是“外出不受限制”。所谓“宣训”则只是以“游而不击”、“抗而不战”、“制造摩擦”等自编的谎言，作诬蔑八路军的宣传活动。

（五）张庆恩和陈国兴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张庆恩因神经衰弱而引起的失眠症，日甚一日，有时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便将“绥远省党部书记长”这一职务交由驻会委员耿正模代理，“绥室”工作交由张忠一处理。这时张忠一即以“绥室”主任自居，对审讯案件，日以继夜地亲自进行，妄想实授“主任”。张庆

恩也了解他的用心所在，为促使张忠一更卖力气和履行在来绥途中的诺言，便在病床上写成电稿，向“中统局”保荐张忠一升任“绥室”主任，理由是本人多病，无力兼顾，张忠一富有才力，来绥后工作成绩卓著等语。不料事出意外，“中统局”竟电报任命当时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第五区党务督导员陈国兴为“绥室”主任。这个电报，是“中统局”直接发给驻东胜县的“平绥铁路特别党部”电台转交陈国兴的，并令陈速行到职具报。陈即于第二天由东胜兼程西来，到陕坝的第二天，“绥室”才奉到“中统局”任命陈国兴的电报，张庆恩虽对此有请“中统局”收回成命的想法，但看见陈国兴已经来了，也只好打消了。

陈国兴为什么能担任“绥室”主任呢？其主要因素有二：第一陈的保荐人是刘桂，刘是陈立夫的嫡系分子，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是陈立夫有心栽培的对象之一，在“中统局”关系颇多，因之向“中统局”说话有相当力量。而张庆恩原为改组派分子，是半路投效的，在“中统局”内部关系不多。张忠一是个叛徒，参加调统组织时间不长，如提升室主任，则未免过早。其次，陈国兴自一九四〇年十月初到达东胜担任第五区党务督导员后，对绥东一带以及晋北地区八路军的活动情况，经常利用郭长清部电台和刘桂的“平绥路特别党部”电台，向“中统局”拍发情报。两相比较，陈国兴就比张忠一有优先权。张庆恩对此情节也有所了解，但因未能保准“自己的人”，却心有不甘，因而对陈歧视，经常利用其书记长和中统局专员的地位，干预陈的工作，陈虽忍耐不发，但也心怀不满，于是便产生了张陈之间的狗咬狗的矛盾。

当陈国兴于一九四一年夏接任室主任之时，“调统室”专职特工分子除张庆恩外，计有张忠一、杜增明、李金山、马澄俊、张立德、张乃清等人，其他都是有公开职务作掩护的兼职调工分子，如祁继先、员涛秋、阴燕英等。但时隔不久，因张庆恩和陈国兴的矛盾加深，内部人事也有所变动：首先是叛徒张忠一因谋升“绥室”主任未遂，抑郁在心，并恃有张庆恩为奥援，不甚听从陈国兴的指挥，而陈在工作上，也当然对他不能信任，这就使他在张、陈相斗的夹缝中倍感失意，同时他的胃出血宿疾也复发了。张庆恩为了调护他，调他为“绥远省党部”社会科科长；并多方疗治，终以病入膏肓，在宁夏医院毙命。死后绥西人们骂着说：“狗×的，死的也迟了！”同时在五原一带曾把张忠一之死误传为张庆恩死了，如有人以试探的口吻对“绥远省党部”的人说：

“听说你们那里死了个张主任，是不是经常闹病的张书记长？”可见人们也盼着张庆恩早死。

张立德在其族叔张忠一死了以后，感到跟着陈国兴没意思，不久便和张乃清、李金山等先后另调为兼职特工，陈国兴也由此任用了王维新、翟绪章（字赞周）、张富仪、陈怀珍等为专职调工。

陈国兴在任“绥室”主任时期，起初虽以清理旧案并主持“战青团”训练为工作重点，但仍继续扣捕了谭觉民、魏沛、王守卫、杨如升和平理乡乡长等三十余人。一九四二年秋初，他还为了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在商得张庆恩同意下，把特务翟绪章介绍到“国立绥远中学”任数学教员，秘密进行特务活动，在该校师生中吸收特务分子，搜集和监视进步师生的言行。不久，该校语文教员王兰田看出翟绪章的政治

关系，便不断以反映进步师生言行作为试探，因之翟的情报就源源而来，逐渐为张庆恩、陈国兴所重视，翟并将王兰田向张、陈介绍，经详谈才知道王在“七七”事变前，已由大特务刘不同介绍参加过调统组织，于一九三七年任包头市警察分局长时，即执行特务任务，因战事关系，失掉联系。后来张庆恩向“中统局”查询，得悉王兰田原名王丕伦，确系中统调查员，准即恢复关系，并由“绥室”直接领导。王兰田沟通关系后，活动更加积极，不到半年，就在该校一千多人中写出一张百余人的黑名单，请求处理。

由陈国兴吸收的程绪章，虽然立了大功，但张庆恩对陈国兴的不满，并未稍减，不时想把陈抽架出去。记得一九四二年时，叛徒程又新为了立功，向陈国兴请准，在陕坝镇一个商号扣捕了由山西代县来省亲的周姓青年一人，经程又新实打虚招，几乎酿成武装冲突事件。这个青年家住晋绥边区，是在解放区长大成人的，到绥西后，当然看不惯蒋管区的种种黑暗，不免偶而谈谈解放区的光明来对比，因此便遭到扣捕。在审讯过程中，本来没什么可说，但他受刑不过，便说：“不要打了，我说吧。”程又新又问：“你们的支部设在哪里？书记和委员都是谁？”接着又问电台设在哪里？领导人现在何处？那青年一一供认，据说电台和负责人都在陕坝镇南约十华里的“白珍平圪旦村”一个农民院内正房里，以农民身份做掩护等语。经陈国兴请准张庆恩，派程又新、陈元夫负责办案，于第二天拂晓，带着那青年和武装特务韦伯雄、廖永宽、陈宝山等十余人，直向目的地奔去，还差百十步远时，适从院内出来一人，特务们喊声“站住！”那人一看来势，认为是土匪或变兵行抢，拔腿便跑，特务们开

枪制止，不料惊动了正在出早操的驻军炮兵某连，马上向枪声方向迂回过来，就要开火，适张庆恩和陈国兴乘马赶来，一见情况不佳，喝住特务们，亲到炮兵连说明情况，才解除误会。随即进院遍搜，结果一无所获，经张庆恩亲自追问，才知道是因受刑不过胡说的。但为什么会说得那样具体呢？那青年便述说细情：所有供出来的书记委员们，都是他父亲铺子里的伙计，这家人是他的亲戚，在前几天他来过一次，因此在被审讯时拿来搪塞。嗣后又经查询，证明那青年确是实打虚招，才把他释放。特务们都抹了一鼻子灰，张庆恩借此经常奚落陈国兴。

叛徒刘子秀，一九四二年初，经常由五原邬家地到陕坝向陈国兴反映情况，不久即被派为专职调工，在试用期内，由其行李内搜出大烟数两，在当时，陈国兴的意见是没收烟土，不予追究。张庆恩则力主送法院严办，结果把人和烟土都送去了。为什么张要这样作呢？一则给陈面子上难堪，二则疑刘与陈有共同贩卖烟土的行为。这时张庆恩已有去陈之意，陈也感到张对他越来越掣肘，便和刘桂磋商请调，不久即调为“平绥路特别党部”委员兼书记长，一度为他出力的胡存信，也随着调往。

（六）郭北宸同志之死

一九四二年六月下旬的一天，陈国兴手拿“中统局”来电和签呈一纸，到我的房间里让我看，电报原文我记不清，大意是说郭北宸既“执迷不悟”，可就近商请傅作义主委（此时傅兼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秘密处决，并具

报等语。电报纸后边有陈国兴和张庆恩联名报请傅作义核批的签呈。这个签呈上什么话也没有批，只写个“义”字。看后陈对我说：“主任委员表示，既然中央决定，他没有意见。我同张书记长（指张庆恩）已经商量好了，后天就把郭处决，并决定派你和马澄俊、员涛秋三人执行，用省党部马车把郭拉上，扬言送兰州受训，等走山陕坝十多里后，趁附近无人时，由员涛秋开枪击毙，立时回来报告，就说是因中途逃跑，将他击毙。当然，这样杀人也不行，只好在事后将你们三人暂行扣押，听候处理，顶多十来八天就出来了。这完全是为了掩蔽人们的耳目，因为今天是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对共产党人不能公开处决。”并说：“事关机密，不可泄露，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万一发生问题，谁能负起这个责任？我就去找马澄俊和员涛秋作准备。”他可能看见我没有什么表示，忙着又说：“想什么？这是命令！”我稍稍瞟他一眼，他正颜厉色地盯着我。我便说：“杀一个人为什么还教别人坐看守所？不能公开，找个借口也行，公布罪状，明正典刑，有何不可？”陈不作理会，只是说：“赶快准备，明天下午把人由战青团提回，晚上由我带人负责看守。”说罢便走了。我听后顾虑重重，不是考虑别的，只是考虑自己，首先是不愿坐看守所，其次是“过失杀人”也是麻烦，再就是我到“调统室”只有一个多月光景，尚在试用期间，不去又绝对不行，因此辗转反侧，午夜不能入睡。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然腹内觉着不舒适，顿时计上心来，马上大嚷腹疼要命，并佯装吐泻状态，家中人以为发霍乱，一直闹到天亮，隔壁的辛崇业也来看望我的病情，我便托他向陈请病假，陈虽派工友来打听，也信以为真，不叫我去。关于这

件事，事后才知道改派为胡存信（“省党部”组织科一级干事，系陈的亲信，同乡又同学）和员涛秋、马澄俊三人去干了。他们三人由陕坝走时，自赶马车，送到“战青团”（在陕坝西二十余里）将人提出，声言送兰州受训，走了十余里，到了一处芦苇茂盛、四周无人烟的“沙卜”附近，就把郭北辰同志枪杀了。他们用预先藏在行李下边的铁锹，挖坑把尸体掩埋，携回血衣做证交差。在他们三人联名的报告中还说，郭上马车时，也认为是送兰州，但不久发现他们不走正路，望荒前进，并看出他们形色异常，内心中可能有些会意，但仍非常镇静，不断仰首观天，一语未发等语。我假后上班时，陈国兴又将有关此事的电报、签呈和他们三人联名报告等交给我，要详报“中统局”备查，并告诉我如何写法。我在拟电稿时，反倒有些后悔，认为自己失掉了一个向上爬的机会。

张庆恩和陈国兴为什么要下此毒手？主要因为他们卑鄙的目的没有达到。在将近三年的光景中，他们用尽方法，争取郭烈士转变，企图获得第一手资料，把河套地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全部破坏和捕获。张庆恩在指使特务刑逼利诱毫无所得之下，还亲往谈话数次，期有所获，但郭烈士仍只承认他个人是共产党员，其余只字未吐。接着陈国兴又以雁北乡亲关系与烈士接近，并给以物质上的优待和精神上的“安慰”，但接触到政治问题时，郭烈士仍闭口不谈，后来便长时间不问不理，希望能“自动转变”，也毫无结果。最后派叛徒程又新住在“战青团”，有机会即进行劝诱，复被郭烈士骂为卑鄙无耻，程也因之知难告退。至此，特务们一筹莫展，只得据情呈报“中统局”听候指示，再未问过。

郭烈士牺牲不久，乔崇浩同志也被折磨致死。乔是在绥远省政府任秘书时被扣捕的。他在“战青团”拘囚时间较长，内心烦恼至极，于一九四二年夏，用木棒自击头部致伤颇重，不饮不食两日。陈国兴据报向张庆恩请示，张谓：“这是消极反抗，不要理他，死了也算。”不几天，乔伤加重，才邀来中医弓子丙诊治，服药无效，即死于“战青团”。据弓子丙事后说：“这个人不应该死，要早治，两服药就好了。”乔死后，陈国兴派“调统室”会计陈怀珍前往协助掩埋，不但没给棺殓，连乔仅留下的皮大衣，也被陈怀珍据为己有。事后有人向陈国兴反映，陈说：“掩埋死人一回，穿个旧大衣，那有什么了不起，放在土里还不是沤烂了。”

在此以后，“中统局”还来电把一九四〇年十月以后到一九四一年底“绥室”工作的考核发表：1.“绥室”工作成绩优良，传令嘉奖。2.祁继先（当时仍任临河县党部书记长，系兼职调工）工作努力，成绩显著，特发奖状，以资表扬。3.员涛秋、张立德等记功一次。4.赵子寿年岁较大，在生活上酌予补助，由该室承办具领或由临时费项下支销。在那个国难严重、大敌当前的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竟如此伤天害理，表面上说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实际上则对共产党人秘密杀害，凶手们反而受到“奖励”，真是岂有此理。

厚颜无耻的赵子寿，在这个时期每来陕坝，张庆恩和陈国兴等都视如上宾，请他看戏下饭馆，备极款待，企图在他身上继续找出些材料或线索，但时经两年，也没搞到什么，便逐渐冷淡了。到一九四四年以后，赵也不来了，补助费也停发了。还有倒向敌人的马汝才，特务们为了继续利用他，

曾派他为“战青团”事务员，借采购之便，经常在陕坝订棉探事，后来有人反映他购物时以少报多，从中揩油，特务头子们也置之不理。一九四二年还帮助他与一个行为不好的女子结婚，借以羁縻。一九四三年以后，认为他已不起什么作用，便马上踢开，把他揩油的事指出，令他仍回伊盟，自谋生活，但仍须以通讯方式供给情报，并把关系介绍给“蒙旗特别党部”。

(七) 调统工作的总检查

陈国兴被调走，张庆恩总算是遂了心愿，为了掌握“绥室”实权，便以自荐方式，向“中统局”婉陈“绥室”主任一职在没有适当人选以前，仍由他兼任为宜。旋获电准，并令将“绥室”一九四二年以前工作总检查一次，在检查基础上做好一九四三年工作计划。检查和计划内容大要分为：
1. “奸伪”方面（国民党在当时诬称共产党为“奸伪”）；
2. 敌伪方面；3. 党政调查方面；4. 民意反映方面等四个项目。重点是第一个项目，并着重破案情况和管训等项。我记得截至一九四二年底，“绥室”在绥远蒋管区内所扣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进步农民，总共有五百余人，在当时“中统局”颁发的“自首自新分子管训办法”下，这些人，绝大部分于送往“战青团”训练被释后，都编入“管训小组”进行管训。这些小组是按地区把被管训的对象编组起来，每组三至五人，组长由“调统室”指定其中可靠的分子担任。使互相监视，定期反映有关情况，及时检举可疑分子。管训期限暂定为三年或五年，解除管训的职权属“调统室”。

当时在陕坝就编有七个以上的小组，陈元夫、程又新、韦伯雄等都任过小组长。一九四三年夏，由于陈元夫对“管训小组”工作很卖力气，反映情况及时真实，张庆恩把他调为专职调工，负全绥西地区的管训责任。按“中统局”规定，被管训分子如吸收为专职调工，即时解除管训，因之陈元夫就首先被解除管训。至于在临河、五原、安北等县的管训对象，则由当地县党部书记长或负责调统工作的干事掌握。后来叛徒程又新、陈元夫等还成立过“绥远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学友会”，在成立的那一天，张庆恩派翟庭实出席讲话，其所以如此重视者，是因为由“战青团”被释后参加为专职调工的有程又新、陈元夫、陈怀珍、韦伯雄、廖永宽、孙再生等二十余人，通过这一“学友会”的组织联系，有利于特工的开展。

在这一阶段的检查结果是：对边区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军政情报，反映的不多，对敌伪工作和民意反映方面，作的更少。只有对党政调查方面，作的既具体又详尽，对所有荐任以上的人员都作过调查，调查项目有十五六项之多，特别注意政治背景、日常言行和社会关系等等。如在调查中对财政厅李居义，地政局长周北峰，物资管理处杜渭，《奋斗日报》的崔载之、杨格非、高也彭等，省政府秘书长于纯斋、视察员张毓楷、秘书宋永年，建设厅技正相里矩，五原县长由竹生、秘书张心坦，“绥干团”政治教官王宪之、政治部的全文斗、苗瑞凤、苗平章等，还有部队中副团长梁洋池等多人。在政治背景一项内，都填的是有接近共产党的倾向。尤其对李居义反映的情况更多，说他经常和共产党人接近，王一然的出任临河县长和担任省府主任秘书，以及其离开绥西，都是李在暗中安排的。张庆恩曾根据《巴拉亥文

件》将这些材料多次向傅作义签请指示，傅均一笑置之，不加可否。我在一九四二年整理档案时，还看到有对董其武的调查，说董在张发奎部队内任过下级军官，当时该部队内共产党人很多，不能不受影响。董现任傅部师长，经常与士兵接近，到连队里了解情况，有八路军的作风等语。这个材料是张忠一的笔迹，张庆恩签名译发的。又如于纯斋在欢送“青年从军”讲话时，曾说过：“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句话，会后特务董叔明向张庆恩反映，说于破坏“青年从军”的号召，经向“中统局”报告，复电饬查。同时，他们对反动派的忠实爪牙如潘秀仁、张遐民、耿正模、邱明星等，也同样反映，但都是说好听的，如“信仰坚定”、“忠党爱国”等。对张钦、阎伟等，则说是先靠阎锡山，后依傅作义。至于对其他人员，大部分反映是由傅作义培植起来的。从这次检查以后，每年年终都进行一次，工作极其秘密，电报起草，由张庆恩口述，秘书张富仪笔录，杜增明亲译，一连拍发数日，档案在保留一个短时期后，即行焚毁。张庆恩当时还一再强调说，这项工作涉及面很广，万一泄露出去，影响太大，必须绝对保守秘密。

张庆恩于一九四三年初二次兼任“绥室”主任后，在特务活动方式上有所改变，如对绥远军政首脑的态度，已不是加油添醋捕风捉影的随便反映，而是以“上天言好事”来应付“中统局”。如对周北峰，不再说他是共产党了，而是说他有自由主义色彩，贪污腐化，享受思想浓厚。对李居义则说他确系老昏，在政治上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对被扣捕的人和“中统局”交下的饬查任务，亦必先想办法了解傅作义的态度，再去办理。这样在数月之后，据张庆恩亲口对人说：

“头儿（指傅）现在好多了，一点脾气也不发了，在以往可不是这样，有时把中央的电报摔在地上，生气地说：‘叫人家干吧！咱们干不了。’我捡起电报一看，开头总是据报云云，请他或令他注意，还有些材料，把当时后套征实征购也加以诽谤，看样子，头儿总是怀疑这些是我们向中央报告的，要不然，他为什么要怒气冲冲，把电报摔给我看呢？时间长了，他老先生也明白了这是谁干的勾当。”

（八）张庆恩的毒辣

在此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又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张庆恩的特务活动，重点也有了变更，手段也愈为毒辣。一九四三年上半年，他把叛徒程又新、陈元夫、韦伯雄、廖永宽、孙再生等调为专职特工后，由程又新领导，在“托城圪旦”占了民房数间，专搞侦察、逮捕、审讯、看守等工作。“管训小组”的工作除交陈元夫负责外，也由程又新兼总其成。程又新这个叛徒为了表现自己，讨好张庆恩，大逞其凶，先后逮捕了张毓楷（省政府视察员）、杨格非、魏笔波（“陕坝直属区党部”干事）、张瑞典（部队军官）和“国立绥远中学”学生四十余人。审讯过县、局捕送来的：临河县民众教育馆职员王树滋、夏江二人，晏江设治局王鸿勋、徐涛、周鸣、冯玉书、耿吉午等八人，米仓县赵英超、姚泽宣等三人以及伊盟送来的郝瑞珍、范建中等。在审讯和处理这批案件中，张庆恩曾唆使程又新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诱逼这些人们上圈套，但效果不大。继而使用坐板凳、加油楔等等非刑，也未能如愿。最后他更黑下心来，给一些人捏造罪

名，置之死地，如米仓县的乡长赵英超，部队军官张瑞典，就是在程又新的炮制下，由张庆恩签请移送长官部军法处审判，结果给赵以贪污罪名，给张以煽动士兵哗变罪名，由军法处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程又新还为了向张庆恩献媚，迎合其狠毒的心理，要求在“托城圪旦”村附近修建一个地下室，专供审讯、囚禁和拷打革命人士之用，并初步作了设计和预算，按当时物价估计，建筑一间即需伪法币约二万元左右，张庆恩也屡次口头向傅作义请示，但傅始终未加理睬。

张庆恩在处理扣捕案件中，故意留一个或两个人不予逮捕，特务们叫做“留线头儿”，如逮捕杨格非时，按程又新的意见，要把高也彭同时扣捕，态度很坚决，但张庆恩却严厉地对程说：“你为什么连这个也不懂？这叫‘留线头儿’，是为了在继续侦察新的材料上有线索可找。今后处理每一案件都应该这样。”程又新才恍然大悟，以后经常对人说：“张先生真是老手，经验丰富。”

魏笔波是在“绥干团”结业后分配到“陕北直属区党部”的一个助理干事，因和朋友闲谈，对张庆恩的行为表示不满，即被逮捕。经程又新几次审讯，毫无结果。一天晚上，张庆恩将魏提到“调统室”西院一个房子内，亲自讯问，起初伪装和善，企图诱骗，但在半个小时后，脸色突变，喝令：“拉出去活埋了！”这时早就准备下的四个武装特务，一拥而上，边拖边拉，同时室外铁镣之声触耳动心，魏惊惶之余，连说：“我错了，请求饶恕！”但也没有供出什么重要情况，只好又把他拘留起来。

最令人愤恨的是张庆恩丢失电报一事，平白的冤枉了两个好人：一九四〇年冬天，正在特务们疯狂捕人的时候，一

件“中统局”的来电找不到了，他硬说是放在大衣兜里被某一工友窃走。这个工友是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子弟，因逃避兵役而来的，为人老实可靠，经张庆恩一追问，顿感惊惶失措，即交张忠一等吊起毒打，小孩子支持不住便虚招了，说是给了曹奉先（曹当时任省府蒙务组蒙文秘书）。张即令将曹扣来，逼索所失之电报，曹以空穴来风，当然不会承认，便与之据理争论，张老羞成怒，喝令吊拷，并用蘸油香把在曹前胸后背烧烤，曹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仍继续逼问，毫不放松。后为省府蒙务组负责人闻悉，出面要人，才被释放。但不久这个电报在张庆恩的卷宗内发现了，因粘在另一文件底下一时没找见，并不是他所猜疑的被人窃去。这个情况，我当时也不知道，还是后来听陈国兴说的。

作为反动阶级忠实走狗的张庆恩，为了向他的主子表示“公正无私”，在有些场合还表现为六亲不认。如他的女婿高一峰，在“奋斗中学”任教时，曾给进步学生张鉴等三人找过出境通行证一纸，使三个青年人弃暗投明，奔向解放区，因此高一峰被特务祁继先逮捕。张庆恩的女儿张素蓉和两个小孩子（大的约五岁，小的尚在怀抱）眼看就要断炊，向张要求营救和接济，张不但置之不理，反电话通知祁继先，要严办高一峰。

张庆恩处人，一向从个人利益出发，有用时则待之如宾，无用则视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这也是他心毒手辣的另一表现。

（九）扩大调统活动，建立情报据点

一九四三年初，“中统局”曾指示“绥室”，要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内、晋西北、大青山和绥东地区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一切情报的搜集。张庆恩当时即派叛徒王明中（化名秦光南）带领助手于培信（“战青团”学员，参加调统）化装商人，前赴陕北解放区附近的三边等地，进行特务活动。在方式上是指示于培信相机打入边区工作部门或边区部门中建立关系，搜集有关材料，王明中在蒋管区设站联系，并负指挥责任。不料半年之中，花钱不少，情报只有数件，内容还是一般性的。后来便把王明中调回，于培信仍留三边，听候调用。

一九四三年夏，张庆恩的省党部委员兼书记长头衔被朱家骅免掉了，这是朱家骅和陈立夫之间矛盾深刻化的反映。张庆恩先是抑郁不乐，深感去留难定，但这时绥远当局已向右转，认为张庆恩这几年来表现得驯服可用，他虽被免去省党部书记长职务，但仍系绥远调统室主任，如给以支持，比换个新人要好。因此傅作义便派张庆恩为“长官部中将参事”，每月拨款六万元，充作特务活动开支。张庆恩获悉后大为振奋，立电“中统局”报告经过，即奉复电勉励，准予扩大“绥室”的编制。按当时发来的编制表规定，主任以下设书记（“绥室”始终称秘书）、四个股（张为提高调工分子的情绪，在股以上增设组，由组领导股），另设电务室，专职调工由原有十人左右扩编为四十余人，还增加了许多外勤。我记得各组初设时，第一组（主管外地情报调查）组长

为魏纯美，第二组（主管行动、审讯、管训、看守、特种汇报）组长为祁继先，第三组（主管情报处理）组长为董叔明，第四组（主管总务）组长由秘书张富仪兼。程又新、陈元夫、屠由俊等人被派为各股股长，杜增明负电务总责。不久，魏纯美、祁继先外调，董叔明养病，先后又调王兰田、王黎生、杨格非担任各组组长。

接着，“中统局”要求“绥室”拟订扩大绥远调统活动计划，建立各地情报据点，张庆恩为了专心草拟这个计划，便将即待移交的书记长职务，委托驻会委员翟庭实代理，并为了避免烦扰和保密起见，索性就住在“托城圪旦”他的家里去办。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张富仪、魏纯美、祁继先，后来又增加了樊毓泗，除晚间各自回家外，一日三餐也在张的家里吃，一连搞了十余日才告完成。经分别报请傅作义和“中统局”备核后，即着手布置施行。新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加强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即以食盐一项来说，当时国民党就严禁由白区运入边区和根据地，如准格尔旗属的马栅同河曲县属的土地家湾村，仅一河之隔，两村都是渡口，就不准公开把食盐由马栅运往土地家湾村。府谷县属的大口村和河曲县属的南园村，也是东西两岸的渡口，同样禁运。其他如伊盟各旗和陕甘宁边区各县，毗邻接壤，关卡林立，也都严加查禁。国民党财政部绥宁缉私处所属骑兵团，经常在上述地区活动，不仅禁运食盐，其他物资也在查禁之列。到一九四四年以后，连毛驴、牛、马等，也禁止通过。“中统局”为了加强这一反动措施，便要求“绥室”扩大特务活动，在所辖和长官部指挥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条件，选择情报据点，经确定计划为：1.以三边地区

的安边堡为据点，向靖边、安边等地发展。2.以榆林城内作据点，向葭县、镇川堡、米脂等地区发展。3.以府谷县城为据点，向神木、府谷城以南地区和晋西北的兴县、保德等地区发展。4.以府谷县属的麻地沟为据点，向晋西北的河曲、偏关、五寨等地区发展。5.以河西东胜县为据点，向清水河、凉城根据地发展。6.以大青山鄂友三部游击地区为据点，向大青山八路军根据地发展。关于负责人选，由“绥室”抽调了最坚强的调工分子，如魏纯美任安边据点主任，祁继先任榆林据点主任，郭理修任神府据点主任，刘毅佐任麻地沟据点主任，樊毓泗任河西东胜据点主任。其助手除由“调统室”内外选派外，并由“战青团”训练结业分子中选拔任用，计有化名韩正臣的，随魏纯美工作；王树滋化名王永贞，随祁继先工作；徐增瑞化名许国卿，随郭理修工作。此外还先后吸收了马步蟾、武兆瑞、任大光、许仁山、张淑青、李守巍等十数人，也分别派在各据点担任职务。至于留在室内的，则有王鸿勋、王干选、许有善、薛宝麟、武自强、屠由俊等十余人以及后来吸收的王黎生、张毓楷、杨格非等数人。所有各个据点的建立，都是以极机密的方式和依靠一定关系的掩护进行的，即在室内也严守秘密，只见这些人陆续外派，但派往何处，一般人不能得知，更不许探询，这是“纪律”之一。

魏纯美和韩兆麟等赴安边时，一方面利用安边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第二团团团长史纺城与魏有同乡、同学的关系进行活动，一方面持有绥西军事当局的介绍信，化装为史团电台摇机兵，潜伏在史的团部。他们头一个侦查对象是新十一旅代旅长兼第一团团团长曹又参，曾不断反映曹思想左倾，同情

八路军，与当地共产党人有来往等，但没有具体事实。再就是利用史团的谍报人员所搜集到的解放区情报，并购买边区政府印刷的一些宣传品和小册子，转报“绥室”。有时魏纯美也亲自出外活动，利用乡亲关系（魏系山西河津人，安边商人山西帮占多数）从老乡口中搜集情况。这些材料反映到“中统局”，起初是要求复查，后来就要求的高了，要建立“内线”，取得“内线材料”。

所谓建立“内线”，是要特务们在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根据地的政权内部建立组织关系，由这种组织关系供给的材料就叫“内线材料”。内线材料是宝贵的，按当时规定，凡反映这种材料的电报，报首须挂“内密”二字，承办人接到后，即时拍发，即时收抄，即时转呈，不许耽误，违者以贻误军机论处。“中统局”还指示建立内线有两种方法：一种叫“打入”，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关系，派特务分子混进解放区工作部门担任公开职务作掩护，秘密进行活动，如刺探各种消息，挑拨分化，争取和吸收动摇分子等。一种叫“拉出”，是从解放区各工作部门中选择具有一定缺点的工作人员，与之接近，以厚金收买、官位拉拢、物资诱惑等，投其所好，先交朋友，后建组织关系，随着就要求其供给材料，进行各种活动。

这项内线工作，从安边据点来说，魏纯美、许仁山作的很不够，因为他俩各有所恃，不认真去干，思想上还认为这项工作棘手，用力也是白费，没有信心。再则他们到后，只是想给史纺城谋求旅长位置，便尽量搜集曹又参代旅长的材料，反倒把边区的情报看得轻了。因此反映的材料始终是一般性的。张庆恩虽对此表示不满，但也无可如何，而主办情

报整理工作的王黎生，则常在背后骂个不休。魏纯美的化名叫“李通”，许仁山负责后，仍叫“李通”，以后就以“李通”作为安边据点的代号。

榆林据点的祁继先，化名朱震远，出发时是公开动身的，当时长官部在榆林没有办事处，派马秉仁为少将处长，当马秉仁由陕坝出发时，祁继先即以办事处上校主任名义随马赴榆林上任。和他同一天出发的，有他的助手王树滋、马澄俊和神府据点助手徐增瑞等，虽然每天宿店都在一起，但却声言系路遇相识，到榆林后，祁和王、马都住在办事处，以后又吸收了张淑青、李守巍、魏尚礼等。

祁继先以办事处主任名义，在榆林大肆活动，同高双成的二十二军军部和八十六师师部以及邓宝珊的总司令部，都有往来，一时显得很活跃，至于情报工作，一般性的依靠当地各方面的谍报人员搜集，内线材料系由葭县和镇川堡的地富分子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比较安边好些。同时“绥室”又把直接领导的叛徒赵伯、龚珍二人的单线关系，也交给祁继先就近领导。这二人是在“整风运动”中由边区逃到榆林，向二十二军自首的，所供给的材料，大部分是通过一定的内部关系而搜集的。他们从一九四二年初就归“绥室”领导，常住榆林，每年到陕坝述职一次，平时的情报反映和“绥室”对他们的指示，都以直接通讯方式进行。

象赵伯、龚珍二人这样的关系，称为单线关系，这样的调工分子，称为单线通讯员，他们和其他调工分子，不发生横的关系，尽管彼此互相了解，没有组织介绍或命令，也不得泄露自己的身份，这也是“纪律”之一。

祁继先从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六年春，由榆林据点主

任而特种工作指导处，而特工处，而党政总队第三大队长，一直在榆林进行特务活动。以前他和其他据点是同级关系，只转经费和拍发电报，到担任了党政第三大队长之后，“绥室”便把陕北建立的四个据点都拨归他直接领导，因此祁继先以视察工作之名，经常往来于榆林、府谷和麻地沟等地，招摇撞骗，生活极为放纵，曾吸收麻地沟的大地主魏尚礼为调工分子，时常代他筹款，每次总在五百银元以上，有时归还，有时拖下不还，魏某亦无可如何。

张庆恩为了利用祁继先，在派赴榆林工作时，曾允许给祁打闹个临河县“省参议员”的头衔，不料该县地主王开鑫活动甚力，坚不让步，张庆恩便出面向省当局请准，让祁继先在米仓县“当选”。但祁系临河县籍，必须取得米仓县籍才行，张庆恩即派“绥室”秘书张富仪到米仓县属新中乡，找到祁的亲戚傅某，说明情况，要把祁的户口转到他的户口上，傅某当然乐从，便由乡公所开了证明，到县政府办了入籍手续。几天之后，祁继先就“当选”为米仓县的“省参议员”。

为什么张庆恩对祁继先会这样培植呢？主要是为了在绥远青年中把祁作个钓饵，以便能吸收更多的青年，供他驱使利用。因此趁机提携，直到抗战胜利后保升祁为“绥室”主任。

府谷县麻地沟据点负责人刘毅佐，助手周鼎、任大光，都是河曲县人。因河曲已于一九四〇年初解放，这个据点和河曲县城仅一河之隔，为了人地两便，张庆恩就选择了这三个河曲人供驱使。在未出发前，刘毅佐是专职特工，周鼎是“五原县党部”干事，任大光早年就是绥远国民党里的小党

棍，抗战初期回河曲原籍，一九四三年夏因诬误被张庆恩软禁起来，经辛崇业力保，以任大光协助刘毅佐建立麻地沟据点开展特务活动为条件，才获释放。工作部署是：刘毅佐负责联系，周鼎和任大光打进去活动。在动身时，张庆恩为掩人耳目，还布置了一套鬼把戏，其经过如下：刘毅佐以长官部联络参谋身份，佩带参谋符号，随身带有委任令和通行证，由陕坝雇脚户大车前往麻地沟，在动身前，故意到河曲同乡家串门，扬言他回麻地沟作军事联络工作。任大光由米仓县家里动身，声称回河曲探亲，还假意散布些不满意国民党的话，如“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等。另外张庆恩以急电把周鼎由“五原县党部”连夜调到陕坝后，即扣押于“调统室”，派特务看管，不准任何人接近，周鼎当时也莫名其妙，颇为恐惧。到晚上十时左右，张庆恩先请辛崇业坐在他的办公室，然后把周鼎叫来，屏退左右，由辛崇业代为说明原委，并劝周接受任务，努力完成。周起初还以力不胜任请辞，但经不起张、辛二人一再缠磨，并最后看到张已不耐烦，恐有不测，只好答应下来（周当时尚未参加调统组织，但他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思想顽固，于一九四〇年河曲解放时，逃来绥西，经辛崇业介绍到“五原县党部”任干事，所以这次安排，要通过辛崇业的关系）。谈妥以后，当晚把应带的工资旅费等全交给他，指示他：在第二天拂晓时由“调统室”越墙“逃跑”，到五原碱柜过河，去找刘毅佐、任大光等，找到后，作为路遇，并要在脚户面前念叨自己被扣逃跑的经过，佯装着怕被追捕，打算个人单走，经刘、任二人劝告，始同路而行。沿途虽生活在一起，要各自付钱。快到麻地沟时，要三人分开，各走各路，并约好以后联系和

碰头办法。三人都到了麻地沟，周鼎、任大光也先后过了河，周回到河曲城关家中，任回到河曲巡镇家中（当时河曲县人民政府设在巡镇）。他们本打算都在河曲定居下来，企图以地方人的关系谋得工作，打进八路军内部去活动。但不满一个月，两人都返回麻地沟，据称不但无法找到工作进行活动，就是住在家里也是心神不安，总觉一言一行都有人监视，长此下去，必将自露。因此都不愿再过河去。刘毅佐感到对上交代不了，便亲自到楼子营（河曲城北小镇）对岸的马栅和榆树湾等村居住，设法开展工作，终于由楼子营的熟人中，找到了一个姓黄的建立了关系，每月发给些活动费，但黄某供给的材料，也是一般性的居多。此后任大光又回巡镇两次，并住在巡镇对岸的段家寨村，假借作小买卖刺探河曲情况，虽收到一些材料，但也多是耳闻之言。周鼎始终未敢再回去，只是在麻地沟协助刘毅佐工作。

麻地沟据点拨归祁继先直接领导后，又找了两个新的助手，一个叫高金田，一个姓许，他们在河曲县城关弄回些《解放报》和宣传小册子，有时还撕揭些街头的文告和拔回几根大烟苗等送给“绥室”转寄“中统局”，作为污蔑解放区的物证。后来许某因违抗命令和泄露秘密，被刘毅佐暗行处死，事后呈报“绥室”，张庆恩亦未加可否。在当时以各据点的人力财力而论，麻地沟所反映的材料，并不低于祁继先所直接领导的榆林，但祁对刘毅佐始终持鄙视态度，经常说刘的坏话，如精神萎靡不振，死气沉沉，遇事多疑寡断，不堪重用等等。张庆恩因偏听祁言，对刘也颇有意见。

樊毓泗负责的河西据点，在布置上比较简单，只配备助手马步蟾一人，张庆恩之派樊前往，是利用他对河西东胜一

带人地两熟，关系较多。马步蟾在二十六师政治部工作时，也住伊盟很久，工作条件较好。但樊到东胜后，以与张庆恩系多年老友，满不在乎，没有认真按照计划向指定的八路军根据地去进行活动，每天躺在大烟灯下吞云吐雾，只是从人们口中找些晋西北和清水河、偏关一带的传闻材料，交马步蟾润色后上报交差。马步蟾去时很想卖一手，但遇上了这样的领导，大为失望，曾暗向“绥室”反映过几次，张庆恩因与樊旧关系深，均置之不理。

王明中的大青山据点，除了搜集八路军根据地和游击区一些有关情报外，主要是利用王明中这个叛徒的以往关系，进行争取、分化和策反等特务活动。王明中是以长官部少校参谋名义派赴鄂友三部工作做掩护，只有鄂友三了解其内情。他由陕坝动身时，是公开随着鄂部来陕坝公干的返防人员前往的。他到大青山不久，即报告说：“已与八路军政治部某工作干部接上头，面谈了几次。”可是从所反映的材料来看，仍只是部队人数、装备、士兵生活和少数部队长姓名等一般性的东西，其他毫无“成绩”。后来因带烟土数十两返陕坝，被查获关了半月之久，张庆恩便将大青山负责人改派了陆超人。陆原系伪中央军校七分校毕业，派到傅部工作，因思想问题被捕送“战青团”受训，随后参加了调统特务组织。“绥室”对他在大青山的要求是以搜集八路军情报为主，并协助鄂友三部加强反共活动，这时已是一九四五年的夏季了。王、陆两人和“绥室”通讯，都是利用鄂友三部电台与陕坝联系。

陈元夫于一九四四年夏派赴包头敌占区活动，助手是商人身份的特务王开运，当时王的眷属住在包头，张庆恩便利

用王为陈元夫安排一切，并负“交通”（即传递情报人）责任，经常来往于包头和陕坝之间，同时还由“绥远省党部”开给证明，可贩运皮毛到包头，以是获利很厚。张庆恩对陈元夫的要求是：既要刺探日伪情报，更要侦察共产党人在包头的活动，特别切嘱如对共产党人的活动有据，必要时可密告日寇特务机关，一则可以借刀杀人，二则可以取得日寇信任，有利于自己活动，这真是心毒手辣。

陈元夫到包头后，即按计划行事，与日寇特务机关取得较好关系，如他由原籍（山西新绛）接家眷到包头，继转送后套，旋复返包头，沿途都畅行无阻，毫无留难，即凭的是日寇特务机关的关系。有一次我看到王开运带来陈元夫反映的材料，也不过是敌寇的驻军番号、人数、兵种和伪军的一些情况，以及汉奸的姓名、职务等，且数量不多，仅有十六开纸数页而已。但张庆恩看了后并不指责，反勉励继续努力。原因是陈负有一项不可告人的使命，即勾结日寇，共同防共。

在抗战胜利之后，包头有一些汉奸特务如王海龙等，因与陈元夫早有工作关系，都摇身一变而为抗战人员，身着国民党军服，佩带“军事委员会党政总队”符号，俨然以胜利者自居。尤其在绥包战役期间，这些有双重身分的特务很卖力气，颇受张庆恩优待。

究竟上述这些情报据点所搜集到的材料起了些什么作用呢？据我所知，一方面是给国民党反动集团制定反动政策和措施作根据，一方面是给“中统局”每周《宣传通报》凑材料，把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政策加以歪曲，借以欺骗人民。这个《通报》由“调统室”电台收抄，交“省党部”宣传科印发所属，在当时是起过一些

反动作用的。还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颁发的《参考资料》，所载污蔑共产党的材料，也多半是由各地“调统室”从各情报据点搜集反映的，我记得其中有些报道就是由“绥室”反映的。每次发来，主持情报的王黎生，总是争着要看一看有没有“绥室”反映的材料。

在各地建立情报据点的同时，“中统局”对陕甘宁边区特别重视，一九四四年曾决定在边区核心地区，直接建立工作据点，由该局派人直接领导，由“绥室”、“宁夏室”、“陕室”各保荐陕西籍的特工一人至二人，到西安“陕室”报到，参加该据点的工作。张庆恩曾保荐由“战青团”受训后于一九四三年参加调统组织的陕西人王鸿勋前往。

(十) 武装特务和“防共”小组

张庆恩为了加强特务活动，还培植和掌握了一部分武装特务，以备随时派进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内进行破坏，他曾请准傅作义，以傅部名义在“绥干团”成立一个“游击训练班”，学员约三百人，由各部队选拔思想反共、胆大敢干的参加受训，编为三个队，计划训练半年结业。程又新被调为队长之一，其他两个，只记得有一个姓邢的。但训练还未期满，日本就投降了，接着绥包战役开始，张庆恩请傅作义把这部分武装特务改编为铁甲车大队，由程又新任大队长。在战争进行中他们很反动，曾在归绥市城郊与人民部队作战多次，得到过长官部的物质奖励。战争刚结束，程又新即被调为长官部上校纪律课课长，从铁甲车大队选拔了三十余人，归程又新领导。这些人全有武器，驻在新旧城间的姑子板，在

张庆恩的直接指挥下，以纪律课作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当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看管五塔寺召内被捕的进步人士，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底程又新调察哈尔省为止。我记得在一九四六年秋季，我的族侄张泰、张桐弟兄二人，就因为共产党嫌疑，被捕送到那里拘押过。

“中统局”颁发一项新的反共措施，即建立“防共”小组（当时国民党所谓的防“奸”小组），要在各部门普遍秘密进行。小组的任务是侦察、监视、搜集各该部门所有公务员的言行，如有哪些社会关系、与何人接近，以及好看什么书籍等，均在注意之列。每小组由三人至五人组成，由“调统室”直接指定组长一人领导进行活动。在汇报材料时，统由小组长密送“调统室”或指定的特工分子，按当时规定，每周要汇报一次。每个部门在原则上只准成立一个组。当时主其事者系“绥室”第二组。小组与小组不发生横的关系，如当时民政厅的小组长李宗林与秘书处小组长李一民互相了解，但也只能“心照不宣”。

在抗战时期，陕北的省级各部门中，绝大部分都有这项特务组织，它对于侦察和发现线索，具有一定的作用。如省府视察员张毓楷的被捕，就是以该部门小组供给的材料，作为有力的证据。后来张毓楷参加调统第二组工作，曾在档案中发现了他被捕的有关材料，他说：“我当时可没有注意到这些。”

（十一）“调统室”的内幕种种

“绥室”在一九四三年以前，编制很简单，仅有主任、

干事、助理干事和录事等名义，对批准的特工分子，由“中统局”发给任用书，统称“调查员”，但一九四三年后，则不发任用书，只是电准备查。

“绥室”化名有两种：一种是对“中统局”使用的，先叫“乔桐”，一九四二年改叫“郑健行”。一种是对下级使用的，有时叫“朱中行”，是用于各地情报据点、各“县党部”和单线通讯员等。有时叫“王和”，是用于由“战青团”结业被吸收的调工分子和管训小组等。“王和”这个化名，是叛徒程又新规定，经呈准使用的，这两个字合起来正是个程字。其他各“县党部”在当时对“调统室”也有使用的化名，如安北柴生华的化名为“刘继邦”，五原白焕瑜的化名为“朱子中”。

关于单线通讯员，张庆恩曾派特工屠由俊在陕坝各机关中进行发展，据他呈报的名册，约发展有三十余人。这些人工作范围不限于本部门，不编组，完全直线领导，反映材料全用化名，真实姓名只有人事部门的底册可查，连整理材料的特工分子，也不知道具体人。在各县也发展有人，如五原有张崇五，米仓有杨茂林等。此外“中统局”直接建立的也不少，如何绍泉、王云泉、绥省府秘书处李一民、西公旗保安司令部秘书李俊卿等，都是“中统局”的单线通讯员，他们因奉命和“绥室”联系，我才明白其底细。

为了保密起见，各地邮局都设有信箱，当时陕坝有“攸字第八十六号”和“攸字第八十六号附一号”两个信箱，前者属“绥远省党部”，后者与“调统室”合并使用。“中统局”的信箱我知道有两个，系“渝字九十一号”和“渝字九十二号”信箱。“调统室”邮寄信件，一律写信箱号数，不

许写出真实名称，违者以泄露秘密论处。

参加调统特务的特工分子，必须要履行几项手续。1.填写特工人员登记表一式两份。2.填写保证书一份。3.宣誓，誓词是印就的，主要是服从总裁命令，遵守团体纪律，效忠职守，严守秘密，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处分等语。一九四三年前，新参加组织的人，把表件填妥后，在蒋介石肖像前宣一下誓就完了。到一九四三年秋季，“调统室”扩大，“宣誓”的铺排，便与前不同。宣誓地址是在张庆恩家里一个专室举行，正壁上挂蒋介石的像，像前设长桌，桌上高燃红烛两支，类似“青红帮”的摆香堂，迷信气氛笼罩一切。宣誓后监誓人讲话，讲话稿系张庆恩代“省党部”主任委员傅作义事先拟好的，由监誓人代表宣读。接着就宣读“中统局”颁发的服务规则，其中有几条违反者即处死刑，如擅自脱离职守，背叛组织，泄露秘密，违抗命令等等，胆小的听了后多感到有些畏惧，忐忑不安，特务头子们也就凭借这个作为约束特务分子的法宝。如一九四四年秋季，董叔明和王兰田争吵，张庆恩有些对王袒护，董叔明即要求脱离“调统室”，态度坚决，并已获得“三青团绥远支团部”干事长赵仲容允为安置，赵向张提出时，张婉词拒绝。赵走后张即向笔者（我当时兼管人事）要董叔明加入组织的文件，但董还未曾履行手续，张当即大发雷霆，责令限期办妥，并说：“如果履行手续，他敢于这样目无法纪，他有几颗脑袋。”不久董以另谋他业未成，便把应履行的手续都办了，张庆恩才放手使用，董也很驯服。接着派董跟翟庭实护送绥远青年军去天水，兼含对董暗中考察之意，由于翟报告还好，这才罢手。

(十二) 一出鬼把戏

一九四六年初，绥包战役将近结束，董叔明被派入张家口市进行特务活动，关系是张庆恩通过呼市天主教堂反动神甫白祥给找的，由两个平地泉籍的教友为董作交通，董化装随着徒步前往，到张家口后的落脚和关系，都由那里的神甫负责。一个月后，董派人送来情报一份，是装于穿在脚上的棉鞋底内带来的，内容不过是一般的表面现象，但因关涉苏联问题，张庆恩却视为至宝，一面抄呈傅作义，一面电报“中统局”，都受到“嘉勉”，并指示继续努力。送情报的人在“绥室”休息了几天，备受招待，走时还指令“继续调查要点”。

董叔明在张家口得到“嘉勉”后，竟受宠若惊，加紧活动，不料已被当地有关部门怀疑而予以监视，在他逃跑的前几天，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天主教堂查户口，最后一次，他被盘查达一小时之久，便自觉事情不妙，于当晚没告诉任何人就偷跑了。他原想逃返归绥，因怕被人追赶，便决计东行，但路途不熟，作贼心虚，一夜里不知摔倒多少次，致面部受伤，最后搭火车到了北平，第二天找到“中统局”北平区办事处，见了负责人孙云峰说明身份，并伪称在张家口被查户口的民警打伤，才逃跑出来。接着郭紫峻召见了，并安慰他回去等候。郭紫峻在当时是“中统局”副局长兼任北平区区长，孙云峰是北平区副区长，董叔明谒见时还不知道这两人的身份。第二天早晨，郭紫峻和孙云峰乘汽车亲到旅馆看他，把董载送医院，扬言伤势很重，须住院治疗，并嘱不许

任何人探病，还留有特务一人陪伴。董在当时自然一切听从郭、孙的安排，假装伤势严重，呻吟不止，接着特务们就大肆宣传污蔑张家口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说什么“在查户口时，一句话答不对，即动手打人，毫不尊重人权”等等的谎言，把董叔明作为中伤共产党人的活资料。同时“中统局”也煞有介事地描画这一问题，除电董慰问并发给奖金和令北平办事处垫发医药费用外，并电“绥室”张庆恩就近安慰董的家属。张庆恩当时还莫名其妙，只有在生活上对董的妻子多加照顾，长官部也给董发了奖金。后来董由北平来电，说他现已清醒，要妻子赴平照拂，绥远当局于次日晨即送其妻子搭军运机前往。董妻在上飞机时，还以为人已凶多吉少，大哭特哭，张庆恩亦为之伤感。不几天，董妻由平来信向张庆恩致谢，但信虽由董妻出名，而笔迹却出自董手。张庆恩看罢只是沉吟微笑，可能已意味到其中内幕的一二。

这套鬼把戏是祁继先接任“绥室”主任后，赴平谒见郭紫峻在董叔明家中作客时听董亲口讲的。董还说：“我找北平办事处，只希望暂借一部分生活费和向‘绥室’电报经过，绝没想到后来有这样的幸运。”又说：“我在医院里吃的很好，起先有办事处的同志陪着我，以后我女人陪我，客人用不着我招待，每日除吃饭睡觉外，就是看书报，现在出院，还不是这样，不出来也好。”这正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间，接着张家口被反动部队侵占，“中统局”即任用董叔明为“察室”主任。因此祁继先经常对人们说：“人活一世，就看走运气不走运气，运气来了，马上飞黄腾达，叔明还不就是这样吗？他以前做过些什么！”

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特务头子们，玩弄这一出鬼把戏用意

是很恶毒的，那时军调小组正在各地进行工作，北平为军调处所在地，中外观瞻所系，他们变假为真，目的是要造成对共产党不利的舆论。

（十三）对军调小组的活动

一九四六年春，军调小组来到归绥市，共方代表潘纪文等，被接待在归绥市公教医院一幢楼房内居住，一切生活上的安排，均相当周到，在表面上可说是“以礼相待”了。但以张庆恩为首的“调统室”和其它有关部门，却布置了不少的特务，化装为勤杂人员，从事提水、端饭、扫地等工作，在暗中执行监视、窃听、跟踪等任务。他们每日汇报前一日的情况，能了解多少，汇报多少。如系来访者，要了解来者姓名，穿什么衣服，谈多长时间，谈那些内容，以及双方表情等项。如共方代表外出，要了解到什么地方，与何人接头，在路上与何人谈话或打招呼等等。陈元夫在当时被指定看茶炉和提水，他曾说，为了窃听情况，每逢客人来他就去送水。在共方代表外出时，常有四、五人跟踪，除“绥室”外，还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归绥站等机构派来的人。这些人都是各自汇报，不发生横的工作关系。他又说，在这一阶段，王明德（克俊）去的次数最多，差不多每日都去，长官部的人员有时也去。但张庆恩企图发现的是不认识的生人或他一向怀疑的人，如李居义、周北峰、于纯斋等。在平时祁继先、程又新经常提议要对付这些人，张庆恩总是说：“有傅先生负责。”但在搜集这些人的材料时，却毫不放松。这次共方代表之来，他认为有机会，曾对陈元夫说：

“关于我们怀疑的人，你也知道一些，应更好地注意。”就是想借此发现这些人更新的线索和有力的证据。

军调小组在归绥市工作期间，“绥室”把已经公开的情报据点如安边、榆林、神府、麻地沟等完全撤销，又秘密在绥东和绥南建立新的据点，如在清水河县就建立有据点，派陶琏负责，郑一如协助，指定向偏关、平鲁等地区活动。在绥东方面，是沿铁路线卓资山、集宁、丰镇等地，经常派郑思本、秦国宝、胡尚儒等化装商人前往刺探军情，一直到集宁战役揭开为止。

注：这篇材料中，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的，大部分是笔者从档案中了解的，少部分是从张庆恩和陈国兴谈话中听到的。一九四二年六月以后的情况，则多半是笔者亲身参与的。

帝国主义在呼市的一个间谍组织

——“汉瑞洋行”的侵略罪恶活动

曹 毅 之

（一）“汉瑞洋行”的内幕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进行各种侵略，在呼和浩特市，它们也曾以各种方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我个人曾为帝国主义服务，担任呼市“汉瑞洋行”总务工作。

帝国主义在我国沿海一带的通商口岸，是其活动的范围，在内地，按条约是不允许随便居住经商的，它们除了依靠不平等条约在内地设立教堂外，别无停留之所。呼市地处我国西北要冲，在商业、交通上都具有特别重要性，所以帝国主义对于呼市窥视已久。在“汉瑞洋行”未设立前，只有个别的帝国主义分子来呼市以游览为名，停留几天即行离去，不能为所欲为地进行政治活动。

“汉瑞洋行”是一九一八年开始成立的，地址在呼和浩特市新城道（旧绥远省教育会南边），即现在中山西路的西端，院宇是同民马姓的产业，租给“汉瑞洋行”经理 Sodbom Gourage 和 Sodbom Gosdov，最初汉译为生瑞恒，后改为苏

德邦·乔治和苏德邦·葛斯达乌弟兄二人，院内房屋完全是“西洋式样”，汽车出入非常方便。苏德邦弟兄二人是瑞典人，他们是张家口美国基督教美普会牧师苏得本的儿子，出生于张家口。苏德邦弟兄二人常在天津、上海来往奔跑，以后就来到呼市定居下来开办洋行。接着又有瑞典人鄂北格（Sumer Torgney Oberg）的儿子鄂北毅也来呼市居住，他出生于萨拉齐，在山东烟台、河南鸡公山的瑞典学校读过书。鄂北毅经常往来于天津、青岛和外商联络贸易，苏德邦即将新城道“汉瑞洋行”旧址移让给鄂北毅，苏德邦弟兄二人另在通道街甘新礼拜寺南边租到郭黄龙大院一所，改修了房舍，称“苏记汉瑞洋行”（他们各有汽车一辆）。至此帝国主义分子在呼市有了落脚之处，他们号称为“中国通”、“蒙古通”。他们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会说流利的汉话，又学会了蒙古话，他们与百灵庙云王，四子王旗潘王，杭锦、达拉特、准格尔各旗王公，以及察哈尔盟的各王公都由认识到结交成为密友。他们利用这些关系，招摇撞骗，吸引各国向往内蒙游览的各种各色“洋人”。苏德邦弟兄和鄂北毅都有手枪，经常出外游览打猎，苏德邦弟兄与鄂北毅勾结绥远省军政首脑人物如傅作义、王靖国、冯曦等人，经常请客宴会，往来密切。呼市不是对外通商口岸，本不许外国人随便开办洋行、公司等贸易机构，但苏德邦和鄂北毅对反动政府官吏进行拉拢、结交，反动政府也就允许他们租房居住，开设洋行。在包头也有一个瑞士商人名史密斯者，开办了一个“甘草膏公司”，利用包头的上等甘草原料，又从瑞士运来机器，生产甘草膏，运往国外销售，获利甚巨。该瑞士商人开办公司足有三年之久（一九三三——一九三六年），反动政府亦未过问。

一九三六年夏，因绥远省政府交际处长向史密斯索贿三千元未遂，始下令停止其公司业务。

鄂北毅与苏德邦弟兄在呼市开办洋行后，一方面与天津外商如美商“德隆洋行”、“仁立洋行”，英商“麦加利公司”等密切联系，将呼市、包头的皮毛、羊肠及油料作物等行情及牌价，随时电告天津，同时他们自己也购买皮毛、羊肠、油料作物运往天津出售，获取利润。另外他们与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的各国洋商、公使、领事、武官、新闻记者以及各国来我国游历的“洋人”，有密切联系，扩大接待，广为招徕，每年每月不断地来呼市，住于“汉瑞洋行”中。鄂北毅与苏德邦借此机会，大发洋财，规定每个“洋人”每天房屋费、饭费以及招待游览费用十元。同时在召河、百灵庙设有蒙古包及蒙古佣人招待“洋人”游览草原风光，如游览百灵庙、召河、五当召、昭君坟及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灵寝等地。凡来游览的“洋人”都带着枪支，到大青山一带随便猎取野青山羊、大角盘羊，他们知道这种野兽是大青山的特产，是稀有的品种，猎获后即用火车运往北京、天津进行制作，再运往海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博物馆。反动政府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派兵保护。这些“洋人”游览各地时带着大型照像机，随时随地拍照，并采矿石、植物标本，收买古铜、古磁等物，携带而去。有时遇到各国公使和领事来呼市游览时，由鄂北毅和苏德邦弟兄介绍，绥远军政当局即设宴招待。这样，鄂北毅和苏德邦弟兄与官方交往更为密切，在呼市就能为所欲为，无人过问。

(二) “中瑞科学考查团”

鄂北毅和苏德邦在呼市开办洋行之初，即有所谓“中瑞科学考查团”的组织，往来活动于北京、甘肃、新疆、西北一带。之后，苏德邦老二和老三就参加了这个考查团，苏德邦老大，自己打算单独经营“绥新汽车公司”，先期到新疆被盛世才所逮捕。鄂北毅也充任考查团的联络员，负责通信、运输以及对官方交涉等事务。所谓“中瑞科学考查团”，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Seven Haden）所创立的。赫定号称“考古学博士”，曾在我国内蒙和大西北进行过所谓考古工作，他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地质研究所订有协定，成立了所谓“中瑞科学考查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允许他在我国内蒙和大西北自由活动，将所有在考古方面的收获物，交与教育部和地质研究所，同时拨一部分赠给赫定。科学考查团的成员，规定由中国政府派二人参加，后竟一人也未派。经费完全由斯文·赫定担负。这个协定最初为北京几个大学中的教授所反对。因为这是引贼入室的办法，可是国民党政府却置之不理，听任赫定借“中瑞科学考查团”名义，随便进行盗窃活动。

赫定在没来中国西北之前，先在印度及我国西藏进行过考古活动，获得的许多宝贵资料，全部被他窃去。后来他转来我国西北。成立“中瑞科学考查团”，总部设于北京东观音寺，其经费来源大部分由瑞典政府发给。“中瑞科学考查团”成员最初由十九人组成，国籍包括瑞典、德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国，另有白俄二人。此外雇用蒙古人、汉人八

至十人作炊事、勤杂、带路、饲养员等工作，携带骆驼队和大型帐篷（帆布和毛毡帐篷），由呼市“汉瑞洋行”出发，其路线先至百灵庙，再深入阿拉善旗、二里河子，经甘肃北部，潜入新疆哈密、吐鲁蕃、乌鲁木齐，再往西行至波斯，以达中东、土耳其，由地中海登欧洲至德国转回瑞典。赫定在上述路线中设有许多留守站，如呼市、二里子河、甘州、凉州、肃州、阿拉善旗、哈密等地。考查所获得的物品装箱，完全由骆驼队运到呼市，交与鄂北毅和苏得邦，再由火车转运到北京总部，进行分类、修缮、制作、摄影、包装整理等工作，然后运往国外。这个考查团带有地理仪器、摄影机、气象仪器、直流电灯，其主要工作是：①绘画地图：将内蒙、宁夏、甘肃、新疆一带绘成很精细的地图草图，运往国外；②挖掘古物：他们在大西北一带随意进行挖掘，挖出许多宝贵物件如：古磁、古铜器、铁器、石器、砖瓦、动物、鸟类骨骼、古钱币、化石以及古书竹简等物，公然据为己有，直接运往国外；③采集标本：考查团对于采集标本也十分重视，有关动物、植物、矿物等有价值的标本都搜集了不少，特别是发现了古代动物恐龙的骨骼和恐龙卵等珍贵物品，植物、矿物的标本也搜集得很广；④气象调查：他们带着气象仪器，在所经过之处都作了详细的气象测定，如温度、湿燥、风向、风力、雨量、雪量等等调查；⑤摄影：他们携有大型活动摄影机和远距离的摄影机，到处拍照，尤其是对于名胜古迹、山岭、河流、城堡、道路以及各地人民生活习惯、宗教、风俗等方面，尽量拍摄，供作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资料。据他们说：这些照片很宝贵，很值钱。

这个考查团的成员，时常酗酒滋事，苏德邦老二彼得，

在阿拉善旗留驻，因酒醉出走草原，遇大风雪冻死。尤其甚者，有一个德国籍考查团员，名白肯克姆，在二里子河留驻，担任绘画地图观测气候工作，是个极其卑鄙的流氓，他以五百元现金赁来一个美貌的年轻女子姘度，后来生下一个孩子，数年后他调离二里子河回国搞整理古迹工作，即将赁来的女子和小孩扔掉不管。帝国主义强盗就是如此的蹂躏我国妇女。

赫定从我国大西北到了新疆以后取道中东，经过伊朗、阿富汗，到达地中海登欧洲大陆而返瑞典，即在欧洲各大国作考古报告，“声誉大振”，他自谓：寻得了“古代欧亚通商大道”，著了一部《亚洲腹地旅行记》。赫定此行将我国许多古代文物及世界稀有的动、植物标本盗窃而去，反动政府竟充耳不闻。

赫定将搜集的文物古物，运至美国纽约和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同时在百灵庙描绘了蒙古庙宇的模型，并配备了一切装饰品，在纽约和斯德哥尔摩建成二所蒙古庙宇，将蒙古族的衣服、装饰品、生活用品、房屋中陈设的家俱和供神的神龛、香炉等物，一起陈设起来，卖票令人们参观。同时将所搜集的古文物标本送给美国政府陈列于纽约博物馆，又将一部分带回瑞典送给瑞典政府陈列于斯德哥尔摩博物馆。据他们说，赫定也把珍贵文物的一部分送给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可见赫定此行，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得到美国、瑞典和德国的大力支持而负有“特殊使命”的。

(三) “绥新公路勘查团”

在绥新公路未开辟前，旧绥远和新疆的交通全是依靠驼队运输，由绥远到哈密、乌鲁木齐，往返一趟就是一年的时间。国民党政府计划开辟所谓绥新公路，就器重了所谓“考古博士”赫定，把他由瑞典邀请到南京，协商组织绥新公路勘查团。于是这个打着“考古博士”头衔实际是盗窃文物古物的赫定又奉命组织了这个公路勘查团。这个团的经费完全由国民党政府负责，团的成员共有三十人，里面只有三个中国人，是国民党政府铁道部的两个技正耿姓和李姓，一个气象专家黄姓，其余为瑞典、挪威、德国籍人员。团长赫定，副团长黄姓，勘查团的任务是勘查由旧绥远到新疆的公路。赫定先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办理一切协议手续，领得大批款项，并且见了蒋介石和铁道部长孙科，备受款待。在北京进行筹备工作达四个月之久。赫定担任勘查团团长的职务以后，各国报纸为他大吹大擂，如西文《天津时报》、《北京时报》、《上海字林西报》，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纽约的《每日先驱论坛报》以及法国巴黎、德国柏林、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报，都一致称赞赫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个行动。北京美商“美丰公司”的经理，特赠赫定福特轿车一辆、大汽车三辆，勘查团又购了大汽车三辆。苏德邦老三葛斯达乌担任总务工作，先将需要的汽油由天津运到呼市，然后雇驼队先运送到沿路各站，派人看守，以供需用。北京美商“美丰公司”赠送的汽车，先期运到呼市，卸车时曾发生一件伤亡事故，即在车站上，汽车与火车相碰，当场死亡

蒙族司机一名，苏德邦老三受轻伤。考查团还雇用炊事员、勤务员、汽车司机、引路员等二十余人，包括汉族、蒙族、回族，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引路员是选择蒙族和回族中年纪大、最清楚草原情况和在大西北走驼队驿程有经验的人。考查团人员在呼市作预备工作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检验仪器、购置皮衣裤，与引路的蒙古人和老回民共同研究绘画初步路线地图。赫定当时提出所谓“二条路线”，要在实地勘测中选择一条最好的路线。据说在经过“松道岭”时才能看出哪条路线比较有优点。铁道部的技正也负责测量建筑公路桥梁、水坝的工作。

赫定等在呼市“汉瑞洋行”聚齐，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特设宴招待。在起程的前三天，希特勒由柏林拍电报给赫定，文曰“祝你成功”。赫定和全体团员接电报后，欢喜若狂，认为受希特勒的青睐，无上光荣。全团于四月间由呼市出发，先到百灵庙，然后由百灵庙转向西北，据他们雇用的勤务员以后回呼市说：沿途行进很慢，主要测绘地图，观测气候、风向、温度，同时在重要的地方也进行古物挖掘。沿途对蒙古王公尽量送礼结交，到县市地方，地方官吏则表示热烈欢迎，到了乌鲁木齐，盛世才也盛情招待。赫定到达乌鲁木齐时，全团人员整体了一个多月，从前单身去乌鲁木齐被盛世才拘留的苏德邦老大乔治，经赫定交涉释放，乔治即迅速乘驼队返呼市到天津居住。

考查团在乌鲁木齐整体后到了兰州，经西安，将全团人员和汽车，用火车直运南京，完成了国民党政府所交付的任务。在南京时，赫定数次与蒋介石、宋美龄会晤，共同拍照，以后刊登在他著的旅行记上。铁道部则尽情招待考查团

全体人员，孙科还接见了每个团员。国民党政府赠给赫定三十万元及大金质奖章一枚，全体团员均按等级得到金钱和奖状。赫定将此次勘测路线地图与有关资料窃回瑞典很多。

赫定回瑞典后受到盛大欢迎，认为这是一个“创举”，是瑞典的“光荣”。他又多次向各国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各国大报都竞相登载。他还去德国谒见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起时，赫定因与希特勒有特别关系，被瑞典政府逮捕软禁，大战后一年，他即逝世。

(四) “英国佛教朝觐团”

一九三四年夏，由英国来了一个所谓“英国佛教朝觐团”，团长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名克礼查太太 (Chlather)，随带两个团员，一名克瑞查，一名克伦普，他们携带两辆卧车、三辆大卡车，事先由“汉瑞洋行”经理鄂北毅在天津、北京和他们接洽联系，“英国佛教朝觐团”住于北京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于一九三四年夏转来呼市居住于“汉瑞洋行”，鄂北毅对他们非常优待，住屋与吃食特别安排得好。这个所谓“英国佛教朝觐团”的内幕，原来是英国对班禅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来呼市“汉瑞洋行”之后，带着北京朱子桥将军致傅作义的亲笔信，并声称他们三人是英国信仰佛教的教徒，来中国专门朝见班禅，请班禅为他们祝福。但英国领事馆不同意，不给他们发护照，在北京见了朱子桥将军才领得一封信，当时王靖国接见了他们（傅作义外出不在呼市），允许他们居住，前往西宁朝见班禅。这个朝觐团表面上的这一套说法，不过是一种烟幕而已，实际上是英国的

一个政治阴谋，一方面诡称英国不给他们护照，一方面利用一个老年妇女作掩护，来中国对班禅进行政治勾搭，当然是英国政府安排的。

当时国民党政府派赵守钰当护送使，打算护送班禅回藏，“英国佛教朝觐团”来呼市时，班禅早已西去，抵达西宁。所以他们急速由天津、北京前来呼市，尾追班禅。鄂北毅就在北京将这一生意承揽下来。他们欲前往西宁，路途遥远，无熟识道路的人是不容易到达的，鄂北毅即为尽力活动，一方面取得了绥远当局的允许，并请王靖国，傅作义给宁夏、兰州当局写了信，让朝觐团随身带去，鄂北毅决定亲自护送，配备一切用具及枪支弹药。鄂北毅作为总负责人，另外雇用汽车司机、勤杂员、炊事员、带路人共六人。

这三个英国人住在“汉瑞洋行”期间，每天晚上开会，差不多每天都用打字机打好文件、信件，送往邮局（不用中国人送邮），每周差不多都有外边送来的电报、信件，有来自英国的，也有来自北京英国领事馆和天津私人的。他们每日晚上密谈以后，就打字写信，白天休息，并且把他们的一切废纸都用火焚烧了。

他们六月间起行，开出汽车五辆，从呼市出发经包头、临河、宁夏、兰州。在离兰州五十公里处的小谷中遇见土匪十余人，把他们的枪支抢走，又把现洋、钻石戒指、贵重物品一并抢去，地方政府得罪不起洋人，派军队出去，几日即将土匪逮捕，追回些原物。他们在兰州停留一周后，即向青海而去。到达西宁后与班禅会晤，谈话数次，其内容局外人是不可知的。但肯定不是所谓什么信佛，不是什么朝觐，而是与班禅有秘密勾搭。他们会晤了班禅之后，即将汽车器具拍

卖，从兰州乘飞机直接到天津返英国。鄂北毅亦与他们同机到天津后又回呼市。鄂北毅回呼市后非常高兴，首先谈到他们与土匪交战，几乎被打死，幸免于难。其次谈到，克礼查老太太赠送他八千元。但我看不只此数，因他给他的未婚妻往瑞典汇去一万多元，准备结婚，另外这个佛教朝觐团在兰州拍卖汽车价钱很贱，有人买下用帆船运到呼市，又由火车运往北京出售，赚了好些钱。克礼查老太太送鄂北毅本人一辆小卧车，鄂北毅帮助他们搞政治阴谋活动，又获得了很大利润。

(五) 顾德莲夫妇

一九三三年秋天，绥远省政府交际处尹副官领来一对白俄夫妇，那时鄂北毅已回瑞典结婚去了。尹副官说：这是傅主席的朋友，请招待他们在“汉瑞洋行”住一个时期。男的叫顾德莲先生，女的被称为顾德莲太太。过了一些时候，又来了一位东北军官（后来知道此人当过沈阳警备司令，名张复，号又鸾）带着女人常到“汉瑞洋行”和顾德莲夫妇谈话吃饭，非常厮熟，原来张复和顾德莲是活动包揽绥远省的羊肠，他们估计全省年产羊肠二十多万付，不让另星小商买卖，要一齐包下来。在呼市开大型工厂，经过加工运往天津出口。他们把羊肠分为数种：用玻璃球放进羊肠内通过去，有二十二、二十、十八、十七、十六等许多号数，羊肠越粗越好，越值钱。以后有一个犹太白俄商人也来呼市，是顾德莲由天津请来的，因为顾德莲没有资本，让这个犹太白俄资本家投资。

顾德莲本人是白俄贵族，曾住于哈尔滨，是亲日的谢米

诺夫空军军官，以后娶了一个年轻白俄女人，美丽、风流，会骑马、游泳、溜冰、跳舞、开小汽车，会做俄式大菜、点心。顾德莲结识了东北军官张复将军，一同来呼市，由张向傅作义介绍，请将绥远全省羊肠包揽给顾德莲。傅完全同意。顾以后又带来一个白俄，名顾理克，精通法文、英文，又有骑术，傅作义聘为英文教师和三十五军马术教官，每日教傅学习英文。

傅作义以后常来“汉瑞洋行”与顾德莲夫妇交谈、吃饭。他来“汉瑞洋行”时，带着卫兵数人，二人在大门里站岗，二人在院中留守，日子长了，我观察其行动有异，顾德莲本人尽力让其太太与傅接近，打开留声机教傅跳舞，教傅俄语，行动非常亲密，傅也常给他们钱，有时傅和张复来洋行同顾德莲夫妇吃饭玩乐，深夜才散。傅有一次请王靖国、赵承绶来“汉瑞洋行”宴会，顾德莲夫妇作陪，饭后顾德莲太太跳舞助兴。

顾德莲以后又从哈尔滨带来一对白俄夫妇，男的名马次纽克，租到大马路上的“九一八纪念堂”（即现在的“工人文化宫”，日寇退却时，将“九一八纪念堂”原址焚毁，解放后才又建筑起来），开了一家电影院，顾德莲从中也收取利润。以后又从哈尔滨请来四个白俄，为首的叫日达诺夫，他们是资本家，赁到小召前一所院子，从天津运来机器，开了面粉厂，顾德莲也从中获取利润。顾德莲夫妇以后在宽巷子赁得一个院子，由“汉瑞洋行”迁移过去，他即经营商业，从呼市购买胡麻、菜籽、山芋运往上海出售。

一九三七年日寇将入侵呼市时，马占山正由东北来呼市，顾德莲认识马占山，晤面后，马令其准备随他西去，顾德莲

夫妇退居宁夏，又结识了马鸿逵，后到兰州、西安、武汉找他的白俄朋友，一去即不复返，据闻被陈诚在武汉枪决了。顾德莲太太住在宁夏，为马鸿逵所宠爱，照常参加当地社交，仍甚活跃，以后下落不明。

（六）诺尔大夫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由上海来了一个德国人，住于“汉瑞洋行”，衣服阔绰，气派十足，鄂北毅介绍说：这是上海德国“诺尔医院”院长诺尔先生，同时是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的私人医师，在上海很有地位，傅作义也设宴招待。诺尔到呼市来，是专为猎取大青山稀有的青山羊和大头盘羊的，想得几个标本。诺尔在呼市住了数日，鄂北毅作向导带他出去打猎，绥远当局派警察一班随同保护，因诺尔来呼市时带有汪精卫致傅作义的信，所以傅对诺尔特别重视，他们准备好乘马，携带厨师勤杂员与保护他们的警察队一同出发，先到武川，诺尔带有大型照像机和远距离照像机，在召河住下，又去百灵庙游览，由百灵庙折向固阳，返包头后，又去五当召游览。诺尔打获了四只大头盘羊、五只青羊，并且拍了许多照片，在包头时，亦受到官方招待。

一天忽然由南京发来急电，一份给绥远省政府，一份给“汉瑞洋行”鄂北毅，电文大意是：汪精卫被刺病危，请转告诺尔大夫速返南京，并派有专机迎接。当时绥远省政府不知诺尔已到何处，即给武川、固阳、百灵庙、包头等地打电话询问，下午飞机即来呼市，但诺尔大夫本人不在，据闻已由固阳返包头，飞机又飞包头。诺尔将猎获的九只野羊一并

带上飞机直飞南京，临行时，赠给鄂北毅二千元。解放前，帝国主义强盗就是这样随便来我西北内地，大肆劫掠，反动政府则奴颜婢膝，极尽媚外之能事。数日后诺尔给鄂北毅来信说，汪精卫已转危为安，有机会拟再来呼市打猎游览。鄂北毅借此机会又发了一笔洋财。

(七) 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是美国人，任美国《太平洋杂志》的远东研究员，是鄂北毅的好朋友。他住在北京，常到我国西北各省采访新闻。他经常来内蒙西部地区活动，学会了蒙古话，并结识了几位西部区的王公。他到了各王公府上，总是受到款待。他特别注重蒙古人的生活、习惯、蒙古包的装饰，拍了许多照片，并且搜集蒙古王公与各大庙喇嘛教的历史、传说，他以这些资料写成系统的文章刊于《太平洋杂志》，专供欧美读者看，不久拉铁摩尔竟成为美国的“蒙古通”了。他也常偕同北京、天津的各国新闻记者来呼市及后山蒙旗游览。他来呼市时携带枪支，自备帐篷，他与鄂北毅常去拜访呼市天主教堂的神甫和公教医院的院长比利时人费怀理，彼此往来密切。他每返回北京、天津时，就在京津外文报纸上发表游览蒙古草原的谈话，一时跟他来呼市和百灵庙、五当召的外国人很多，鄂北毅也借此大发洋财。绥远省政府对外国人的一切违法活动一概不管，并派警察保护，以防意外。以后，鄂北毅说：拉铁摩尔是美国总统的朋友，被召回美国作很重要的工作去了。

(八) 蓝尔生 (Larsson)

蓝尔生也常来呼市，住于“汉瑞洋行”，他的年龄比鄂北毅大得多，是与鄂北毅的父亲鄂北格同时作牧师的。提起蓝尔生这个人，非常复杂，因为他是一个国际间谍，又兼垄断商人。他的活动最初在呼市，以后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迹。鄂北毅和蓝尔生很要好，蓝每来呼市，鄂北毅总是尽情招待，认作他的父辈，在中国西北很有权威的瑞典老人。

蓝尔生是瑞典人，于光绪十三年随同美国协同会七十余人来呼市，住于县府街耶稣教堂，学习汉语和文字，二年后调往包头，住于召梁之耶稣教堂，学汉语和蒙语。曾与包头镇守使某姓结交为友，过从甚密。一次他随包头镇守使去达拉特旗，参加祝贺王爷的儿子结婚典礼后，就留住于达拉特旗，与达旗王爷勾结，学习蒙文蒙语及蒙族生活习惯，此人诡计多端，善于社交，不久在乌兰巴托又攀识了好些大活佛和王公，居住于乌兰巴托，表面作基督教的销售《圣经》工作。之后，他索性将销售《圣经》工作撤掉，揭出了他那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牌子，大干起来。他在乌兰巴托用从美帝国主义那里领来的资本开过金矿，虐待工人，从中攫取巨额利润。当时，乌兰巴托当局与北京反动政府交恶，双方准备作战，蓝尔生在大活佛面前吹嘘他如何能干，愿前往北京调停战事，大活佛即委他为代表，蓝尔生往来奔走调停，为袁世凯所赏识，战事和解后，即“荣任”袁世凯的顾问。蓝尔生也曾充当斯文·赫定“中瑞科学考查团”的主任，与赫定到过乌鲁木齐，帮助赫定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过许多

挖掘盗窃文物古物的工作。蓝尔生也曾协助美国纽约博物院在内蒙与乌兰巴托进行过盗窃挖掘工作，曾获得了世界罕有的大型恐龙骨骼数具及许多恐龙卵，并窃取了动物、植物、矿物等重要标本，得到美国纽约博物院的奖状。此外蓝尔生在乌兰巴托开办过“蓝尔生公司”，专门收买皮毛和大批蒙古马匹，运往河北、山西、山东出售，蓝尔生从中大发其财，那时外蒙出口的马匹几乎被他单独包揽。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成功后，蓝尔生被逐，迁移到内蒙德王府居住。德王把一座蒙古庙赠送给他，建筑成了一所外观是蒙古式里面是“西洋式”的别墅。他在旧察哈尔全境威风凛凛，在德王的支持下，仍然搞他的马群买卖，王公们都巴结他，以后他的左腿拐了，蒙古人都叫他“蓝拐子”，在内蒙和旧察哈尔境界中，妇孺皆知，他剥削内蒙古人民的血汗是难以统计的。迨至日寇侵华，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这时蓝尔生就作了德王的参谋长，“助纣为逆”，欺压蒙汉人民。解放前夕，这个坏蛋逃回美国去了。

苏德邦弟兄和鄂北毅在日寇侵入呼市几个月后，被日寇领事馆多次询问，不允许他们在呼市居留，鄂北毅遂迁往北京居住；苏德邦迁居张家口，不久被日寇逮捕，旋即释放，不准在张家口居住。日寇投降后，苏德邦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参加了什么“中华救济团”，返回呼市，携带电台并汽车数辆及瑞典、荷兰、美国籍工作人员，共有十余人，住在包头。解放前夕，他们携带一切车辆逃往兰州、西安，最后被中国人民驱逐。

旧绥远省三个“独立王国”

刘 映 元

中国的封建军阀官僚和蒙旗的王公仕官，长久以来都是各自为政，因此省与省、县与县和旗与旗毗连接壤的地方，出现了好多“三不管”区域。这些区域一方面是革命和民主的种子扎根生芽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不法地主称王称霸的地方。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在省与省之间建立了不少边区和抗日根据地。但在河南、湖北和陕西三省交界处也出现过一个“土皇帝”别庭芳。从前的绥远省境内也发现过三个“独立王国”，那就是托克托、萨拉齐和归绥三县之间的祝乐庆，萨拉齐、武川和固阳三县之间的巴总窑子，伊克昭盟的乌审旗、鄂托克旗、郡王旗、札萨克旗、东胜县和桃力民办事处六个旗县处之间的通岗浪。这三个“独立王国”一个在平原，一个在山区，一个在沙漠里边，它们虽然性质不同，表现各异，但是都反映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消极反抗，也可以看出一些旧社会反动阶级内部矛盾的政治情况，所以很有记载的必要。

托克托县的祝乐庆村

祝乐庆在归绥、萨拉齐、托克托三县交界之处，行政上

属托县管辖，原名竹拉沁，自从韩国良掌握了这个村庄的领导权以后，才改成了祝乐庆。它的位置在黑河灌区以内，土地非常肥沃，过去就有比较雄厚的自卫力量，地主阶级更有“一声喝到底”的声势。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害怕子弟腐化堕落，订有很严格的公约，防范居民通匪窝娼，谁要是违犯，即行驱逐出村，绝不容情宽恕。因此小股土匪不敢来祝乐庆骚扰，官兵驻扎以后年轻妇女即不洗脸。这个村庄从清朝到民国，一直抗粮抗捐，对邻村常以武力霸占水利，惹出乱子，有平日养活的“顶命鬼”给去县衙门坐班房。日本人占领以后，由大户雇佣地痞流氓充任村长，以应付三方面（八路军、国民党的游杂部队和日伪军警宪兵特务）的工作人员，大户则在幕后主谋策划一切。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以后，从河套回来一个在政治上不怎么如意的旧知识分子，本村人韩国良，众人由于他参加过抗战，便把他拥护起来对抗傅作义的兵粮两大苛政。韩国良也想在地方上作一番事业，参考了许多旧小说中寨主和庄主的土办法，便和政府调皮捣蛋起来，结果弄得托县县长王怡对他一筹莫展。于是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三年当中，祝乐庆成了一个神秘地方，韩国良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韩国良嗜象棋，喜书法，从当托县高小的文书一直到抗日战争，便是托县的地方绅士。抗日战争期间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托县“游击县长”，但始终不为傅作义所重用，在伊盟沙漠中“窝囊”了七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一点也没有捞着。他回到祝乐庆以后，即从事“地方自治”工作，想露几手叫傅作义看看，从而团结起群众，笼络住人心，以作将后竞选伪国大代表的政治资本。那时散兵游勇很多，土

默川尽是王有功、郭长清和高理亭三个部分的官土匪，一到黑夜就分股四出抢掠。韩国良首先从自卫工作着手，重新修葺了祝乐庆的土堡，村子当中建起一个非常高大的炮台，并在祝乐庆四面十里以外的村庄，设置了好几处梁山泊“朱贵酒店”式的侦察站，打探周围的情况，订有交通联络信号。发现土匪以后，白天笼烟，入晚点火，炮台上日夜有哨兵了望，韩国良经常住在炮台上边，准备随时调动民团。他得到情报以后，先叫人到龙王庙的钟楼上敲钟集合队伍，然后用五色旗帜和五色灯笼指挥战斗。据说北方壬癸水是白旗白灯，东方甲乙木是蓝旗蓝灯，南方丙丁火是红旗红灯，西方庚辛金是黄旗黄灯，以说明土匪发现在何方和哪一个方向应加强戒备，团丁便跟着他的旗灯挥舞几下和庙钟撞击几声来进行各种不同的军事动作。祝乐庆虽只有百十枝步枪，这样一来，三五百土匪也无法进犯，老乡们在韩国良的组织下，总算过了好几年安定的生活，韩国良也在老乡们的心目中建立起很高的威信。

韩国良居住的那座炮台，足有三丈六尺多高，共分上中下三层，里边都有“消息”埋伏，底层是闷棍，中层是翻板，踏着翻板即受伤遭擒。很象《七侠五义》中白玉堂破的那个襄阳王的“冲霄楼”，因此韩国良被人们给送了一个“炮台王”的绰号。他本人住在炮台的第三层楼上，工作、休息、看书都在那里。楼上砌有火炕和锅灶，除了备有濡木、灰瓶等外，还有储存饮水、米面、柴炭的仓库。屙屎撒尿也不用下楼，有厕所通往底层。韩国良也善于做“宣传教育”工作，每天晚上用喇叭向老乡们讲解“自卫”和“自治”的道理，并且编有因地制宜的教材，叫小学的老师给儿童们讲解，不许

用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课本。县政府派人来催粮要兵，他用软拖硬抗的对策抵赖，反正是不出一颗粮，不派一个人。在庞炳和郭栋担任托县县长的时候，因庞炳没有强大的政治靠山，根本不敢碰他。郭栋和他是一个地方人，对他更不好意思。所以祝乐庆从日本投降以后很少交纳官粮，也没有出过一个壮丁。老乡们对韩国良越发奉如神明，莫不言听计从。祝乐庆附近的归、萨、托三县其它村庄的地主大户，也跃跃欲试地想照韩国良的办法来行事，这对傅作义的统治很不利，结果派军队武装镇压，这个“独立王国”遂宣告灭亡。

董其武继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后，换了一批新人当县长，此时傅作义把防线由河套的头道桥一直拉到北京的芦沟桥，所部军队经常到河北和东北跟解放军作战，为了收买新开地区的民心，把军粮和壮丁补给的重担，完全放到“老窝”绥远地方人民的身上。新任托县县长王怡上任以后，先派行政人员到祝乐庆要粮拨兵，被韩国良用软言软语顶回。继派武装警察去祝乐庆掘窖、抓丁，又被韩国良以真刀真枪打跑。于是王怡觉得如果征不平祝乐庆和搬不倒“炮台王”，托县的粮政和役政就无法推行，便亲自进省向董其武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说韩国良私通人民解放军，炮台上暗藏着乌兰夫主席派过来的地下工作人员。董其武怕归、萨、托三县的村庄都效法祝乐庆，所有地方绅士全成了韩国良，他主席就坐不稳当，即于一九四八年春天，令“绥南剿匪总指挥”刘万春亲自率领一百多辆汽车运载的美式装备的军队去扣捕韩国良。祝乐庆的土围和破枪，如何吃得住摩托化的步兵进攻，庄户娃娃哪见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正规部队，看见黄尘和听见马达声音，都纷纷扔下枪逃命，唯独韩国良坐在炮台上坚

持抵抗，刘万春叫韩的好友王和甫几次上炮台哭劝韩下来，韩表示要身殉炮台，决不束手就擒。相持很久，后来刘用汽油煨着辣椒的浓烟把韩熏倒，才从三层楼上拖了下来，解回绥远。因为他是绥远的一个知名人物，经“绥远省参议会”正副议长张钦和阎肃等人营救，还没有丢了脑袋，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九·一九”起义前夕，才由绥远省监狱释放出来。

韩国良被捕之后，我曾把他在祝乐庆搞“独立王国”的经过，写了一篇长篇通讯寄给上海的《新闻报》，发表后好多人对他都表示同情。进步作家靳以在一篇杂文中也提到这件事，认为韩国良是个民主人士，给国民党反动派演了一场很辛辣的讽刺剧，对韩由于政治路线错误而最后失败，表示过惋惜。

萨拉齐的巴总窑子

巴总窑子地区在萨拉齐、武川和固阳三县接壤处的大青山中，归萨县管辖，包括巴总窑子、耳沁窑子、六道坝、后脑包等大小二十多个村庄和三家五家不等的无数居民点，现在已经组织成土默特旗的耳沁窑公社。可是在解放以前，由于这一带地形险恶，遍地烧林^①，向来就是土匪的逋逃藪和野兽出没的地方。抗日战争未开始的时候，萨县有两个行政村设在此处，都派有乡村建设工作指导员驻在那里，但是搞不清楚当地究竟有多少土地和人口，只有地主和山主才知道山林开发和居民分布的真实情况。居住在这里的人有一半是“黑户”，除了私垦零星的小块土地，多数是靠山吃山的“山

汉”。他们由于经常打猎，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射击技术，遇到荒年凶岁，便到前山和后山刁抢。其它地方的土匪与军队哗变出来的士兵，也来这里潜伏隐藏，因此良民和土匪不分，私有枪支很多。地主和山主平日是“窝把主”，到了必要的时候便成了挺身而出的“把儿头”②。绥远的土匪由民国成立就剿起，到解放以前越剿越多，四十多年一直没有剿完，与地主包庇土匪也不无关系，此种情形在萨县的巴总窑子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少地主和山主不仅坐地分赃，有时还企图南面称孤，巴总窑子的李海龙，便是其中的一个。抗日战争以前，人们只知道有个蒙民补音太领着三五十个小股土匪，在六道坝和后脑包一带活动，殊不知李海龙在那个时候就想坐皇帝，已经开始在巴总窑子秘密地搞“独立王国”。

李海龙是巴总窑子的地主和山主，少年时读过私塾，能够看通历史演义和武侠小说。非常封建迷信，喜欢接近算卦、相面、揣骨、下阴一类的三教九流人物。巴总窑子附近有个红石峡，这些走江湖的术士，想骗取李海龙的钱财，说是风水很好，如果把祖宗坟墓迁在此处，必定能出真龙天子。并说李海龙的象貌、八字和浑身骨节都高贵非凡，正应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鼓动他趁军阀割据、日本进攻中国、天下大乱的机会，以巴总窑子作为根基，赶快集草屯粮，招兵买马，好趁势夺取江山。李海龙听了他们的吹拍，居然想入非非，真个把祖坟迁到红石峡底下，将李海龙的“龙”字改成一个“龛”字，在房前的花池底下和屋后的大山里边，修起暗碉和密室，中间用地道沟通以免走露消息。工竣之后，便把几个石匠老师傅完全活埋在里边。这事发生在一九

三六年日寇由察北进犯绥东的时候，当时外人都不知道。一九三七年春天，土匪头子补音太被人打死，李海龙将补音太的老婆“大沙鹅”（外号）纳为妻室，把补音太的娄罗都收为家丁，他原先就有四五十支枪，这样一来更是如虎添翼，巴总窑子附近的农民和山汉，都得听他指挥，所以李海龙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成了大青山里边的一家土皇帝。只是他采取了“兔儿不吃窝边草”的策略，地方上没有感受到他的危害，故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土财主，不会有多么大的作为。

一九三七年秋天绥包沦陷前后，绥远的国民党党员和一些旧知识分子把土匪和少数地方团队收编起来，组织成“民众抗日自卫军”，准备转山头打游击。多数的地主武装则是“耗子不离墙根”——在原地按兵不动，坐观中日双方的成败。当绥远失守以后，萨县城里的人纷纷进山逃难，李海龙收容了许多泥瓦木匠，并利用大军退却之际，拣了好多散兵游勇的武器，力量扩充到五百多支枪。他看见日寇势如破竹，国民党的军队一日千里地溃退，知道自己夺取江山的时机没有成熟，便向日伪军通款投降，日寇委他为“保安团长”，让他绥靖巴总窑子一带地区，防范八路军和自卫军渗入。象李海龙这样的人，既然不愿意跟着自卫军东游西窜，当然不会欢迎八路军，对于日伪军也是表面应付。由于“山高皇帝远”的缘故，日本人摸不清他的底细，特务汉奸更不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所以巴总窑子一带还算风平浪静，没有战时的气氛。八路军知道他的企图消极，也就由他在大青山中自生自灭。唯独自卫军的鄂友三，因为得不到民心，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可以立足的根据地，一直处于流窜状态，对

李海龙所占的地形和所掌握的武力非常垂涎，想望“鸠占鹊巢”，收编不成便发动进攻，几次包围巴总窑子皆告失败。据说有一次李海龙摆了一个“鸳鸯阵”，把鄂友三最精锐的周贵堂连全部歼灭，从此鄂也再不敢硬碰。巴总窑子一带在八年抗战当中，几乎没有遭受日寇的烧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滋扰，居民在深山密林中大种鸦片，除了向李海龙进贡，几无其它负担，茅卷土窑有的改成砖瓦房舍，青年壮丁不少人戴着狐狸皮帽子和穿青羊皮大氅，在烽火连天的动乱年代，巴总窑子一带处于战争的空隙里边，似乎成了一个鸡犬相闻牛羊满圈的“世外桃源”。抗日战争以前在归绥“中山学院”教国文的祖靖亚先生，曾在这里避了二年多难，才回他浙江绍兴故乡。

李海龙的“独立王国”随着日本人的投降而结束。先是他的干儿“十三太保”里边的井得水叛变，把一部分人拉出，跑进萨县县城被县长高云山收编为保安队。其后鄂友三为了报复歼灭周贵堂连的深仇宿怨，以逮捕汉奸为名，由井得水作向导，派中美训练班训练出的交警大队和自己的三个骑兵团向巴总窑子进攻。李海龙看见自己孤立无援，无法继续立足，他又利用游杂部队间的矛盾，率领大队人马离开巴总窑子归附了王有功。王有功领他到归绥见了董其武，向各方面送了大烟板子③，在“麦香村”大请其客。鄂友三扑了一个空，想在归绥把李海龙抓住带回后山枪决，但碍于董其武的情面，跟王有功闹了很大的意见而未下手。因为董其武对李海龙很感兴趣，叫他参观了归绥的城防工事，李海龙给提了许多切合实际的建议，董其武认为他是个人材，不许鄂友三杀害。李海龙归附王有功是一时权变之计，到一九四八年林彪

将军的大军由东北入关，他比别人预见到国民党的土崩瓦解之必然，大概在杨成武司令员解放绥包之际，李海龙就率领部队先行起义，因此在全国解放后得到人民政府的宽大待遇，据说他现在包头养老。总算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他得以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度自己的幸福晚年。

伊盟的通岗浪沟

通岗浪沟原先属乌审旗，光绪年间归了万盛魁等四十八家“边行”，到民国六年划入神木县第七区的版图，成了陕西省在绥远省的一块“插花地”。这里边有两段经过：先是乌审旗在光绪年间起了“独贵龙”运动，因而发生了变乱，起义的蒙民一方面反对自己昏庸腐败的王公仕宦，一方面对侵占牧场和从事剥削的“边商”也极端仇恨。他们在用暴力革命的期间，把万盛魁等四十八家“边行”的房屋帐幕全部予以捣毁，特别是将“边行”放高利贷的账簿全完烧掉。事变平息以后，“边行”把责任完全推到乌审旗王公身上，提出很苛刻的赔偿要求。乌审旗的王公起初置之不理，后来由万盛魁的掌柜神木人吕猴旦代表四十八家“边行”向清政府控告，官司由神木的“二府衙门”经过太原的山西巡抚，一直上诉到北京的理藩院。当时的中国虽由满族统治者统治，但是官吏多半是汉员，他们对“边行”非常偏袒。加上乌审旗的王公怕吕猴旦把发生“独贵龙”运动的真实原因在北京宣扬出去，结果愿意认输，迫不得已将东北临近鄂托克、郡王、札萨克三旗两万平方里大的通岗浪沟赔给“边行”，由“边行”自行放牧开垦，并且不收“水草”、“靠圈”和“地铺”等捐

税。从清末到民初的十多年当中，通岗浪沟就成了“边商”自治的化外区域，经过他们移民拓荒，把大过欧洲安道尔国几十倍的一块丘陵，垦殖为牛羊遍野和糜黍丰产的米粮川，居民都过起比陕北老家和伊盟其它各旗较富裕的温饱生活。

民国六年卢占魁率领的绥远“独立队”南下川滇之际，渡黄河，经伊盟，万盛魁等四十八家“边行”手无寸铁，急得临时抱佛脚，分头派人到乌审旗、鄂托克旗、郡王旗、札萨克旗和东胜县请求派兵保护。那时各旗、县都危在旦夕，谁还能顾通岗浪沟，他们只好回神木故乡搬兵，神木县长受了“边行”的重礼，给凑来四五十个区丁。由于卢占魁的大军没从这里经过，通岗浪幸免于洗劫。四十八家“边行”至此感觉到不归官厅管辖，究非长久办法，便呈请把通岗浪归并到神木七区。这样有不少好处：第一，名正言顺，可以避免蒙旗和东胜县的干涉。第二，通岗浪距离神木县城有五百多里，当中夹着蒙旗的草地，县政府鞭长莫及，容易隐瞒户籍田粮以及牲畜。据说历任的神木县长只知道口外有神木的一块沙梁薄地，谁也不知道有多大面积和多少人口。四十八家“边行”每年往神木赶三五百羊就可应付官差，县政府和区上的委员衙役下来查看，“边行”用好酒好肉招待，临走送些酥油奶皮子，便可把一切蒙混过去。所以通岗浪的老乡，长久以来除了受“边行”按照陈规有限度的剥削，很少负苛捐杂税，比起其它旗县的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民要稍好些。

通岗浪沟一带并非沙梁薄地，而是很丰饶的牧区和农场。我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五年在这里经过并住过，觉得它一点也不荒凉贫瘠。好多人未到伊盟以前，站在黄河北岸

向南一望，以为是沙漠遍野，寸草不生，其实伊盟沙漠的面积并不太大，通岗浪一带完全系黄土高原，由于土地开垦没有多久，潜在的肥力很大。据当地的老乡们说，这里的一升糜米比河套的一升糜米能多煮两碗干饭，耐饥的时间也比河套的糜米要长。至于牛羊因为能吃到沙葱和蚱蜢花一类的牧草，肉味亦较其它地方的牛羊肉为鲜美。陕北人在原籍生活艰苦，到了垦区发家致富之后还是吃穿朴素，“边行”经理的穿戴茶饭跟普通农民差不许多。伊盟的首富杭和厚，打猛一看简直象讨吃要饭的乞丐。从表面上观察，伊盟似乎特别寒苦，所以傅作义以前的绥远将军、主席，多不大注重伊盟，恐怕连通岗浪沟被神木县划走这一件事也不知道。我第一次到通岗浪沟是在抗战第二年（一九三八年）的春天，那时是随军驻防该地，我们行军时曾路过好几家“边行”，看来是一、二十间孤独的土房，可是三五百骑兵好几天的人吃马喂，就能从附近的地窖中起出。至于一般农民，几乎家家都有牛羊猪鸡，客人进门先端来一碗烧酒招待，老乡给抗战军队做饭时，从大坛中一勺一勺地往外舀猪油。当时国民党的法币还未贬值，中国银行的“马票子”一元可以买五六只鸡，我跟的那个“绥远游击军骑兵旅”开走以后，接着白海凤的“新骑三师”和门炳岳的“骑七师”连续在这里驻了四五年防，三四千部队连人带马的粮秣主要都由当地供给，可见这个“独立王国”有多么殷实。

我第二次路过通岗浪，是在抗战胜利那年夏天（一九四五年），是给《奋斗日报》进行采访工作而旧地重游。当时伊盟的社会情况，已非七年以前的那种面貌，原来傅作义从山西河曲回到河套，因为地盘很小，便对伊盟重视起来，除

过在东胜设置了专员公署，还把鄂托克旗和杭锦旗农垦地与达拉特旗汉人居住的区域，设置了等于县的“桃力民办事处”和“达拉特旗战时民众组训处”，将河套的粮政役政都搬到伊盟来实行。同时，他为了分裂蒙旗王公的内部团结，故意在各旗制造军政分治，树立两个派系，以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各旗的札萨克和东西协理都扩充各自的势力，向蒙汉人民进行压榨。加上陈长捷、何文鼎的军队经常驻防，郭长清、王有功、邬青云以及榆林的“二十二军”所属的段宝山、王永清这些游杂部队到处滋扰，把伊盟蹂躏得十室九空，哀鸿遍野，家家都是土炕无席，人人都是衣不蔽体，粮食被政府挤干，完全以“登厢籽”等野草充饥。壮丁叫军队抓光，只剩下鸠形鹄面的老汉和儿童。可是到了通岗浪沟，就没有这种凄凉景象，我投宿到一个设有联保主任办公处的村庄，那里有衣帽整齐的儿童在两级小学中读书，青年小伙子背着枪骑在膘满圆溜的走马上边东游西荡，村里有铁匠炉、碾磨坊和毛织工厂，传出工具操作和机器运转的声音。进了老乡的家中，不是铺着府谷哈拉寨的二兰马褥，就是铺着当地织的提花毛毯，最使我惊奇的是晚上吃到了通岗浪自产的小麦所磨的白面。他们跟我详细地谈了通岗浪沟开辟的历史沿革，给我留下至今还没有忘掉的深刻印象。

上边我所亲眼看到的，可能是“边商”、地主和富裕中农的生活，不过贫雇农在通岗浪也比较不怎么样寒苦。第二天我到了母花梢的“桃力民办事处”，办事处处长傅观澜跟我谈伊盟西部各旗、县、处的“边商”、地主，为了逃避兵役粮政，有好多迁移到通岗浪沟去，傅作义很同意他把这个伊盟的“租借地”划入桃力民辖境。乌审旗的奇玉山也提出了收

回失地的要求，其它旗和东胜县亦垂涎这块肥肉。因为通岗浪沟的“边行”、地主已拿现洋向军队高价购买枪械弹药，装备起五百骑兵，怕操之过急，逼上梁山，投了陕甘宁边区，所以谁也未曾下手。不久日本投降，傅作义忙于抢夺京绥线上的胜利果实，便把这件事搁起，以后占领了张家口和掌握了北京城，更忘掉了这一地区。旧绥远省的三个“独立王国”，以通岗浪的寿命最长，由光绪中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少维持了五十多年。

-
- ① 当柴烧的灌木林。
 - ② 把儿头就是领一伙人的土匪头子。
 - ③ 成块的大烟土。

附 载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总结

(1963年1月11日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全体通过)

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三十个省、自治区和大城市政协地方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务院文史研究馆、中华书局等有关单位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政协系统开展文史资料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是在三年多来文史资料工作获得巨大成绩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在于了解情况，提高认识，交流经验，加强协作，以期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把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取得更大的进展。会议从预备会议开始，经过阅读文件、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三个阶段，最后经过大家讨论，共同进行了总结。在会议进行期间，与会同志阅读了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出的《全国文史资料工作概况》、《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意见》、《征集辛亥革命史料工作总结》四个文件，就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政策等原则问题以及许多具体工作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充分发扬了民

主，对各项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一致认为这次会议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的正确领导和密切关怀之下，开得很好，收获很大，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这次会议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这次会议，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三年多来政协各级组织文史资料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面正确估计工作成绩和改进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同时也增进了政协各级组织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协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通过这次会议，与会同志根据工作中的经验和体会，就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任务的认识问题，意义、作用和成绩的估计问题，当前的中心任务问题，今后的发展前途问题等等，本着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精神，充分交换了意见，对这些重要问题取得了进一步的认识。

第三，通过这次会议，互相交流了许多关于组稿、审稿、编辑出版以及干部编制等方面问题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经过经验的互相交流和互相学习，各单位有些原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获得了解决的途径，对于各单位今后更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必将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四，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与各地方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机构的工作关系，并且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几项切实可行的规定。各地方委员会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协作问题，也经过讨论，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次会议还听取了几位史学界专家关于史料工作问题的发言，这些发言使与会同志获得了不少理论和业务知识。会

议还听取了政协全国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张执一副部长的讲话，与会同志对于党和政协领导对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视和对这次会议的关怀，都感到很大的鼓舞。

这次会议虽然对于有些问题讨论得还不够深透，而且在小组讨论阶段务实较多，务虚较少，但是，总的说来，这次会议是开得成功的，不仅圆满地完成了“了解情况、提高认识、交流经验、加强协作”的预定任务，同时也使与会同志更加明确了工作方向，认清了发展前途，增强了信心，提高了干劲。毫无疑问，这次会议必将为文史资料工作带来更大的进展，是使我们的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很多，涉及的范围很广，经过总结，会议一致同意归纳为以下十个问题：

（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

三年多来，政协各级组织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对各方面老年人士提出的“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号召，向曾经在晚清、北洋、国民党统治时期具有各方面亲身经历的人士征集了大量的回忆录性质的文稿，并且选编了一部分稿件，出版了若干种文史资料刊物。这次会议认为，应该根据三年多来的工作实践，进一步明确以周恩来主席的号召作为指导我们全部工作的总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动员全国为数众多的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把他们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而且还要通过整理研究、编辑出版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使他们写下来的

记录能够很好地传给我们的后代。我们不但要充分发动各方面有关人士撰写史料，而且还要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运用他们有丰富的亲身经历这个有利条件，尽量及时弄清一切可以弄清的历史事实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全面地体现周恩来主席的号召，才能完满地完成把各方面人士所写的史实记录传给我们的后代的任务。

会议认为，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进一步明确，关于工作总方针问题的规定，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大收获，对于推动文史资料工作的深入和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和作用问题

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会议同意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基本看法，即：这项工作是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创举；通过这项工作，不仅可以为历史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来阐述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关于旧中国各方面生动具体的历史知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时，通过这项工作，可以团结全国为数众多的阅历丰富的老年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既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同时通过对于过去的回忆和今昔的对比，也可以加速自己的进步，更加坚定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会议认为，根据三年多来文史资料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也要有足够的估计。各方面人士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以及由于其他种种主观条件的局限，他们对于提供旧社会的特别是涉及历史上阴暗面的亲身经历，不仅顾虑很多，需要我們进行耐心细致的反复宣传动员，而且他们所写的史料，一般说来，只能反映一定的而不可能是全部的历史真实，不同程度的片面性，甚至有的有意隐讳阴暗面，夸大光明面等等，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們在肯定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对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保持清醒的认识，才能对于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

（三）关于工作成绩的估计问题

会议认为，三年多来，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史馆和参事室等有关机关的协同下，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首先，我们团结了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老年人士，调动了他们的积极因素，为我国近代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并且通过研究整理、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工作，为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料流传后代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经过政协各级组织的共同努力，在三年多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摸索出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大量史料的征集，通过三年多的摸索前进，具体体现了周恩来主席的号召，开创了一项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新型的史料工作。

这种史料工作所以是新型的，正如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历次总结中所着重指出的，在于有组织地广泛

发动过去几十年来许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把旧中国的面貌较为真实地记录下来，尽量及时弄清过去许多历史事实的真相。这在过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作过而且也不可能作到的事情，只有在人民民主政权日益巩固、统一战线日益扩大、各方面人士的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的形势下，才有了广泛开展的基础和条件。我们相信，随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扩大，随着各方面人士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文史资料工作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三年多来，我们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表明周恩来主席的号召、党在政协系统内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所产生的巨大效果。我们的工作获得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正确领导，其次应该感谢全国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支持。我们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虽然也付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不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我们的工作还只是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必须更加谨慎谦虚，兢兢业业，更加努力，作好工作。

（四）关于工作前途问题

这次会议有人提出文史资料工作能搞多久和究竟搞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也就是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前途的问题。会议对于这个问题取得了如下的一致看法：

首先，从各个地区来说，由于各地方的近代历史发展情况不完全相同，工作能搞多久，能搞到什么程度，要取决于当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有的可能短一些，有的则需要

较长的时间，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我们应当看到，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近代社会又经历了无比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可以发掘的史料蕴藏极为丰富。三年多来，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还仅仅是开始，可以发挥的潜力还很大，可以作的事还很多。一方面，把蕴藏的史料尽可能地充分而全面地发掘出来，还需要我们继续作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一方面，把我们征集的史料加以整理提高，也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劳动。可以断言，随着文史资料工作的逐步开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比较真实准确、系统完整（我们向某一个人征稿，不要求系统完整，但我们在广泛征稿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整理，则要求达到系统完整）、内容生动、价值很高的史料；在全国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中间，将会出现一批精通近代史料的人才。总之，我们的工作不是无甚可为，而是大有可为，大有前途！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项工作作到最后仍是历史资料工作，而不是编写历史。

（五）关于当前的中心任务问题

目前文史资料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集到的稿件质量较高的还只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而且各类稿件很不平衡，还有许多薄弱环节，甚至空白点；有的地区还只有一般号召，缺乏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为了把今后的工作提高一步，会议一致同意以“深入组稿、提高质量”作为文史资料工作当前的中心任务。

应该说明：第一，“深入组稿”，是在继续广泛发动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而不是不需要继续广泛发动，片面地强调深入，特别是对于工作还没有很好地开展了的地区来说，大力进行广泛发动，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二，“提高质量”，是通过我们本身工作的改进，使价值较高的应征稿件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而不是以摈弃价值较差的稿件来求得质量的提高。

实现“深入组稿、提高质量”这个中心任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工作：

第一，改进工作方法：（1）组稿要作好两套准备工作，即：根据我们的征稿范围，就我国近五六十年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各个方面的史实，拟定比较详细具体的征稿参考题目；广泛调查全国各地能够提供史料的人士，制成名单。作好这两套准备工作，就可以为深入组稿打好基础。（2）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密切同撰稿人的联系。我们同撰稿人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和较深的了解，才能有的放矢，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思想动员和具体帮助。（3）要物色、培养一批写手，帮助不能执笔的老年人士记录和整理他们的口述资料。（4）要发扬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反对足以挫伤撰稿人积极性的种种简单生硬的作法；对于某些掌握重要史料的老年人士，必要时要配备专人联系，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进行思想动员和具体帮助。

第二，加强薄弱环节：目前组稿工作上的薄弱环节，主要有北洋、敌伪、文教财经和社会生活这四个方面。这些方面有的虽然征集到一定数量的史料，但质量不高，许多重要的有关人士还没有把他们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提供出来，有

的由于我们过去注意不够，没有积极从事发掘，以致至今还是一个空白点。为了把各个方面的史实保存下来，以充分反映旧时代的全部面貌，今后政协各级组织必须抓紧这些薄弱环节，根据不同情况，有重点地分担任务，采取积极措施加强组稿工作。

第三，加强《文史资料选辑》的示范作用：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三年多来对于推动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应该努力提高这个刊物的质量，以充分发挥其对各方面人士撰写史料的鼓舞示范作用，为深入组稿创造有利条件。各地方除了继续支持政协全委会的《选辑》外，各地方自己编印的资料刊物也应密切配合组稿工作。

第四，逐步开展资料整理工作：对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不仅可以使这些资料提高质量，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还可以在整理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和线索，使组稿工作能够有的放矢，作得更加深入，更有成效。资料整理和深入组稿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具有辩证的互相作用的关系。各地方委员会如果征集的资料已经积累到一定数量，并且具备开展整理工作的条件，可以着手试办，取得经验，逐步开展。

(六) 关于工作关系问题

在会议进行期间，与会同志对明确工作关系、加强协作的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展开了争论，经过反复研究，最后得到了领导同志的指示，对这个问题取得了如下的

一致认识：

工作关系问题，包括如下几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政协全委会与各省、自治区和大城市地方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工作关系问题，二是政协各级地方委员会相互之间的工作关系问题，三是政协系统的文史资料工作机构对其他文史资料工作单位的工作关系问题。

第一，政协全委会对各省、自治区和大城市地方委员会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工作关系，有以下几种内容：1.有重点地派人到各地了解工作情况；2.经常通过《政协会刊》、《文史资料选辑》专栏和不定期的工作简报交流各地方的工作情况和经验；3.提出组稿计划，委托各地方进行组稿；4.编印全国性的文史资料刊物；5.在适当时期召开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

政协各省、自治区和大城市地方委员会对政协全委会应定期汇报文史资料工作情况；推荐质量较高、具有全国性内容的稿件，支持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继续办好《文史资料选辑》和准备编印公开发行的《文史资料丛刊》。各地可以根据情况，出版地方性的资料刊物；如条件不具备，也可以不出。

第二，关于各省、自治区和大城市政协地方委员会相互间的协作问题，由于各地区情况不同，条件各异，不宜作统一规定，可以由各地根据需求和可能，本着自愿结合和互相支持的精神，分别进行协商。

各省、自治区和大城市政协地方委员会对下一级地方委员会的文史资料工作，也要经常了解情况，进行指导和帮助。有几个省级政协组织和省会市政协组织联合设立了文史

资料工作机构，会议认为这是一条好的经验，这样可以集中人力，避免工作上不必要的交叉。但是各地区情况不一，宜分宜合，各单位可以自行考虑。

第三，关于政协组织和其他有关单位的协作问题，各地政协组织对于当地的文史馆、参事室和有关党派团体的文史资料工作，有责任予以积极的帮助，并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目前有的地方的文史资料工作机构是由政协组织联合当地的文史馆、参事室以及有关党派团体联合组织的，这样作固然有好处，但是，不能认为其他单位的历史资料工作应该统一归口于政协组织；同时，这种联合必须是出于各单位的自愿。

（七）关于县市工作问题

关于县（市）级政协地方委员会是否需要开展文史资料工作的问题，会议认为，既不是“普遍开展”，也不是“一般不搞”，各个单位是否开展，关键在于当地有无需要，是否具备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有需要同时也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这项工作的县（市）级政协组织，一方面要协助省级政协组织的工作，一方面要配合当地的地方志工作。征集到的稿件，可以斟酌情况，或者集中到省或者留供编纂当地地方志之用。县级单位一般不必自行编印资料刊物，应以集中力量，协助省级政协组织办好省级的资料刊物为宜；如果当地有需要并有条件出版刊物，最好用油印不用铅印，印数也不宜过多。

(八) 几个具体问题

这次会议还就各地区代表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编制、经费预算、稿费标准、干部培训、发行工作等方面的问题，以及组稿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交流了经验，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第一，关于干部编制问题：各单位开展文史资料工作，都感到人力不足，干部缺乏。根据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经验，解决干部力量不足的问题，主要在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动各方面有条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士参加工作。当然，配备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是有必要的，但编制大小要根据各单位工作的繁简多寡而定，不宜作统一规定。

第二，关于经费预算问题：从各地方情况看来，经费问题一般不大，只要工作开展起来，取得领导重视，就会得到解决。少数单位如果经费有困难，可向当地党委统战部反映情况，要求支持。有些单位如已征集到一部分有价值的稿件而因经费困难，付不出稿酬的，可以转送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审核致酬。

第三，关于稿费问题：应强调政治动员与物质报酬相结合的原则。征稿要付稿费，但主要要强调政治动员。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定的稿费标准，每千字从一元至十元，标准不高，幅度很大，三年多以来行之有效。处理稿费主要应凭稿件本身的质量优劣来评定稿费等级，但可以适当考虑到统战工作的需要，在必要时可以斟酌具体情况，对

某些人给以适当的照顾。各地稿费标准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决定，不必勉强求得一律，也不一定必须低于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定的标准。

第四，关于资料刊物的发行数量问题：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编的《文史资料选辑》，为了适当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发行数量，各地方需要增加多少，可预作估计，以便统一考虑。至于各地方所出的资料刊物，发行面应宽应窄，宽窄程度如何，由于各地方具体情况不同，不便作出统一规定，最好由各地方自行考虑，请示当地党委决定。

第五，关于培养干部问题：为了作好工作，我们应有计划地培养一批熟悉近代历史、有一定业务水平的干部。各单位培养干部，主要应结合本身业务，在日常工作实践中求得提高，当然，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有责任尽量予以协助。有的地区要求派人到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见习工作，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表示欢迎。

第六，关于组稿工作方面的几个问题：

(1) 组稿对象可否包括在押战犯和劳改犯的问题：为了从多方面把各种史料及时征集到手，如有必要，也可以向他们组稿，但必须通过公安部门进行，取得公安部门的同意和支持。这些人所写的稿件是否付酬以及是否可以发表，也都应征求当地公安部门的意见。

(2) 对旅居港澳的人士是否可以组稿的问题：应采取慎重态度，如有必要，必须事先提出具体名单和组稿办法，报请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才能进行。

(3) 是否可以向劳动人民进行调查采访的问题：当然

可以作，如向老年农民搜集过去农民斗争和农民生活的史料，向老师傅搜集民间手工艺的史料，向一般劳动人民中间的老人了解过去某些社会生活方面的情况，等等。

(4) 是否可以组织农业方面的史料，以支援农业生产的问题：如上所述，各地方根据当地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适当组织一些农民革命斗争和农民生活的史料是可以的，但如果把文史资料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轨道，则是不恰当的。

(5) 关于退稿问题：对于一些东抄西袭、望风捉影、毫无史料价值的稿件，是可以退的；但在退稿时应说明征稿要求和退稿理由，要通过退稿的处理工作使真正掌握史料的人士能够根据我们的要求写好稿件，并应注意避免足以挫伤撰稿人的积极性的简单生硬的作法。

(九) 关于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问题

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史料征集工作的问题，会议同意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出的意见，从一九六三年开始，以两年为期，在广泛征集各方面史料的同时，将这一方面史料的征集工作作为重点，争取尽量把一切可能征集到的有关史料征集到手。这是一项迫切的任务，稍纵即逝，各地方政协组织必须密切配合，根据征稿参考题目，结合当地情况，分担组稿任务。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不只限于征集北洋统治政权这一方面的史料，举凡与北洋政权相对立的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各种进步力量反对军阀政权的斗争，以及这一时期内经济、文化、社会生活

等方面的史料，都在征集之列。因此，不仅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其他主要城市需要大力进行征集，其他地区也需要结合当地历史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择定可以着手组稿的选题和对象，加强这一方面的征集工作，以便把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各地的社会面貌和阶级动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出来。

（十）对《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修改问题

会议认为，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这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全面地总结了三年多来文史资料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正确地阐明了文史资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意义作用，对于全国文史资料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经过这次会议，大家认识都有提高，为了使这个文件更加完善，内容更加充实，会议建议政协全委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根据这次会议所提出的意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需要修改补充的问题，主要有：（1）关于总方针的问题；（2）关于当前中心任务的问题；（3）关于工作关系的问题；（4）关于资料整理工作的问题。此外，在文件开头，建议增加一段关于三年多来全国文史工作发展情况的概述。会议还建议，这个文件经过修改补充后，由政协全委会印发各级地方委员会，作为文史资料工作的参考文件。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37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